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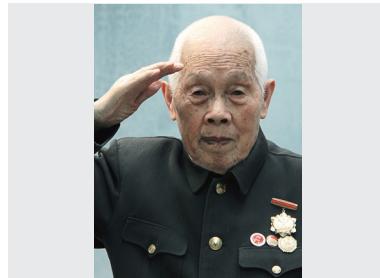


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

双月刊 单月1日出版
2021年第4期 总第199期



2 风展红旗如画——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60 我的父亲——百岁黄埔抗战老兵吴道华的传奇人生



63 我的风雨人生

我的黄埔前辈

- 56 追忆我的姥爷陈敬安烈士 / 张战
- 58 父母的三句话 / 蒋光宇
- 60 我的父亲——百岁黄埔抗战老兵吴道华的传奇人生 / 吴如雄

黄埔后代

- 63 我的风雨人生 / 骆大仁
- 65 富阳黄埔同学口口称颂的“堂倌” / 龚玉和

历史

黄埔往事

- 68 军史布衣第一人：陈廷贤 / 林爽爽

口述历史

- 71 忆湘西会战 / 刘振荣

黄埔研究

- 74 曹艺留下的《1929年中央军校大逮捕事件追忆》/ 曹景滇

黄埔收藏

- 81 红色文献之《政治问答集（一）》/ 单补生

黄埔日历

- 87 1926年4月8日，蒋作宾到黄埔军校访问蒋介石，力主速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 贾晓明

黄埔连载

- 92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 熊子杰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Android



iOS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性了。”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20世纪初,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深重灾难中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彼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新青年》成为弘扬新思潮、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阵地,《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印发,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准备好了思想基础;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由最初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觉悟不断提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迫切期待一个能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于是,中国共产党应时代潮流诞生了,这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

从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国共合作、走过了抗日战争、走过了解放战争……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1921年到2021年极不平凡的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冲出黑暗,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民族独立到国家解放,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在这不平凡的一百年间,一所驰名中外的军校的创建又为中国共产党的不平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便是黄埔军校。这所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创建的军校,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并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凝聚了国共两党、苏联和共产国际各方的共同努力。周恩来曾回忆道:“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1923年决策,1924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周恩来选集》:《关于1924年至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黄埔军校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极力支持,鼓励党员及有志于革命的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思想教育工作不足,廖仲恺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人选出任政治部主任时,周恩来欣然前往,于1924年11月起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恽代英、聂荣臻等也先后来到黄埔军校任职。

适逢中国共产党建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黄埔研究专家曾庆榴和陈予欢的研究脚步,一起去回顾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创建、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贡献。黄埔

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

□ 曾庆榴

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在党员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有数以千计的党员进入黄埔军校，从事了多方面的建设性、开拓性的活动，特别是在思想建校、主义建军等方面，为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不容抹杀的贡献。

黄埔军校从创办之日起，即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学习或工作。杨其纲（1期生、中共党员、军校政治部秘书）在《本校之概况》中说：“每期学生不仅有单纯的国民党员，而且有第三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员。”

我在做《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2004年出版）课题时，曾逐一辨认出在1927年夏季“清党”之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未包括武汉等分校）中有姓名可查的中共党员共431人，其中教职员65人、学生366人。本书出版之后，我陆续找到了一些新材料，目前可知黄埔军校前6期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的大致情况是：第1期黄埔生中入学前已入党者33人，入党后入党者81人，共114人；第2期51人；第3期77人；第4期207人；第5期学



生、入伍生共35人；第6期入伍生41人；高级班及无法确定期别者18人。黄埔前6期中共党员共613人，其中有543人是学生、约70人为教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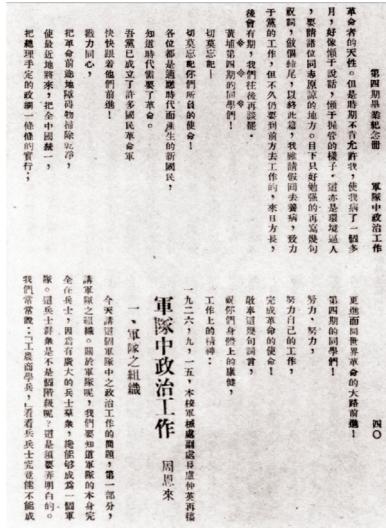
以上为有姓名可查考者。由于在校时间短、人员流动性大，处于隐蔽状态及在教官、学生名册上缺名等原因，许多人的共产党员身份不容易辨认。4期生王石风有篇文章说：他所在的4期政治科第1大队150人，“内中有51人是共产党员”。但现在从该队名单中能确认的中共党员只有13人，尚有38人究竟是谁搞不清楚。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说，黄埔

“清党”时，共逮捕了大约400人，被捕者有的是教职员，多数是5期生和6期入伍生，绝大多数查不出他们的名字。由此可以看出，上述600多人只是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黄埔军校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称中共黄埔支部（简称“黄支”），后来称黄埔特别支部，直属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中山舰事件前后成立黄埔军校“党团”。

我对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总的认识有三点。

第一，人数不少，在校内的



/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四期生毕业纪念册上撰写的《军队中政治工作》。

比例较高，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组成部分。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645人中有中共党员114人，占17.6%。前4期学生共4971人，中共党员为500多人（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发言说中山舰事件时“黄埔有五百余党员”，中山舰事件时即第4期办学时），约占10%。这时（1926年4月），广东全省中共党员为3700人，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按500人算）占全省党员13.5%。1927年初，全国中共党员不足6万人，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按保守估算1000人计，约占1.7%，这个比例说明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在党内的的重要性。

第二，中共党员的素质较好。一是文化程度较高：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中不少人曾留



/ 黄埔军校筹备处在广州南堤2号办公旧址。

学法、德、日本和苏联（张申府、周恩来、鲁易、聂荣臻、熊雄、饶来杰、李合林、吴明、刘云），有北大等著名院校的教授（陈启修、于树德、安体诚），有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等校的学生（王懋庭、李世璋、伍中豪、鲁纯仁、苏怡、钟友千、苏士杰等为北大学生，王逸常、张其雄、徐石麟、阳翰笙等为上海大学学生）。二是政治素质较好：有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早期中共党组织的成员（张申府、周恩来、吴明、唐际盛、赵子俊，4期恽雨棠是陈云入党介绍人），并出席过中共党的一大（包惠僧）、三大（金佛庄）或俄国“远东会议”（赵子俊）；有的人是各地方共产

党、青年团组织的创建者（荣耀先，周启邦）；有的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是国民党一大（胡公冕、韩麟符）和二大（高语罕、恽代英、蒋先云等）的代表。三是经历、经验丰富：不少人是各地工农学生运动的领袖和骨干分子，有的参加过二七罢工，安源、水口山罢工（蒋先云、赵柏），开滦罢工（张隐韬）；有的参加过各地学生运动（杨溥泉、许继慎、傅维钰）；还有的从事过军事工作（徐成章、茅延桢、金佛庄、曹石泉）等。总之，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内干部的精华。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比较好。组织健全，干部得力，党内学习、教育抓得紧，能够按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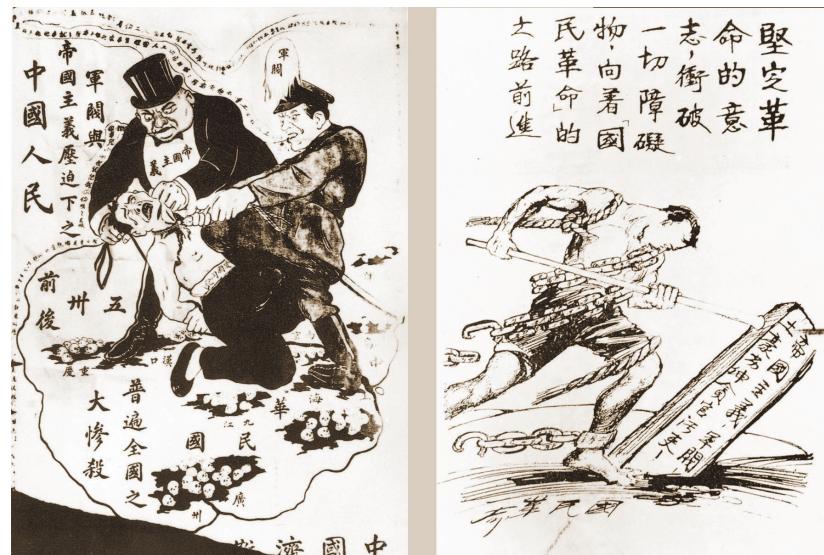
动，能审时度势应对各种环境，处理复杂问题。

应当说明，活动在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在苏联政府帮助办学、苏联教官参与校事的情况下，通过军校的招考、聘用的渠道而进入黄埔的。这些人并不是隐藏在校园里的零零星星、神出鬼没的几个人，而是一个人数相当多、活动能量很大的一个群体。如果今天有谁先入为主，以“潜伏”“安插”“打入”这样的词语来想象或描述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活动方式，那是不对的，是同当时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运动兴起、黄埔岛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相符合的。

共产党人在黄埔建校、建军中的作用

所谓“建校”是指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建和初期的发展，“建军”是在黄埔军校教官、学生的基础上创建革命军，在这两个方面，共产党人起什么作用？

一是为军校注入新质，输入新鲜血液，奠定了黄埔新型军校的基础。前6期黄埔师生中，先后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加入黄埔军校，大大充实、加强了黄埔军校。1924年1月28日，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针对共产党员为何加入国民党的质疑回答说：我们加入国民党，是“自己在理论



/ 黄埔军校政治部绘制的革命宣传画。

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这些话也可用以解释共产党人加入黄埔军校的动机。我逐一查阅过30多名入学前已是中共党员的1期生的“详细调查表”，在“为何报考本校”一栏中他们表达的思想，就是接受军事教育，参加国民革命。报考黄埔，是共产党人投身国民革命、并希望对这一场革命“有所贡献”的具体表现。

黄埔军校创办时，考生虽多，但具备新的思想意识者并不多。1期考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彭素民读了300份答卷后说：多数考生知识陈旧，如“社会”这样常用的词语，“能应用其名词者不及百分之十，能略言其二者不及百分之五，无非拾取20年前科场试艺之余绪，

可见学生总程度之差”。可见报考者热情有余，而知识未及更新，思想准备不足。共产党人参加黄埔军校，为黄埔军校输入了大批如前面所说的文化、政治素质都比较好，思想意识比较先进的青年，恰好填补了黄埔军校学生在这方面的不足。这一点，是共产党人在人力资源方面对黄埔建校所做出的一个贡献。

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是个思想活跃，组织能力、活动能力都较强的群体，多数成绩优秀、才华出众。蒋先云被校长称为“好学生”，《黄埔血史·蒋公先云传》称他“学、术两科、冠于全校”。徐石麟之政治讨论报告书被政治部主任邵元冲评为“成绩最佳”，邝鄘为2期优等生第2名；金佛庄、严凤仪、李之龙、吴明、陈作为、罗振声、周逸群、黄锦辉、焦启

恺、何昆等被选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担任各种委员。他们不但是黄埔军校各种活动的中坚人物，还是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王一飞、游步仁、胡允恭，胡承焯、王备、熊受萱、胡秉铎、饶荣春、段子中等是《革命军》《青年军人》《黄埔潮》等报刊的主编、编辑或笔杆子；严凤仪、赵自选、唐澍、伍文生、季步高等被选为工农武装的教练；谭其镜、袁策夷、李劳工、吴振民、李运昌等被派赴全省各地援助工农运动，等等。黄埔教育中的共产党人，主要在政治部工作，是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的栋梁。此外，他们还参与军事训练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如任特别官佐，学生队队长），宋云彬、张鸿沉等任《黄埔日刊》的专职编辑。

共产党人进入黄埔军校，不只是在人数上充实了黄埔，更主要是为黄埔注入了新质，将大批既有理论素养，又有社会活动经验，富于开拓精神、创新精神的进步青年引进黄埔，从而改变了军校的人员结构。这些人不仅是课堂、操场上的佼佼者，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先锋，还是黄埔军校内外政治活动、党务活动和民众运动中的中坚人物和活跃分子。

二是主持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政治部是黄埔

军校最具特色、最有工作成效的一个部门。而这个部门的成员和主持者，主要是共产党人。黄埔军校筹创阶段，共产党员张申府任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11月，周恩来继邵元冲出任政治部主任。此后，相继到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有包惠僧（后方主任）、鲁易（副主任）、邵力子（主任）、聂荣臻（秘书）、熊雄（代主任）、恽代英、高语罕、孙炳文（政治主任教官）、韩麟符（军官政治研究班主任）以及章琰、杨其纲、王逸常、萧楚女、陈启修、于树德、安体诚、熊锐、李合林、张秋人、王懋庭、欧阳继修、饶来杰等。至第4期，政治部教职员共80多人，其中可确认的中共党员有20多人。

共产党人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耕荒播漠，属于创造性、开拓性的一种工作。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等都没有政治部的设置，没有开过政治课。虽然，“政治部”三个字早已出现在1914年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发展演变的一个阶段）成立的时候，当时，政治部与总务部、党务部、军务部、财政部组成中华革命党之本部，胡汉民任政治部部长，而黄埔前两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邵元冲，也并不是共产党员，但这都不等于说在共产党人接手之前，黄埔军校政治部早已打好了基

础和走出了路子。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在黄埔军校讲过课，但说到他们对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有何建树，认真说来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他们不懂、不感兴趣也不擅长于此道。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并不是在国民党的传统中滋长出来的，而是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红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开拓、发展起来的。

从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工作开始，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在内容、制度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呈现出新面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政治教育，更新了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将教学重点放在革命理论的讲授和国际、国内政治状况的分析上面。主要的课程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等。这些多是新知识、新学问，包含了当时革命运动的热点、焦点问题，授课者多是当时国内知识精英（还有苏联选派的）。教学内容的更新，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军事教育观念的突破。蒋在当时常作的“精神讲话”（《黄埔训练集》）中所表达的，不外乎

是军人的“服从”意识、“纪律”意识（包括“连坐法”）和“同学相亲”的意识（“亲爱精诚”），这些并无新意，因为“服从”“纪律”并不是革命军、“党军”的特质，任何一位军阀都会要求他的部属无条件服从他自己，都会定出这样那样的“纪律”来管治他的队伍。“亲爱精诚”等，显然也是有条件的、有原则前提的。共产党人在军校讲政治，不是一般地讲“服从”、讲“纪律”和讲“团结”，而是要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来提高军人的革命觉悟。与军人但知“服从”，莫问政治的陈腐说教相反，周恩来等人要求军校学生要关心政治，首先要解决为何当兵和为何打仗的问题，积极参与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各项政治活动。提高军人的政治自觉，明确军人、军队的社会责任和角色意识，是共产党人在军校政治教育中的主要建树，是他们在这个领域中所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主义建校，思想建军，其源头就在这里。

从第4期开始，黄埔军校设政治科，招生500人，大规模培养以政治为专业的学生，这在军校教育中是个创举。

另一方面是军队政治工作。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于是开始有“校军”。军校政治部的工作，遂从校内政治教



/ 政治科学生成进行迫击炮训练。

育发展至军队政治工作，这是一项更加具有创新意义的系统工程。

首先是将党代表制度从军校扩展至军队。黄埔创办时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军校设党代表（廖仲恺），至教导团组建时，将党代表之设置扩展到部队的团、营、连级。为配备党代表，政治部专门举办了“政治训练班”，为他们进行上岗之前的培训。在军队设党代表，目的是要使军队姓“党”，将军队置于革命党、革命政府的监督、指挥之下。由此迈出了以党治军、以党领军的第一步。

军校教导团成立后即参加第一次东征，进入战时状态。政治部不但要做部队本身的工作，即思想教育，执行纪律，鼓舞士气等，还要出面处理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友军之间的关系，使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争取战争的胜利。1925年2月6日，东莞商务分会召开欢迎东征军大会，蒋介石、周恩来、茅延桢出席。

蒋介石说：“本校军队有党代表、政治部，专管与人民有关的事”，“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并对周恩来做了介绍，将周恩来推上了处理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的前台。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党代表、政治部走出校门，在民众面前的首次亮相。两次东征中，政治部负责地方建党（周恩来任国民党东江组织主任）、建政（行使地方行政一些职权，周恩来任过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些都是全新的工作。在实践中，政治部还创造了一整套振奋我军、瓦解敌军、争取人民援助的生动活泼的军队政治工作形式。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释放出巨大的军事能量，东征之役，黄埔教导团及参战的黄埔官兵攻必克、战必胜，大破敌军。恽代英当时盛赞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有人或者会问，蒋介石说过党代表“是我一个人提倡出来的”，政治工作怎能说是共产党人的创造呢？蒋介石可能是党代

表的“提倡”者，但他并不真正了解、或者说并不接受党代表制度的真谛。当时中国的军队多冠以地方之名，如粤军、桂军、滇军、湘军等，李福林的军队干脆称为“福军”，是他的私家军，军队不姓“党”，不受革命党、革命政府指挥。孙中山革命多年不成功，其教训均可归结为此。所以，在军队中设党代表，让军队姓“党”，与其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不如说是孙中山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得来的。蒋介石虽然也将“革命”的口号喊得很响，但走的却是一条拥军自重的老路，从他中山舰事件前后的行动、言论来看，他并不愿意让他的军队真正姓“党”，真正受命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而要以军制党、以军制政。许多问题的症结都在这一点上。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从第1军中撤出了大批共产党人，不让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蒋介石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北伐战场上他亲自率领的第1师（王柏龄）和第2师（刘峙）的溃败。蒋介石自己承认：“此次出师，第1、第2师成绩皆不良。”这样的对比，更说明共产党人在军校、军队的政治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深入社会，促进军校教学活动与社会革命运动相结合。黄埔军校创办于国民革命兴起、高涨的时期。当时的广州是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革命者风云际会，各项革命运动蓬勃展开。黄埔军校不搞关门办学，而是结合革命运动的实际来办学，让学生深入社会，面向实际，自觉投身于民众运动。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中许多人校之前就从事过工、农、学生运动，有开展社会活动和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他们在促进军校教学活动与社会革命运动的结合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带头作用。

当时，黄埔军校党组织和党员自觉关注民众运动，通过种种渠道同工农商学各界保持密切联系，并以种种形式给予支持和援助。广东工团军、农团军、农民运动讲习所、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军事教练和骨干，多数是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他们往往是学生还没有当完，就当起了先生。被派赴全省各地负责训练农民自卫军、援助农民运动的（海丰李劳工、吴振民，东江李运昌、于以振，西江蓝广孚、三角洲詹宝华等），多数也是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其中李劳工、蔡林蒸（蔡和森的哥哥）等在援助工农运动中牺牲。

黄埔军校共产党人自觉、积极参加社会革命运动的实践，不但密切了军校与社会的联系，而且为军校的教学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军校办学的新路子。正是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 武昌各界人士赠送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盾牌。

党务活动和投身工农运动的过程中，黄埔学生有许多机会与场合施展自己的智慧、爱国热情与创造精神。黄埔军人的成长，同这一点是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内的不少优秀干部，国民党内的许多黄埔名人、名将，当年都亲身参加过援助省港大罢工及支援广东农民运动，他们在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过程中，迈出自己军旅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四是充当教导团、“党军”和国民革命军的骨干。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1期生毕业，遂以本期毕业生为基础，成立黄埔军校教导团（两个团），此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独立组建军队之发端。第一次东征时，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4月6日举行第73次会议，通过廖仲恺所提《建立党军案》，以军校教导团的两



/ 省港罢工纠察队(徐成章、周士第、蔡林蒸等曾在此工作)在东园前操场举行军事检阅。

个团成立“党军”(第1旅)，黄埔校军被正式冠以“党军”之名。同年8月，国民政府实行“统一军政”，统编国民革命军，“党军”乃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下辖3个师。1926年1月，成立黄埔军校教导师(后称第20师)。黄埔军校的创办包括了“建校”“建军”两部分，“建军”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1925年8月前是“校”“军”一体，此后虽称“校”“军”分立，而实际仍由校长统揽“校”“军”，并逐步形成一个“黄埔系统”。

共产党人在黄埔各部队中担任重要骨干：在教导团，严凤仪、金佛庄、宋文彬、曹石泉等任营长，章琰、茅延桢、胡公冕、唐震等任营党代表，郭俊、曹渊、刘畴西、彭干臣、游步仁、张隐韬、李汉藩等任连长或连党代表。第1军组建时，周恩来任第1

军政治部主任和第1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军副党代表)，鲁易任师党代表，李侠公任师政治部主任，金佛庄(二次东征中任团长)、包惠僧、徐坚、胡公冕、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王逸常任团党代表，唐同德、郭俊等任营长，谭鹿鸣等任副营长。至黄埔教导师成立，包惠僧任师党代表，李默庵任团党代表(团长为叶剑英)。1期李之龙1925年10月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授少将衔，次年1月任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授中将，是1期生中升得最快的一位。

黄埔教导团创建之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改组，中共党员徐成章(军校特别官佐)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1925年11月，建立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34团，中共党员叶

挺任团长，黄埔教官杨宇，1期生周士第、曹渊、许继慎、董朗、2期生卢德铭等，分别担任团参谋长和营连长。第34团后改称第4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

共产党人不仅是黄埔军队中的骨干，更是战场上的先锋，为广东战争、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有关资料显示，阵亡牺牲的黄埔学生：第一次东征牺牲16人，讨伐杨刘在猎德渡河牺牲6人，沙基惨案牺牲23人；第二次东征牺牲58人。这些人里面许多是共产党员，如叶魂龙、章琰、樊嵩华、曹石泉、文起代、皮言智、刘著禄、谭鹿鸣、唐同德等。在北伐中牺牲的共产党员有胡焕文、吴兆生、曹渊、张其雄、赵柏、赵子俊、郭俊、金佛庄、蒋先云等。在此前后牺牲的还有茅延桢、张隐韬等。目前所能辨认的1927年夏季前阵亡牺牲的黄埔生约有50多人。

在近代中国几所军事名校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保定军校的课堂，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军校的战场，说明战场是黄埔军校的“特色课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黄埔办学的主要经验所在。牺牲于战场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一腔热血赢来胜利，也为黄埔成功办学开辟了道路。

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军事、政治教育，并经受过工农革命运动的激荡和东征北伐战争的洗礼，出自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文武兼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参加三大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江精卫集团的背叛，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三大起义。周恩来、陈毅、恽代英、郭沫若、周士第、许继慎、陈赓、周逸群、林彪等大批黄埔教官和学生先后奔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2期生卢德铭在秋收起义中担任军事总指挥，参加秋收起义的有2期生余洒度，3期生朱云卿，4期生陈毅安、伍中豪等。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徐向前、赵自选、洪水、王侃予、陶铸等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中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中，有许多是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

在全国各地投入创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1期生董朗率部退至东江（中洞），改编为红2师；随后，1期生徐向前，4期生叶镛、袁国平等率广州起义部队也到达东江，改编为红4师。两支部队会合于东江，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开



/ 刘志丹、唐澍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地点——华县高塘镇。

创东江革命根据地。此后，在海南岛、井冈山、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以至陕甘的红色根据地，到处都活动着来自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

在各路红军、各地工农武装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不少也是黄埔教官或学生担任，如：红1军军长许继慎（1期），政治部主任熊受暄（3期）；红3军军长黄公略（黄埔高级班），政治部主任鲁易（政治部副主任）；红4军军长王良（武汉分校），参谋长董朗（1期）、黄鳌（1期）；红5军军长萧人鹄（2期）；红6军军长孙一中（1期）、段德昌（4期），政委周逸群（2期），政治部主任毛泽覃（政治部科员）；红7军李隆光（1期）、冯达飞（1期）；红8军军长李天柱（4期）；红9军（闽西）军长邓毅刚（3期）；红10军军长周建屏（4期），参谋长彭干

臣（1期）；红11军军长吴光浩（3期）；红12军军长伍中豪（4期）；红13军军长胡公冕（1期卫兵司令）；红14军军长何昆（4期），政委李超时（武汉分校）；红15军军长李青云（武汉分校教官）；红21军军长刘畴西（1期）；红15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等等。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李汉藩、廖乾五、李鸣珂、杨宁、李运昌、萧人鹄、陶铸、黄鳌、彭干臣等担任过各省的省委军委书记。陆更夫、李运昌、陶铸、王懋庭等担任过省委（省工委）书记。

在隐秘战线开展斗争。主要有陈赓、霍步青、傅维玉（临时中央军委书记）、王世英（上海局军委情报站长，北方局情报部长）、宣侠父（上海特科负责人）等。

此外、周恩来、白海风、陈治平、王懋廷、王备、曾中生、胡步三、卜士奇等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据粗略统计，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约有200多名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牺牲。

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黄埔军校4期生赵尚志、区队长崔庸健、武汉分校女生等高举抗日大旗，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抗击日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分道扬镳10年的黄埔教官和学生，走上共同抗日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出自黄埔军校的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林彪任115师师长，聂荣臻任115师副师长；徐向前任129师副师长，陈赓任386旅旅长；周士第任120师参谋长。八路军中的黄埔教官、学生还有陈奇涵、萧克、郭化若、李运昌、王世英、倪志亮、许光达、宋时轮、张宗逊、罗瑞卿、郭天民、程子华、陈伯钧、王诤、莫文骅、杨至成、唐天际等。在新四军的领导人中，项英、陈毅、袁国平、冯达飞等也出自黄埔军校。1941年9月，黄埔军校同学

会延安分会成立时，媒体报道有100多人。1937年9月，林彪、聂荣臻于平型关首战告捷，取得了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日军的第一个大胜利。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开创了一片抗战新局面。1期生左权英勇牺牲于太行山上，是八路军为抗日捐躯职位最高的第一位将领。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周恩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辖3个厅的厅长均出自黄埔，三厅长郭沫若及随周到三厅工作的阳翰笙、尹伯休等，均为黄埔教官或学生。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任教育长（后为李默庵），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这个由黄埔军人主持的训练班，沿用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和教育训练方法，培养了大批抗日游击干部。

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帅。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埔教官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许多黄埔学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徐向前任华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罗瑞卿任华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阎揆要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程

子华任第四野战军兵团司令员，周士第任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参谋长，陈赓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5年授衔的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有5位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或学生，他们是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0名大将中有3位、57名上将中有9位出身于黄埔军校。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5期学生陶铸，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72年，第5期区队长崔庸健（朝鲜）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的33位无产阶级军事家，其中有16位是黄埔教官或学生。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在党员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有数以千计的党员进入黄埔军校，从事了多方面的建设性、开拓性的活动，特别是在思想建校、主义建军等方面，为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不容抹杀的贡献。出自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壮大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组成部分，是一页光彩夺目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中的黄埔军校师生

——建党百年华诞纪念早期中共军事骨干概览

□ 陈予欢

黄埔军校的产生与发展，为长期封闭的现代中国军事教育领域注入了先进的革命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军事技术知识。处于国民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推行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教育方针，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这些后来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正如专家所言：“把作战与教学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结合、军事与政治相结合，注重实用，着眼于提高学员的作战指挥能力，这些都是黄埔军校办学的基本特点。黄埔军校的这些办学特点，开创了我国军校教育的一个新时代。”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至1927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对于军事、军队、军校教

育的认识与掌握，也许会摸索更长时间。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最初认识军事与日后掌握军队之摇篮与发祥地。广大黄埔师生从入校的那一天开始，就投入到为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之际，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烈中的黄埔军校师生汇总于此，以示祭奠和缅怀。（以下名单尽可能不重复，以参与其中的重大战役或事件为序）：

第一、二次东征及广东诸役中的黄埔英烈

徐 坚（1890—1930），黄埔军校第1期特别官佐，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4团党代表；义明道（1904—1925），第1期生，第一次东征时任排长；罗焕荣（1900—1927），第1期生，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员；洪剑雄（1899—1926），第1期生，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4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劳工（1901—1928），第2期生，任东征军海陆丰后方办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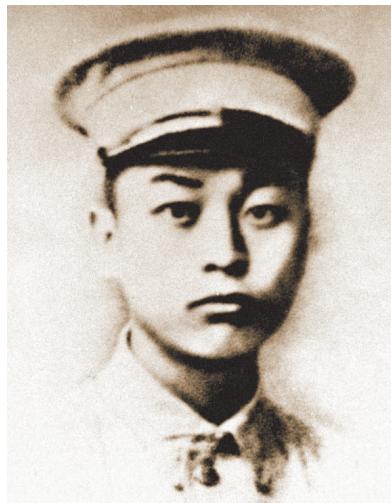


/徐坚。

主任；胡秉铎（1902—1927），第2期生，任东路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练国梁（1901—1927），第2期生，任北伐军第25师第75团第3营营长。

创建铁甲车队暨叶挺独立团的黄埔英烈

徐成章（1892—1928），黄埔军校特别官佐，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及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曹渊（1902—1926），第1期生，任叶挺独立团营长；赵世藩（1903—1927），第4期生，任叶挺独立团营长；龚培元（1900—1927），第4期生，任叶挺独立团连指导员；傅杰（1900—1939），第4期生，任叶挺独立团连长。



/ 曹渊。



/ 恽代英。

南昌起义中的黄埔英烈

董朗 (1899—1932)，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24师营长；彭干臣 (1899—1935)，第1期生，任起义军南昌卫戍司令兼政治委员；伍文生 (1901—1927)，第1期生，任起义军新编第20军第1师第1团政治指导员；邹范 (1900—1929)，第1期生，任起义军南下抚州时第71团参谋长；孙树成 (1902—1927)，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24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游步瀛 (1903—1927)，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参谋处处长；孙一中 (1904—1932)，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25师第75团第1营营长；蔡升熙 (1903—1932)，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24师参谋长；郭德昭 (1904—1927)，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20军第3师师部经理处处长；傅维钰 (1901—1932)，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20军第6团团

长；冷相佑 (1903—1927)，第1期生，任起义军第20军教导团第1营营长；杨溥泉 (1900—1927)，第1期生，任起义军新编师副团长；张堂坤 (1904—1927)，第2期生，任起义军第25师第73团第4连连长；萧人鹄 (1898—1932)，第2期生，任起义军第11军第24师独立团参谋长；宛旦平 (1900—1930)，第2期生，任起义军第25师第75团参谋长；申朝宗 (1903—1928)，第3期生，任起义军第11军第24师教导队副大队长；蔡晴川 (1903—1927)，第3期生，任起义军第25师第75团第3营营附、营长；胡灿 (1897—1932)，第3期生，任起义军第10师第30团第3营营长；周邦采 (1903—1928)，第3期生，任起义军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曹素民 (1901—1930)，第3期生，任起义军第20军营长；刘煜祖 (1905—1927)，第4期生，任起义军第11军第24师第71团代理

团长；林铎 (1904—1927)，第4期生，任起义军补充团团长兼党代表；赵嘲 (1904—1931)，第4期生，任第20军教导团第8队队长；萧以佐 (1907—1930)，第4期生，任中共兴国县委委员率农军参加起义；黄让三 (1902—1928)，第4期生，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工兵连副连长；裘古怀 (1902—1930)，第4期生，任起义军第24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魏亮生 (1904—1928)，第4期生，任起义军第20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

秋收起义中的黄埔英烈

卢德铭 (1905—1927)，第2期生，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程俊魁 (1901—1928)，第2期生，任中共赣南特委军委委员；王富生 (1903—1927)，第3期入伍生，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炮兵队队长；伍中豪 (1903—1929)，第4期生，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第3营营长。

广州起义中的黄埔英烈

恽代英 (1895—1931)，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秘书长；赵自选 (1901—1928)，第1期生，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训练总队长兼总教官；黄锦辉 (1903—1928)，第1期生，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及中共广州市委军委书



/ 陈毅安。



/ 卢德铭。



/ 叶镛。

记；吴展（1899—1933），任黄埔军校特务营营长；唐震（1904—1928），第1期生，参加广州起义军攻打省会公安局；陈恭（1905—1928），第2期生，起义时任总指挥部副官长；贺维中（1904—1928），第3期生，在总指挥部工作；符节（1899—1928），第3期生；焦启铠（1905—1932），第3期生；魏定邦（1901—1928），第3期生；陆更夫（1906—1933），第4期生，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参谋长及中共两广省委书记；叶镛（1899—1928），第4期生，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师长；王侃予（1900—1928），第4期生，随黄埔军校特务营参加起义；缪芸人（1906—1930），第4期生，任黄埔军校特务营副连长；曾干庭（1903—1928），第5期生，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委员兼工人纠察队军训总教官；郭成荣（1906—

1930），第4期入伍生，任警卫营排长；游曦（1908—1927），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任教导团班长；唐维（1903—1928），第6期生，任红军第4师党委书记；张鸿沉（1904—1930），黄埔军校科员，任蒋先云团营政治指导员；王诚意（1904—1928），第6期生，随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参加起义；向镇藩（1908—1927），第5期生，随黄埔军校教导营参加起义；尹沛霖（1903—1927），黄埔军校入伍生，随黄埔军校教导营参加起义。

参加湘南起义的黄埔先烈

邝墉（1897—1928），第2期生，任红4军第34团团长；刘之志（1900—1929），第3期生，参加湘南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7师参谋长；陈毅安（1905—1930），第4期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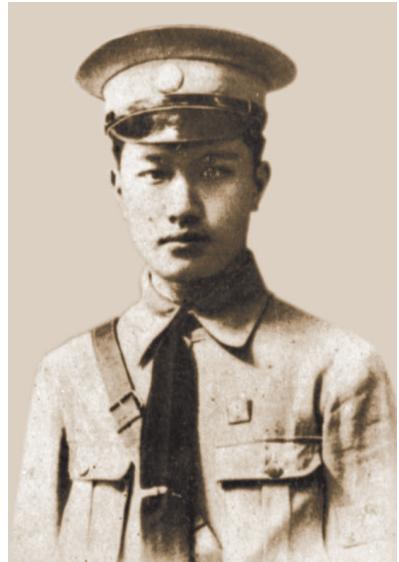
后任红军第5军参谋长；邓毅刚（1904—1932），第4期生，任红军第9军军长；王良（1905—1932），第5期生，参加湘南起义后任红4军军长；陈俊（1903—1930），第3期生，参加起义后任红4军第29团参谋长；谭衷（1900—1929），第2期入伍生，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科长；刘铁超（1899—1932），第2期入伍生，参加湘南起义后任红军第20军军长；游端轩（1903—1934），第6期生，参加湘南起义后任红军第12军军长、红军第19军军长。

井冈山斗争中的黄埔英烈

王尔琢（1903—1928），第1期生，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是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斗争主要领导者之一；吴振民（1899—1927），第2期生，率领农军在湖南汝城成立湖南



/ 黄公略。



/ 王尔琢。

工农革命军第2师任副师长，中共湖南省委军委委员；朱云卿（1907—1931），第3期生，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参谋长；张歲（威）（1903—1929），任红4军军部独立营营长留守井冈山；蒙九龄（1903—1928），第3期生，任红4军第10师第30团团长；萧劲（1904—1930），第3期入伍生，任红4军第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陈俊（1904—1930），第3期入伍生，任红4军第29团第3营党代表、营长；李天柱（1899—1935），第4期生，任红4军第11师第31团第3营第8连连长、第29团营长；王展程（1902—1929），第4期生，任红4军第28团第2营营长、代理团参谋长；陈鹏（1905—1928），第4期生，任红4军第11师第33团第3营副营长；贺国中（1905—1929），第5期生，任红5军第30团第2大

队大队长；徐彦刚（1907—1935），第6期生，任工农革命军第32团第2营营长；游雪程（1903—1930），第6期生，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政治部主任。

参与创建红一方面军及江西中央根据地的黄埔英烈

黄公略（1898—1931），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任红军第6军军长；何章杰（1896—1930），第1期生，任红军第3军团第8军第3纵队纵队长；陈启科（1906—1930），第1期生，任红军第3军团参谋长；贺声洋（1905—1931），第1期生，任闽西红军新编第12军代理军长；邓萍（1908—1935），第6期生，任红军第5军参谋长及红3军团参谋长；李萼（1907—1934），第4期生，任红军第8军第1纵队纵队长；林野（1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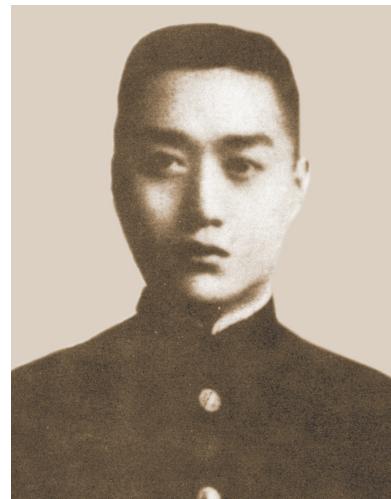
1934），第4期生，任红1军团第12军参谋长；郭子明（1899—1936），第4期生，任湘鄂赣红军第16军政治部主任及湘鄂赣军区参谋长；李青云（1903—1934），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任红军第5军团第129团团长、红军第43师师长、红军第15军军长；李云贵（1902—1930），潮州分校第2期生，任红4军第4纵队第7支队党代表；张赤男（1906—1932），第6期生，任红4军第12师政委；张希尧（1906—1932），第6期生，任闽西红军第三路军总指挥；胡灿（1895—1932），第2期入伍生，任赣南红军第25纵队参谋长；蓝广孚（1902—1929），第4期生，任红军第19纵队司令员；陈铁生（1905—1935），第5期生，任红军第64师政治部主任；赵世嘉（1904—1931），第5期生，任宁都苏维埃政府独立第3团政委；石衡钟（1905—1931），第4期生，任红军第8军第2纵队政委及红8军第2师政委；钟纬剑（1907—1935），第3期生，任军委纵队参谋长及红3军团第5师参谋长；何昆（1898—1929），第4期生，湖南永兴人，任红军第14军军长；张锡龙（1906—1933），第6期生，任红军第5军团第13军参谋长及红军第7军军长。

参与创建红二方面军及湘鄂西、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的黄埔英烈

周逸群(1896—1931)，第2期生，任红6军政委及红2军团政委；鲁易(1897—1932)，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任湘鄂西红军第3军政治部主任；曾中生(1900—1935)，第4期生，任中共鄂豫皖特区委员会书记及鄂豫皖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段德昌(1904—1933)，第4期生，任红2军团第6军政委副军长，湘鄂西红军第6军军长；黄鳌(1902—1928)，第1期生，任湘鄂西工农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孙一中(1904—1932)，第1期生，任鄂西洪湖红6军军长；唐赤英(1903—1932)，第4期生，任湘鄂西军委参谋长及红3军参谋长；谭侃(1900—1931)，第2期生，任红2军团第6军第16师第48团政委；汤慕禹(1903—1932)，第4期生，任湘鄂西红2军团参谋长及红军第6军军长；凌霄(1905—1935)，第4期生，任红军第34师副师长；蒋一峰(1904—1931)，第6期生，任中共永城县委书记；李明铨(1906—1932)，第5期生，任房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独立团团长；戴补天(1901—1932)，第6期生，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及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彭之玉(1902—1932)，第6期生，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常委兼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周为邦(1895—1928)，第3期生，任中共鄂东特委军委书记及鄂东游击队司令员；刘德全(1901—1932)，第6期生，任红军第9军第26师第78团团长；黄克佐(1898—1932)，第4期生，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及红2军团红3军参谋长；唐赤英(1903—1933)，第3期生，任红3军代政委及湘鄂西军委参谋长；冉少波(1903—1935)，第6期生，任红军黔东独立师副师长。



/ 许继慎。



/ 周逸群。

参与创建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陕边区根据地的黄埔英烈

蔡升熙(1906—1932)，第1期生，任红军第15军军长及红军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许继慎(1901—1931)，任鄂豫皖边区红军第1军军长；曾中生(1900—1935)，第4期生，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郭炳(1905—1932)，第4期生，任鄂豫皖边区红军第1军副师长；段祺(1906—1932)，第4期生，任红四方面军第86团团长；李坦(1903—1932)，第6期生，任红军第10军政委；周维炯(1908—1931)，第6期生，任红4军第11师师长；胡祥仁(1901—1932)，黄埔军校入伍生，任霍山县游击师师长；桂仲景(1907—1930)，第4期入伍生，任中共桐柏县委书记及红军第9军第25师第1大队中队长；金孚光(1907—1931)，第4期生，任中共桐柏县委书记及红15军第1团团长；萧芳(1905—1931)，第4期生，任皖西红军教导师师长；尚攸如(1905—1928)，第6期生，任豫南工农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易宗邦(1898—1932)，第6期生，任中共商城县委书记，罗山县委书记；李惠民(1906—1929)，第6期生，任中共商城县委书记；陈子藩(1909—1934)，第3期入伍生，任中共新蔡县委书记；范陀(1901—1931)，第6期生，任鄂豫皖红1军红1师参谋主任；徐宝珊(1903—1935)，第6期生，任红4军第12师副师长。



/ 刘畴西。

期生，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及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熊受暄（1903—1931），第3期生，任鄂豫皖红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金仁宣（1901—1932），第1期生，任中共英山县委书记；姜镜堂（1902—1932），第3期生，任红军第12师政委及中共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军委分会主席；姚家芳（1900—1933），第5期生，任鄂豫皖红军第74师师长；李载浦（1896—1933），第6期生，任红四方面军川东独立第1师政治部主任；唐伯壮（1899—1929），武汉分校科员，任四川工农红军川东游击队第一路党代表；张鹏翥（1902—1930），第5期生，任中共宣（汉）达（县）城（口）万（县）四县行动委员会委员及第3支队支队长。

参与创建广东东江红11军及根据

地、琼崖红军及根据地的黄埔英烈

董朗（1899—1932），第1期生，任广东海陆丰工农革命军第2师师长兼第4团团长，中共东江特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陈永芹（1899—1927），第3期生，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及琼崖工农讨逆军前敌总司令，琼崖红军及早期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梁锡祜（1903—1941），第1期生，任广东东江工农红军第11军参谋长；吴振民（1898—1927），第2期生，工农革命军第2师副师长；李振亚（1908—1948），南宁分校第2期生，任琼崖纵队第1副司令员；刘光夏（1904—1930），潮州分校第2期生，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及东江红军第50团团长；严凤仪（1896—1931），黄埔军校第1期第4队副队长，任琼崖红军中路总指挥。

参与创建陕北、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的黄埔英烈

唐澍（1903—1928），第1期生，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书记，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及游击第1支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1906—1934），第1期生，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及陕甘边工农红军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1903—1936），第4期生，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红军第28军军长；荣洁义（1907—1932），

第4期生，任陕甘宁游击队指导员。

参与创建赣东北红军及根据地的黄埔英烈

刘畴西（1897—1935），第1期生，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军第10军军长；邹琦（1905—1935），第5期生，任闽北红军独立师政委及赣东北省军区参谋长；萧韶（1903—1934），第4期生，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及中共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曹仰山（1907—1935），黄埔军校第三分校（长沙分校）学员，任闽浙赣红军第五分校教育长及红军第10军团参谋长；徐德（1904—1935），第4期生，任江西赣东北红军师长；罗英（1898—1934），第2期生，任赣东北红军第10军独立团政委及赣东北红军学校（第五）分校副校长；张源健（1903—1928），第2期生，任赣北工农红军游击队大队长。

参与龙州、百色起义及创建左右江红军的黄埔英烈

李隆光（1900—1931），第1期生，红军第7军前敌委员及第20师师长；宛旦平（1900—1930），第4期生，任红军第8军参谋长兼第2纵队司令员；唐克（1903—1930），第3期入伍生，参加龙州起义任红8军军事政治学校大队长；刘健（1899—1930），

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学员，参加广西百色起义并任红军第7军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甘湛泽(1906—1930)，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学员，参加龙州起义任红军第8军总参议兼军政学校校长；何子初(1905—1930)，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1期学员，参加百色起义任红军第7军团长；何昆(1903—1931)，原名以昂，广西万承(今大新)人，壮族，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学员，在广西教导总队参加百色起义；苏松甲(1906—1938)，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学员，参加龙州起义任红军第8军军部副官；唐浚(1896—1934)，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学员，参加龙州起义任红军第8军参谋处处长；黄饵日(1902—1934)，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学员，参加百色起义任红7军军团长。

参与创建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黄埔英烈

左权(1905—1942)，第1期生，任太行山八路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袁国平(1906—1941)，第4期生，任新编第4军政治部主任；冯达飞(1899—1942)，第1期生，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谢光亚(1905—1943)，第3期生，新四军第4师第9旅第26团参谋长；赵振亚(1912—1942)，第13期生，



/熊雄。



/赵尚志。

任冀中军区第15大队参谋长及第23团团长；牛万全(1905—1940)，第4期生，任山西决死2纵队独立第2旅参谋长；谢鑫(1905—1947)，第4期生，任新四军第7师代理参谋长；朱程(1910—1943)，第6期生，任八路军晋察冀第一、五分区司令员；王明恕(1901—1940)，第3期生，任八路军参谋长、支队长、旅长；徐楚光(1909—1948)，第6期生，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参谋教官；钟蛟蟠(1899—1939)，第6期生，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宣传科科长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友清(1904—1942)，第6期生，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秘书长。

参与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黄埔英

烈

赵尚志(1908—1942)，第4期生，任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一曼(1905—1936)，武汉分校女生队，任东北抗联第3军第2团政委；杨林(1898—1936)，朝鲜人，黄埔军校教官，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是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李秋岳(1901—1936)，朝鲜人，武汉分校女生队，任延(寿)方(正)特别支部书记。

参与创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黄埔英烈

陈潭秋(1896—1943)，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中共满洲、福建省委书记；熊雄(1892—1927)，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及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党团书记；刘云(1904—1930)，第1期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军委参谋长；

蒋先云（1902—1927），第1期生，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江震寰（1904—1927），第1期生，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傅维钰（1901—1932），第1期生，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高文华（1908—1931），第3期生，重建中共无锡县委；郑足（1905—1927），第4期生，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中队长；冷启英（1901—1939），第6期生，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孙耀宗（1910—1931），第5期生，任中共淮盐特委军委书记；王屏周（1900—1930），黄埔军校入伍生，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曹素民（1901—1930），第3期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杭州市委书记；季步高（1906—1928），第4期生，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于以振（1904—1936），第4期生，任中共上海南市区委书记；刘淠西（1904—1932），第6期生，任中共怀宁安庆中心县委书记；陈平山（1904—1931），第5期生，任中共泉州特委军委书记；江德贤（1900—1930），第6期生，任中共泉州县委书记；田泗（1902—1929），第5期生，任中共山东省委军事特派员；褚方珍（1902—1939），第6期生，任中共寿光中心县委书记；王寅生（1905—1928），第4期生，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周邦采（1902—1928），第3期生，任中共中央长



/ 赵一曼。

江局军事特派员；黄文庆（1905—1931），第4期生，任中共新野县委书记；杨松柏（1901—1931），第6期生，任中共洛阳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李鸣岐（1905—1931），第4期生，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亚声（1903—1930），黄埔军校政治训练班学员，任中共谷城县委书记及中共汉口区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李兆龙（1898—1928），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任中共石首中心县委书记；陈香波（1900—1930），第6期生，任中共江陵县委书记；魏亮生（1904—1928），第4期生，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毛简青（1891—1931），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胡筠（1898—1934），第6期女生队毕业，任中共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委员；邱育之（1905—1931），黄埔军校第三分校（长沙分校）学员，任中共安乡县委书记；汪毅夫（1903—1932），第4期生，任鹤峰中心县委书记及红军第16团团长兼政委；王屋（1906—1932），第6期生，任中共长沙中心市委领导人；余少杰（1907—1927），第3期生，任中共广西恩（隆）奉（仪）特支书记及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孙成达（1905—1930），第2期入伍生，任中共琼崖特委候补委员、委员；陈致训（1903—1932），第4期入伍生，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霍粟如（1906—1930），第4期生，任中共彭水特支书记；张朝宜（1901—1928），第4期生，任中共华北区军委书记；霍步青（1902—1933），第4期生，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及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巡视员；陈云庵（1902—1935），第6期生，任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及万县县委书记；田伯谦（1898—1949），第5期生，1929年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刘道盛（1898—1931），第4期生，任中共上海市兵委书记；高伯礼（1896—1933），第4期生，任中共荣县县委书记及中共自贡中心县委书记；杨滔（1906—1930），第4期生，北伐战争后返回四川从事中共兵运工作；李鸣珂（1899—1930），第4期生，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向镇清（1908—1931），第6期生，曾在上

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刘自立（1905—1927），第6期生，参与领导玉田暴动后任京东工农革命军参谋长；黄子文（1906—1947），第6期生，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及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刘林圃（1903—1932），黄埔军校第三分校（长沙分校）学员，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军委书记、组织部部长。

参与创建国民党军内中共党组织的黄埔英烈

宣侠父（1899—1938），第1期生，任国民党第25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李之龙（1897—1928），第1期生，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及代理海军局局长；张隐韬（1902—1926），第1期生，建立中共党组织并任国民2军第4旅副旅长；麻植（1905—1927），第2期生，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蔡鸿猷（1897—1928），第2期生，任国民革命军连党代表；宋绮云（1904—1949），第6期生，任国民党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朱建国（1918—1948），第六分校15期生，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代理作战科长；刘冰（1906—1931），第6期生，任国民党军队兵运特派员；孙大安（1906—1932），第6期生，任第26路军第3师第17团少校团附兼第2营营长；郑宝钟（1907—

1930），第3期入伍生，任陆军第75师参谋处处长；阎普润（1906—1938），第4期生，任新编第20师中共地下军委书记及陆军第116师第498旅第995团团长；蓝文胜（1905—1933），第5期生，任南京宪兵第3团副官及中共南京地区特别支部书记；文绍珍（1908—1931），第4期生，被党组织派遣并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学习兼秘密做兵运工作；刘际舟（1904—1929），第4期生，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领导下从事国民党军兵运工作；陈志仁（1906—1928），第4期生，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组织股股长；杨法震（1905—1938），第6期生，入杨虎城部做中共地方工作并任杨部第17师第102团副团长；朱亮（1918—1949），第10期步兵科学员，任甘肃省保安第4团第2营少校营长，秘密策动所部起义。

参考资料：

1. 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毛泽东选集》。
2. 麝振玉主编，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中国军事学术史》。
3. 范宝俊、朱建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组织编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中华英烈大辞典》。
4. 姚仁隽编，长征出版社1987
- 1930），第3期入伍生，任陆军第75师参谋处处长；阎普润（1906—1938），第4期生，任新编第20师中共地下军委书记及陆军第116师第498旅第995团团长；蓝文胜（1905—1933），第5期生，任南京宪兵第3团副官及中共南京地区特别支部书记；文绍珍（1908—1931），第4期生，被党组织派遣并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学习兼秘密做兵运工作；刘际舟（1904—1929），第4期生，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领导下从事国民党军兵运工作；陈志仁（1906—1928），第4期生，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组织股股长；杨法震（1905—1938），第6期生，入杨虎城部做中共地方工作并任杨部第17师第102团副团长；朱亮（1918—1949），第10期步兵科学员，任甘肃省保安第4团第2营少校营长，秘密策动所部起义。
5.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
6. 余伯流、陈钢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7. 王健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朱毛红军”历史追踪》。
8. 王健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国红军人物志》。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纂，红旗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
10. 姚仁隽、孙陆、殷春元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中华现代英烈丰碑大典》。
11. 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黄靖



/李之龙。

年7月出版《南昌、秋收、广州起义人名录》。

5.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

6. 余伯流、陈钢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7. 王健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朱毛红军”历史追踪》。

8. 王健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国红军人物志》。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
理部编纂，红旗出版社2001年6月
出版《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

10. 姚仁隽、孙陆、殷春元主
编，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中华现代英烈丰碑大典》。

11. 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
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中国共产党
人名大辞典》。黄靖

浅谈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当代价值

□ 张静生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承载着古圣先贤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思想智慧，蕴含着极为丰富厚重的修己达人、治国理政思想资源，为解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种种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其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沛然不衰，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内涵，发掘其深邃的文化价值，做到“古为今用”，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一统”思想的由来及形成

“大一统”思想是一种天下

一体的共同体观念，最初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据资料记载，华夏民族居住地区从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建立时起，就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和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延续了夏代奠定的统一格局。西周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土地和劳动者名义上都归周王所有，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周王分封自己的功臣、周室宗亲等人到东方，按照规定下一级需对上一级承担缴纳贡物、服劳役、军事保卫和述职等义务，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格局。

“大一统”涵有天文历法等时空观的传统认知与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四方向中心集聚的价值取向，周王所在地叫做王畿，是中央政权，由中心向外划分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层次，当时叫做五服，

到最外一个层次就是少数民族蛮夷戎狄，他们住在外头，所以叫做“内诸夏而外夷狄”。因此，“大一统”的本义就是以周朝天子为核心，通过宗法分封制、井田制等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同时，周朝统治者施以周礼，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天下，“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成康之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西周建立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文化、伦理、权力、利益等方式与周边政权构成的一个尊卑有序的共同体。

西周初年实行“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后，封君、诸侯离开王畿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相较于狭小的渭水流域，东部广阔的黄土平原更有利于发展。200多年后，周平王东迁至洛阳，从此历史进入了东周（公元前770—前256）时期。此时周室衰微，周天子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东部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更为强盛的诸侯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先

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各国纷纷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开始了称王称帝、争夺正统的兼并战争。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始称皇帝，废除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王权、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策措施。西汉王朝（公元前202—公元8）建立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纳了西汉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汉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出现了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特征的汉朝模式，自此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国家正式形成。由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与历代儒士的大力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与主流思想。

二、“大一统”思想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影响。

首先，“大一统”思想在文化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周王分封天下建立周朝国家后，周天子所在的京畿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中国”即出于此。中国

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国宝级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意思是居住在中国（中央）这个地方。周武王灭商以后告祭天下，以成周（今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何尊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在中国以外则称为四夷，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国或中原作为天下的中心，最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不仅在地理层面是天下的中心，而且在文化上也是文明高地。《春秋·左传·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大一统”重视文明的同一性，不固守狭隘的民族、种族划分。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说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区分“夷狄”和“诸夏”。“大一统”思想推崇的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在西周实行分封扩张的过程中，以及在后来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吸纳融合了许多民族和种族。到汉朝时，“汉人”本身就已是诸多民族和种族的融合体。在“汉人”的称呼出现之后，又有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当地人融合，其中的一部分融入了汉族，他们用汉字，穿

汉服，改汉姓，成为了“汉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等许多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这些民族因为认同、接受了中华文化，自然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第二，“大一统”在地理上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大一统”的人文范围一样，其地理范围也随着各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而不断扩大。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谓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总的趋势是统一，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后的再次统一随着中华文化圈的扩大，其活动范围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先秦时代人们认同的“中国”的范围，只是周王朝统治的中原区域。秦国统一便是从统一中原开始的，通过“远交近攻”，先征服黄河流域的韩、赵、魏，再以此为基础向南方和北方扩展。之后统一了广袤的楚国以及北方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最终四海归于一统。秦统一以后迁徙7种共50万身份低下的或者犯了罪的人，到岭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谪”，把中国南方的国土一直推展到南海边上，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了“凿空”拓荒西域的壮举。又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出匈奴。汉宣帝神爵二年（公

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府，统辖西域36国，汉帝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东汉(25—220)末年豪强割据，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后进入了南北朝(420—589)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随后统一的隋(581—618)唐(618—907)王朝大大扩展并巩固了中国疆域的范围，唐太宗被各少数民族政权拥戴，称为“天可汗”。唐朝盛期仿西汉体制，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辖中国的边疆地区，使“大一统”的范围趋于稳定。唐朝灭亡后，原唐帝国疆域内的中国又陷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直至元朝(1271—1368)在1297年最终统一中国，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设立澎湖巡检司等，正式将台湾等纳入行政管理范围，使元朝的疆域比唐朝又有所扩展。以后的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朝，继承了元帝国的大部分统治区域，同时通过设置奴儿干都司、实行“改土归流”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统一管理，基本确立了今天的中国的版图。

第三，“大一统”思想在政治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强调天下统一于王权，孔子所憧憬的是“天下有道”的“大一统”社会，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

氏》)，强调统一的重要，“大一统”观念也作为一种理性的自觉逐渐深入国人心中。秦灭六国后，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绝对皇权专制制度，不立尺土之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真正做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在理论上对“大一统”政权的存在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给予了证明，标志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的定型和成熟。特别是秦汉时代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现实，中华民族更认同国家的统一，支持国家的统一，历代开国君主都赋予“天下统一”以最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政权，凡占据中原的都以统一四海为己任。凡偏安一方者，都以入主中原为目标。南宋虽位居中国半壁江山，国都只能冠以“临安”，以待日后回归中原。南宋词人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渗入血液的追求国家统一的思维定式，使“诸夏之领域”不断由分裂走向统一。因此占有中原，不仅占据了“中华”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更是在文化、精神乃至道德层面占据了中华一统江山的正统地位，由此更大范围的国家统一顺势而生。

三、“大一统”思想对于国家统一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在世界古代文明国家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先后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中华文明成功克服各种考验和挑战，旧邦新命，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其中，不能不说包括大一统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读史明志，对于当代国家的治理，从“大一统”思想当中我们可以获得有益的镜鉴。

第一，必须牢固树立追求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统一的思想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基因。难怪乎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点。”“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能蹂躏了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中华

民族一致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无不盼望着国家的统一和安乐的生活，祈求“国泰民安”。统一从来就是历史大势，是王道，也是正道；分裂从来就是邪道，是逆流，是绝路。在维护统一与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凡是高举统一旗帜的，不仅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而且牢牢占据着中国人精神与道德的制高点。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把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作为一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他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孙中山高举统一的国民革命旗帜，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与拥护。其原因正如中山先生所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台湾问题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产物和国共内战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全民族的最高利益。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

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祖国大陆以最大耐心最大诚意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进而形成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这是纵贯几千年“大一统”思想在当代的体现，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论是曾经的国民党当局还是执政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抑或是“港独”“藏独”“三股势力”，一旦违背天理、违背民心、违背历史潮流，搞偏安一隅或是分裂祖国，注定要被人民所抛弃，被历史所淘汰。

第二，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放眼世界历史，许多民族创造的文明，如美洲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在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之后，由于缺乏民族凝聚力而消亡。但中华民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包括瘟疫、灾荒、洪水、战争等等，都能够战胜困难，浴火重生，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

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可以说，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现象，其中元朝、清朝两次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现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是空前的，这种历史国情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没有一个所谓边缘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且延续中原的政权及其思想体系。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究其原因，我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始终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大一统”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

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

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历史长河中凝聚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了根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兼收并蓄，特别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推动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的根本，各民族紧密团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优势和根本保证。

“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日子” 主题征文启事

自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以来，各省区市广大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工作人员，遵循“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在各自的岗位上，热心为黄埔同学服务，在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与黄埔同学结下了深厚感情，在与众多黄埔同学的交往过程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为记录黄埔军校同学会发展历程、展现广大黄埔同学精神风貌、总结同学会工作经验，《黄埔》杂志社特开展“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日子”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广大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工作人员征集稿件，征文内容包括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期间经历的事件、接触的人物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等。要求讲

具体人物，具体事情，具体过程，具有故事性、可读性。征文字数不限，每文最好配数幅图片。

投稿时请注明作者的姓名、身份、电话、地址、邮编、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电子信箱：hpzzs88@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杂志社

邮编：100075

电话：010-58336325、010-58336358

联系人：陆东红

三尺讲台内外的西藏教育变迁

——西藏和平解放70年纪实

□ 杨程晨

嘎玛桑培顿珠是高三年级学生，在西藏那曲比如县度过漫长的寒假后返校。3月，开学不到一周，他逐渐从在家的放松状态进入到学习状态。嘎玛桑培顿珠格外向往外面的世界，2019年，他曾前往甘肃兰州参加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而当下，嘎玛桑培顿珠最重要的任务是备战2021年高考，争取考上师范学校、去内地“见世面”，进而回到西藏“帮助更多年轻学子”。

嘎玛桑培顿珠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西藏万千莘莘学子的缩影。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大量资金投向教育领域，把知识播洒在雪域高原，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从少数人的特权

到全体公民充分享有的权利

旧西藏，教育被作为一种特权，由寺院僧侣和贵族上层所垄断，百万农奴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



/ 西藏拉萨当雄县龙仁乡中心小学学生正在上音乐课。(何蓬磊 摄)

文盲占西藏总人口的95%。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现代化学校，实行现代教育制度，赋予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尤其在自治区成立后，西藏进一步明确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70年来，国家不断在西藏加大教育投入，扩大办学规模和层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根据自治区教育厅数据，201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投入西藏达到283.76亿元，10年累计投入1656.89亿元，年均增幅17.96%。

巨额投入为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资金支持，也使各族人民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到2018年，西藏学前教育毛入学率70.87%，小学净入学率99.5%，初中、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99.5%、82.3%、39.2%，人均受教育年限9.55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与70年前形成鲜明对比。

西藏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



/ 2007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浪卡子县中学学生在语音室内上英语课。（张学军 摄）

学校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藏语文教学更是高度重视，建立起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各类教育相互衔接的现代“双语”教学体系。目前，自治区所有学校均实行“双语”教育，超过96%的学生接受“双语”教育。也因此，藏语言文字得到广泛普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得以传承和弘扬。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来自阿里地区的央吉现在拉萨读高中，从班里成绩垫底到同侪之中最有希望考取一流大学，央吉花了三年时间。从偏远的阿里走到拉萨，是为了就读更优质的学校，希望赴内地读大学是为了把更多知识带回雪域高原。

央吉就读的高中名为阿里河北完全中学，从名字可以看出联合办学的背景。“考虑到阿里地区自然条件、交通、海拔等因素，在拉萨开办这所学校具有深远的意义。”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副校长安亚龙说，“教育作为阿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必须走在前列。”

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1951年，解放军在西藏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昌都小学开学。1958年，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成立，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为西藏在内地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1985年西藏大学建立，西藏高等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半个世纪以来，在解决学生“有学上”的同时，西藏把教

育摆在优先位置，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制定出台了系列教育惠民政策，着力解决了学生“愿上学”“能上学”“上好学”问题。

随着教育基本建设力度加大，学校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全区大部分中小学建有现代化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等；通过培养、培训、引进等形式，西藏不仅教师人数增长，而且教学工作更加细化。全区已建立起一支以藏族为主体、数量基本满足、结构和水平基本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队伍。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广泛应用，信息资源“班班通”和数字化校园建设覆盖到城镇、农牧区学校和部分教学点，全面带动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现代化。

从1985年开始，西藏对义务教育阶段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作为中央给予西藏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从2011年起，将符合条件的学前和高中阶段学生纳入“三包”政策实施范围，覆盖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三包”经费连续14次提高标准，2015年年均标准达到3000元，年受惠学生超过52万人。2007年起，西藏实施城镇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2009年，对中职学生免除学费和住宿费。2011年，对高中阶段学生实行免费教育。2012年，城镇学前实现免费教育。至此，西藏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

“‘三包’和免费教育让学
生家长零负担，家长都愿意送孩
子上学。”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乃
琼镇中心小学老师格桑说，“家
长只需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
的生活、学习全都不用操心。”

从满足基本需求到实现全面发展

“西藏面貌过去20年快速
转变，起因与核心是教育普及；
而破解当前高原经济社会发展
难题的题眼，也一定是回到教
育。”

西藏大学西藏经济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图登克珠1960
年代生于昌都，读书时来到林
芝，后考入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
(现西南大学)深造，毕业后执
起教鞭不再放下。忆及西藏今昔
数十年的鲜明对比，其感受最
深的是教育资源深入西藏，让每
个年轻人机会均等。

“我七八岁就开始给农奴
主干杂活，每天还要背农奴主
的孩子上下学，自己其实很想读
书。”回忆起往事，79岁的山南
市贡嘎县岗堆镇多丁村村民顿珠
旺杰满脸尽是遗憾和无奈。

顿珠旺杰是那个时代悲剧
的缩影。旧西藏广大农奴被剥夺
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
率不足2%，数量很少的学校也
只为贵族子弟服务。即使在1951
年，西藏地方政府官办学校也
只有大概20所，私塾约95所，在
校学生大约3000人。

从1951年昌都小学的成立，
到如今西藏大学3个一级学科获
得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西藏已
基本建立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
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现代民
族教育体系，一大批以藏族为主
体的各民族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1984年，根据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建设需要，针对西藏教
育落后、人才匮乏状况，国家作
出“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
西藏班”的重大决策。30多年过
去，内地办学已成为西藏教育的
补充形式和人才培养重要基地。

迄今，内地西藏班(含中职
班)累计招生14.3万人，为西藏
培养输送了5.6万余名中专以上各
级各类人才。1985年到2021年30
多年间，一批批西藏少年从青
藏高原来到内地，很多人毕业回
到家乡发挥才干，如今已成为各
行各业骨干力量。

2020年出版的《共进与赋
能——内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
述史》后记中，作者丹臻群



/ 西藏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化学课堂上,学生在认真做实验(张学军摄)

佩写到：一个政策，一本通知
书，十二三岁，二十多座城市，
三十五年春秋，十几万人……内
地西藏班的意义可能已经超过了
“异乡求学”本身，俨然成为几
代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孩子考上大学西藏家庭的
高兴程度，甚至不如中学时考上
内地西藏班。”图登克珠对比近
年在西藏就读的高中生与内地西
藏班学生，发现高考成绩已趋
接近，但他仍呼吁持续扩大内地
西藏班招生规模。“现在让孩
子到内地读书绝不仅为提升受教
育质量，最主要的是从小融入国
家大环境。”

70年来，西藏教育事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登克珠
同时指出，必须看到因长期政策
倾斜，一些西藏百姓存在依赖
政策扶贫的心理。要提升百姓自
我发展的能力，“问题又回到教
育上来”，要通过教育避免相当
一部分人返贫。董琳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1年4—5月

□ 吴亚明

4月

国台办批美“人权报告”：暴露美台勾连背后肮脏政治交易

美国国务院发布所谓“2020年国别人权报告”，指称中国大陆试图“以商业压力操控台湾媒体”。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日应询表示，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对这份充斥着谎言的所谓“人权报告”进行了驳斥。所谓“中国大陆以商业压力操控台湾媒体的言论”，完全是昧于事实的恶意捏造。

习近平向台湾列车出轨事故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2日，台铁太鲁阁号408次列车行驶至花莲清水隧道前方时撞上滑落铁轨上的工程车，造成200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台湾列车出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高度关切，并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海峡两岸同步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辛丑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4日在陕西延安黄陵桥山广场举行，今年的主题为“汇聚中华民族力量，开启伟大复兴新征程”。台湾地区同步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并进行两岸公祭视频连线直播。

外交部回应美涉台不当言论：“恐吓”“胁迫”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近日诬称中国在台海地区搞所谓“恐吓”“胁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头上。中国从来无意恐吓谁，但谁的恐吓也不怕；中国也不想胁迫谁，但谁的胁迫也没用。

专家：苏贞昌、游锡堃挑衅言论暴露“台独”政客自私自利本质

近期，苏贞昌、游锡堃频频在涉疆、涉港等议题上说三道四，打着“人权”“民主”等幌子肆意攻击抹黑大陆，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专家受访时指出，民进党“台独”政客罔顾台湾民生福祉，妄图操弄两岸议题转移焦点，严重损害台海和平，是危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祸害，充分暴露出他们自私自利的丑陋本质。

外交部敦促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日表示，所谓“美台交往指导方针”公然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接触，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现有水库蓄水量不足5%，台湾旱情冲击进一步显现

台湾数十年来罕见旱情仍在持续，有的水库蓄水量已不足5%，干旱给民生和经济带来的冲击进一步显现。

四川举办服务台胞台企专场对接会，“四川台资企业名品馆”助台企拓市场

由四川省台办、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主办的服务台胞台企专场对接会13日下午在四川成都举办，“四川台资企业名品馆”当日在线上开馆。据悉，“四川台资企业名品馆”是为在川台企量身打造的电商平台，将助力台资企业拓展大陆销售市场。

抗战遗址四行仓库成上海对台交流基地

坐落于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14日正式挂牌“上海市对台交流基地”，成为沪台深化交流交往的又一重要空间和载体。

各地启动在陆台胞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在大陆居住台胞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凭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医保参保凭证，在居住地登记接种疫苗。在校台湾师生则纳入当地疫苗接种工作统一安排。19日，广东省、上海市等地启动台胞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挑战联大2758号决议难逃失败末路

针对民进党当局勾连美国一些反华议员抛出所谓“台湾国际团结”议案，质疑、挑战联大2758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2日应询表

示，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反反复复在联大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企图推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挑战联大决议的权威性合法性，妄图为“台独”谬论背书。这终究是痴心妄想，难逃失败末路。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撕下所谓“缓和两岸关系”的面具

蔡英文及赖清德25日在所谓“海内外台湾国是会议”发表挑衅言论，声称要让“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6日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操弄和鼓噪谋“独”议题，大肆散播“台独”言论，进一步暴露了他们伪善意、真“台独”的本质，撕下了他们所谓“缓和两岸关系”的面具。

台胞台企服务站在厦门台商协会启用

27日，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正式启用福建首家设在台商协会内的台胞台企服务站。

国台办：在大陆居住台湾同胞踊跃报名接种疫苗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在大陆居住台湾同胞的疫苗接种工作启动后，各地台胞积极响应，踊跃报名，按自愿原则和同等待遇进行接种。

一季度大陆实际利用台资同比大增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应询表示，当前台商台企在大陆投资、发展保持稳定增长势头。据商务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大陆新设台资企业1195家，同比增长33.4%；实际利用台资3.3亿美元，同比增长29.9%。加上经第三地转投资，大

大陆新设台资企业1214家，同比增长32.4%；实际利用台资9.1亿美元，同比增长80.7%。

海峡两岸5G融媒体应用实验室在北京签约筹建

28日下午，海峡两岸5G融媒体应用实验室筹建签约仪式在北京举办。两岸各界代表50余人参加了签约仪式。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中国联通北京产业互联网运营中心与中国台湾网共同签订筹建协议，将为实验室功能开发提供理论和互联网技术支持。

台湾多个团体吁民进党当局尽快恢复两岸“小三通”

30日，台湾多个团体带领民众赴台湾方面陆委会办公场所前表达诉求，要求民进党当局尽快恢复两岸“小三通”，方便两岸民众往来，为金门、马祖和台湾经济注入活水。

5月

中国驻法使馆坚决反对法方通过涉台决议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7日就法国参议院通过涉台决议发表声明，以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台北举行“两岸重开机、疫后新契机”研讨会

“两岸重开机、疫后新契机”研讨会8日在台北举行。与会各界人士就重启两岸对话、台商把握“十四五”规划商机等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两岸及港澳青年会聚珠海共话大湾区新机遇

8日，“2021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年‘追梦华灿·圆梦珠海’创新创业交流会”在华灿工场珠海空间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近90位青年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珠青年融合发展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惯于打着“民主”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

针对蔡英文在今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再次标榜“民主”，散布“台独”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惯于打着“民主”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在岛内却不断打击异己、钳制言论，编织谎言、欺骗民众，有何资格谈“民主”！他们伙同外部势力和反华机构出演一出政治闹剧，充分暴露其谋“独”本性。这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福建发放首笔线上台胞创业担保贷款

为支持台湾青年赴闽创业，平潭农商银行通过福建省金融服务云平台，成功受理发放全省首笔台胞创业担保贷款，发放贷款金额20万元。据悉，目前除创业担保贷款外，福建省出台的纾困专项资金贷款、快服贷、外贸贷等一系列政策性优惠贷款，也均已向台胞台企开放。

国台办：落实落细“农林22条”，让更多台胞台企受益获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日应询表示，3月17日，“农林22条措施”出台，受到两岸各界关注和台胞台企广泛好评。各地区有关部门正全面推进落实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抓紧推动落实落细“农

林22条措施”，让更多台胞台企受益获利。

国台办：依法终身追责“台独”顽固分子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日应询表示，吴钊燮一再狂妄进行“台独”挑衅，恶意诋毁大陆，煽动两岸对立，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对这类“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严惩，依法终身追责。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破坏台湾民众获得就业信息的权利和发展机会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日应询表示，台湾同胞选择到大陆工作是他们的个人自由和正当权益。民进党当局煞费苦心横加阻挠，破坏台湾民众获得就业信息的权利和发展机会，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必将丧失人心。

湖南为台青赴湘就学就业创业搭建平台、提供机会

“逐梦未来·拥抱湘江”台湾青年招聘会暨台湾青年赴湘就学就业创业政策分享会14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台湾台东县同步设立分会场。本次活动旨在为台湾青年在湘就学就业创业搭建平台、提供机会。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莫在“台独”错误道路上滑向深渊

台湾陆委会13日再度发表谋“独”挑衅言论，妄称“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未来也不会是”。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4日应询表示，顽固宣扬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是徒劳的、危险的。奉劝

民进党当局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停止一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谋“独”言论和挑衅，不要在“台独”错误道路上滑向深渊。

两岸千名信众共祭保生大帝

一年一度的保生大帝圣驾巡安文化节16日在厦门海沧开幕。两岸的上千名保生大帝信众聚首厦门海沧沧江三都瑞青宫，共同祭祀保生大帝。

台湾两次发生大范围停电

13日，台湾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全台各县市共约400万户、1319万户次受影响。17日晚，台湾再次发生大范围停电，全台多个县市受影响。

台湾新冠疫情骤升，舆论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防疫不力

台湾新冠肺炎疫情骤然升温，17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攀升至333例，防疫形势日趋严峻。岛内舆论持续发声，批评民进党当局防疫不力是造成此次岛内疫情暴发的要因，呼吁当局“政治放一边，疫情摆中间”，加大普筛，并尽快从多个渠道获取疫苗。

第二十三届海交会创新设置金马澎馆

第四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暨第二十三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18日在福州启幕，共有境内外65个团组2400余名客商参展参会。其中，“两岸融合”元素突出，在传统展区基础上，创新设置了金马澎馆。

第八届“大江论坛”聚焦两岸同胞福祉与祖国统一进程

由台盟中央主办的第八届“大江论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精英论坛19日在北京举办。论坛以“立足两岸同胞福祉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就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深入交流探讨，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

台湾4月销往大陆订单同比增长逾4成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0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台湾企业销往大陆（含香港）的订单达146亿美元，同比增长40.5%。前四个月累计销往大陆（含香港）订单538.8亿美元，同比增长45.3%。

国台办：愿迅速安排让广大台胞有大陆疫苗可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应询表示，面对岛内日趋严峻的疫情和广大台胞不断承受的防疫压力，岛内一些团体和人士不断呼吁采购大陆疫苗，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愿意迅速作出安排，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有大陆疫苗可用。如果有需要，我们也愿意积极考虑向台湾派出疫情防控专家，与台湾医疗卫生人士分享抗疫经验，提供防疫咨询。

世界卫生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24日分别通过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挡是大陆疫苗输台

的最大政治障碍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6日应询表示，台湾防疫部门负责人利用不同借口阻止台湾同胞获取大陆疫苗，是大陆疫苗输台的最大政治障碍，更是对广大台胞尽快摆脱疫情困扰的最大政治障碍，受害者是广大台胞。

国台办评民进党当局五年作为：把台湾推向非常危险境地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6日应询指出，2016年5月以来，民进党当局否认“九二共识”，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他们的所作所为，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损害广大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只会把台湾推向非常危险的境地。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售台武器答记者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7日就美售台武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民进党当局勾结迎合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甚至幻想“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同胞带入灾难深渊。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挟洋自重、分裂国家的企图和行径都注定徒劳、必定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长三角两岸企业家溱湖论坛共商产业链融合创新发展

31日上午，以“链你我·创未来”为主题的长三角两岸企业家溱湖论坛在江苏泰州开幕。300余名两岸人士与会，围绕产业链融合和创新发展交流、探讨，推动两岸企业加强合作。黄埔

解码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 石稼

“尼米兹”号是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首舰，该舰是以美国海军名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的名字命名。尼米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太平洋战区的盟军总司令，主导对日作战，战后曾担任美国海军作战

部长。“尼米兹”号是继“企业”号之后的第2代核动力航空母舰，1968年开始建造，1975年正式进入美国海军服役，舷号CVN-68，当时造价约8.5亿美元。与美军最新装备的“福特”号航母相比，“尼米兹”级航母是当代

航母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全部由位于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船厂建造。

该级舰的诞生，标志着美国海军全面迈入核动力航母时代。在30多年的漫长时光中，共建造“尼米兹”级航母10艘，各舰规格和装备均有一些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批次，第一批次为“尼米兹”号(CVN-68)、“艾森豪威尔”号(CVN-69)和“卡尔文森”号(CVN-70)等3艘，第二批次为“罗斯福”号(CVN-71)、“林肯”号(CVN-72)、“华盛顿”号(CVN-73)、“斯坦尼斯”号(CVN-74)和“杜鲁门”号(CVN-75)等5艘，第三批次为“里根”号(CVN-76)和“布什”号(CVN-77)。美国海军对不同批次没有进行区分，统一归类为“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 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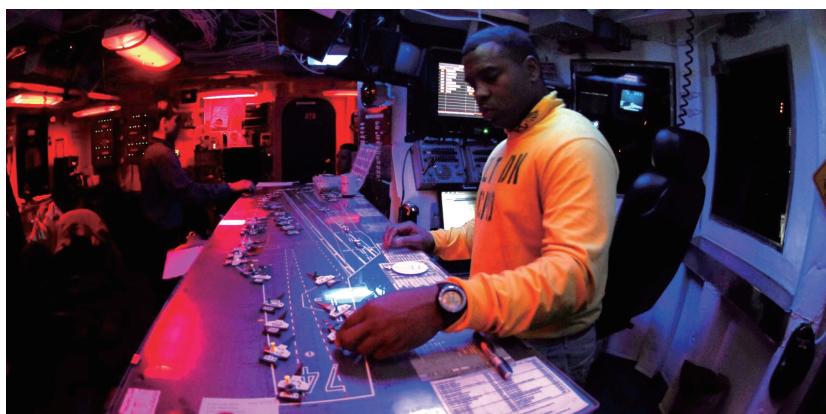
一、舰船结构

(一) 整体结构设计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舰体长332.8米，宽40.8米，标准排水量8.16万吨，满载排水量9.1487万吨，舰体结构主要采用HY-80高强度低合金钢，装甲结



/ “尼米兹”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弹药升降机。



/ “尼米兹”号航母飞行甲板指挥调度中心内景。

构主要采用 HY-100 超高强度低合金钢。该舰共有 12 层甲板，第 1 层是飞行甲板，第 2—4 层为机库甲板，上层甲板和底部外板采用纵骨架式结构，机库甲板以下采用水密结构。水线以下船体由 3 层底构成，设有 5 道纵向防雷舱壁，水下抗爆能力可达 545—681 公斤 TNT 炸药。舰内总共设有 23 道横向水密舱壁、10 道防火舱壁和 2000 多个水密舱室，装备

了先进的泡沫灭火系统、水泵系统和分区损管指挥系统。其中，水泵系统能在 20 分钟内将 15° 倾斜的船体恢复至水平状态。该舰延续了美式航母 2 个主弹药库的传统设计，分别布置在远离核反应堆和推进系统等重要舱室的区域，每个独立舱室均由强力箱型结构的装甲钢板保护。

“尼米兹”号可装载航空燃料 8600 吨，航空弹药 2970 吨，

极大提升了舰载机的持续作战能力。后续批次的“尼米兹”级航母在内部结构上不断进行改良和优化，采用了更先进的 HSLA-80 和 HSLA-100 高强度低合金钢，弹药库和作战指挥室等部位加装了凯夫拉复合装甲材料，尺寸和吨位不断增大。

(二) 飞行甲板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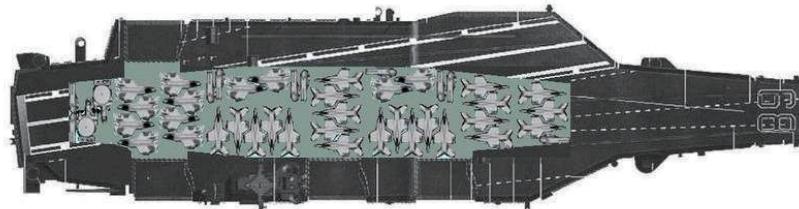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采用与“小鹰”级航母类似的封闭式斜角飞行甲板，左舷斜角角度由“小鹰”级的 11.3° 改为 9.5°，以减小舰载机受舰尾乱流的不利影响，从而提升舰载机降落的安全性。

该舰飞行甲板长 332.9 米，宽 76.8 米，斜角甲板长 237.7 米，共安装有 4 部 C-13-1 型蒸汽弹射器和 4 台 MK-7 型偏流板，其中两套安装在舰艏起飞弹射区，两套安装在斜角甲板前端，从而使舰载机弹射出动率可以达到每分钟 8 架次。

该舰在斜角甲板着舰区后部设有 4 道阻拦索和 1 道应急拦阻网，在舰艉左舷侧设有 MK6-2 型“菲涅尔”光学助降系统和着舰信号官平台 (LSO)，配合舰岛上的舰载机引导雷达和着舰制导雷达等先进电子设备，为舰载机着舰提供了全天候和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尼米兹”号飞行甲板分为降落区、起飞区、停机区和整备区等，其中，整备区



/ “尼米兹”号航母机库内景。



/ “尼米兹”号航母机库示意图。



/ 准备弹射起飞的 FA-18C 舰载战斗机。

由舰岛前后两侧的区域组成，舰岛前侧至舰艏弹射器之间均属于前侧整备区范围，直通飞行甲板

的3部弹药升降机均集中在这个区域，主要进行弹药补给作业。舰岛后侧整备区主要进行舰载

机油料补给和检修工作。“尼米兹”号航母能够搭载1个标准配置的舰载机联队，各型飞机总数在84架左右，特殊情况下可以搭载约100架舰载机进行作战行动。

（三）机库区域设计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机库采用密闭式结构，长208米，宽33米，高8.07米，总面积约6800平方米，比“企业”级增大300余平方米。

机库整体位于略偏船体右舷位置，左舷其余部分空间用于布置航空人员办公室、各类控制室和各层甲板通道等。机库前方是士兵住舱和锚链舱，机库后方是舰载机维修舱室。机库内可由2道防火舱壁分成3个独立的停机区域，机库内总共设有6个飞机加油站和多个整备区。该舰装备了4台舷侧式舰载机升降机，分别是左舷尾部1台和右舷3台，每台舰载机升降机平台长25.9米，宽15.9米，面积约372平方米，平台自重105吨，最大载重量47.6吨，能够同时运输2架舰载战斗机，升降机平台从飞行甲板至机库往返一次需耗时60秒左右。

“尼米兹”号航母全舰共有11台弹药升降机，但仅有3台能通向飞行甲板的整备区，其余弹药升降机均分布在各层甲板和机库内，每台弹药升降机最大载重4.5



/ F-18 舰载机从斜角甲板弹射起飞。



/ 拦阻着舰的 FA-18C 舰载战斗机。

吨，运行速度30米/分钟，性能较“小鹰”级有了较大提升。该舰为保证自身安全，采用弹药分段运输方式，所有弹药只能在飞行甲板的整备区才能挂载到飞机上。因此，弹药保障人员需要严格按照人工运输动线和规定操作流程进行弹药出库、引信组装、检查验收和分段转运，当弹药升降机将武器送上飞行甲板时，所有舰载机起降作业必须暂停，平

均每架舰载机完成加油、挂弹和检查作业需耗时2小时左右。

(四) 配套区域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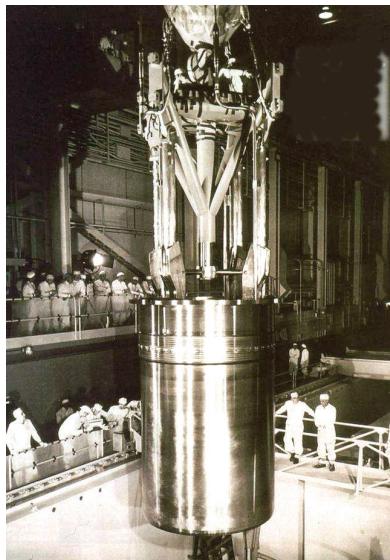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舰岛位于右舷侧中部略靠后位置，舰岛上设有编队指挥、航海指挥和飞行指挥等3层舰桥，全舰核心的作战指挥中心(CIC)则位于甲板下层。舰岛顶部前端安装有AN/SPS-48E三坐标对空搜索雷达的大型平板式天

线，顶部中间是一座搭载多型雷达天线的主桅杆。舰岛后方设有一座封闭式的独立桅杆，顶部安装了1部曲面框架式的AN/SPS-49(V5)远程对空搜索雷达天线，这与“企业”号航母将所有雷达天线集中布置在舰岛上层的设计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雷达之间的电磁互扰。随着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后期批次的“尼米兹”级则再次采用了舰岛集中式布置方案，取消了舰岛后方的独立桅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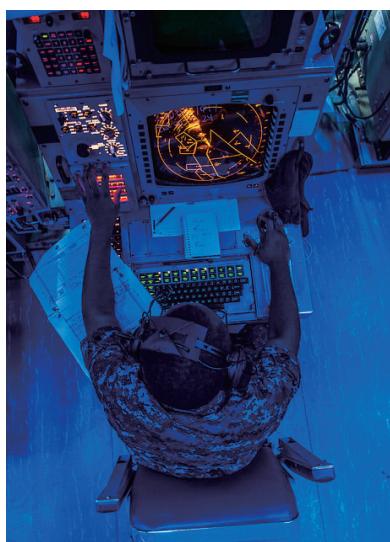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球鼻艏设计较小，在实际作战行动中，存在使用蒸汽弹射器导致舰艏纵摇下沉的情况，后续批次增加了球鼻艏的尺寸，进一步提升了舰艏浮力和稳定性，使得后续“尼米兹”级航母能够同时弹射3架舰载机。该舰生活舱面积比较紧凑，居住条件比较艰苦，每个士兵舱需要居住上百人，铺位均为3层结构，几乎没有个人物品空间，并且每个生活舱只能共用1个公共卫生间和浴室。作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海上城市”，“尼米兹”号航母设有厨房、餐厅、洗衣店、医院、教堂、广播站、电影厅、图书馆、邮局和理发店等配套设施，以满足近6000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二、动力系统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采



/ A4W 核反应堆。



/ “尼米兹”级航母 ACDS 作战指挥系统操作台位。

用了大型舰船典型的“四轴四桨两舵”方案，核动力装置为2座A4W压水反应堆和4台蒸汽轮机，相比“企业”号航母的8座A2W压水反应堆，节约出了更多的舰内空间用于存储航空燃油和航空弹药。A4W压水反应堆热效率为25.6%，每个反应堆为

2台蒸汽轮机提供高压蒸汽，每台燃气轮机负责驱动1个传动轴末端的螺旋桨，每个螺旋桨直径约6.4米，重约30吨。

该舰整个推进系统总功率为26万马力，最大航速30节，低于“企业”号28万马力和最大航速35节的指标，主要原因是更大功率的新型蒸汽弹射器对航母迎风高速运动的要求有所降低。为了防止压水反应堆故障，该舰还装备了4台应急柴油机，这种动力组合方案一直延续至后续的“福特”级航母。1998年，“尼米兹”号成为第一艘回厂进行中期综合大修（RCOH）的航空母舰，除服役13年后首次更换核燃料棒外，还对全舰舰体结构、指挥系统、武器系统、雷达系统和通信系统等进行了全面升级和改造，总共耗时33个月。后续批次“尼米兹”级改为每15年更换一次核燃料棒，并且都参照首舰“尼米兹”号的维护计划和改进方案确定了轮换进厂的时间节点。

三、船电装备

（一）指控系统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早期装备的指控系统信息化程度较低，主要包括海军战术资料系统（NTDS）和反潜目标鉴定分析系统（ASCAC）两个独立模块，仅能起到辅助作战指挥

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该舰在中期大修时加装了新一代的先进战斗指挥系统（ACDS），该系统是海军战术资料系统（NTDS）的全面升级版本，具有更大的海空监视范围和更多的目标融合能力，能够将各型雷达、电子、红外等探测系统的数据进行自动处理、航迹显示、目标识别和威胁判断，以更直观的图形显示方式为作战指挥人员提供信息支持。该系统在新的数据链技术基础上，具备强大的数据交互和分发能力，能够在航母战斗群内实现态势共享，能够与航母战斗群以外的上级和友邻单位进行数据交换。

紧急情况下，该舰还可以直接响应总统命令，并在1分钟内获得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授权。后续“尼米兹”级航母虽然中期大修的时间各不相同，但作战指控系统性能和功能均在不断升级完善，“里根”号（CVN-76）更是第一艘装备了整合指挥网络（ICAN）的航母，从而具备了对全舰所有系统联网实施集中管理的能力，以及组织实施信息化条件下“网络中心战”的能力。

（二）雷达系统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雷达系统由多型雷达组合而成，主要包括1部S波段的AN/SPS-48E三坐标对空雷达、1部AN/SPS-49（V5）型远程对空搜索



/ MK-15“密集阵”近程防御系统。



/ MK-31“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系统。

雷达、1部 SPS-67(V)型平面对海雷达、1部 SPS-64(V)型导航雷达、1部 SPN-41空中管制雷达、2部 AN/SPQ-9A 追踪雷达、3座 Mk-91防空导弹火控雷达和1部 URN-25型舰载机空中战术导航系统等。其中，AN/SPS-48E 三坐标对空雷达采用旋转式的矩形天线阵列，天线

阵面由73根波导管组成，具有高增益、低旁瓣和抗电子干扰能力强的优点，对于雷达散射截面积5平方米的空中目标探测距离为350公里，对于雷达散射截面积1平方米的空中目标探测距离为145公里。AN/SPS-49(V5)型远程对空搜索雷达是美国海军相当先进的一款二坐标对空

搜索雷达，采用曲面框架式天线，具备较好的远程对空预警探测能力，电子对抗性能和自动目标探测性能显著提升，最大探测距离能够达到460公里以上。

(三) 武器系统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早期安装有3套近程点防御导弹系统(BPDMS)，每套系统由一个人工操作的MK-71雷达/光学瞄准平台和1座8联装的MK-25“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组成。在中期综合大修后，该舰武器系统改为2套MK-31“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系统、3套改进型点防御导弹系统(IPDMS)和3座MK-15“密集阵”近程防御系统。每套改进型点防御导弹系统(IPDMS)由1台MK-91火控雷达和1座8联装MK-29“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组成，分别部署在舰艉左右舷外侧平台和舰艏右舷外侧平台。另外，该舰还装备了SLQ-25鱼雷反制系统、SLQ-29电子对抗系统和4座6管MK-36型红外/箔条诱饵弹发射装置等自卫武器。其中，SLQ-29电子对抗系统主要由一套WLR-8雷达告警设备和一套SLQ-17电子干扰机组成，后期升级为SLQ-32(V)4型电子战系统。

(四) 配套系统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配套系统主要包括通信系统、



/ 八联装的MK-29“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系统。

蒸汽弹射系统、着舰拦阻系统、海水淡化系统和全舰核生化防护系统等。

其中，通信系统包括SATCOMS卫星通信系统，舰载全球指挥控制卫星系统，Link系列数据链设备，SRR-1文电业务接收设备，WSC-3(UHF)卫星通信设备，WSC-6(SHF)国防卫星通信终端设备等。

蒸汽弹射系统主要由4台C-13-1的蒸汽弹射器组成，每台弹射器轨道长99.01米，最大弹射行程94.49米，能将34吨重的舰载机加速至安全起飞速度，能够满足最大战斗载荷的F/A-18E/F舰载战斗机和E-2C/D舰载预警机的弹射起飞需求。该型弹射器所需的蒸汽压力比“企业”号的弹射器低，从而有利于减少蒸汽用量，延长弹射系统寿命。该舰4台弹射器理论上能保持每分钟弹射2架舰载机

的速度，但实际由于蒸汽消耗限制，在高速航行状态下弹射8架舰载机后就必须暂停弹射起飞作业，等待动力系统的蒸汽压力恢复。

着舰拦阻系统为MK-7型飞机降落拦阻系统，该系统针对不同型号和重量的飞机需要较长时间调整制动机配重，因此舰载机降落时必须严格按照机型顺序降落并抛弃部分外挂武器，其他机型则需在空中利用伙伴加油方式盘旋待机，直至拦阻系统重新设置就绪。海水淡化系统由4台制淡机组成，能够每日转化182万升淡水，以保障全舰人员生活用水和动力系统蒸汽用水需要。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第一款“量产”版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仅10艘“尼米兹”级航母的总吨位就超过100万吨，远远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

国家海军舰船的总吨位。在美军作战行动中，总能看到“尼米兹”级航母的身影。1979年9月10日，“尼米兹”号航母参加了营救伊朗扣留美国人质的“鹰爪行动”，但在随后发起的攻击中，由于参与的直升机坠毁于沙漠而失败。1981年在“锡德拉湾”事件中，“尼米兹”号上的2架F-14“雄猫”战斗机击落了2架利比亚战机。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集中了多艘“尼米兹”级航母，对伊拉克成功进行了打击。此后，“尼米兹”级航母也参与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作战行动，表现不俗。一些军事专家称，世界军事现在是“尼米兹”的时代，足见其影响力。

对“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作战实力，有研究机构给出了如下数据：一个“尼米兹”级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能力就相当于1944年菲律宾海战中，由15艘航母和965架舰载机组成的美国第58特混舰队的综合作战能力。虽然这个对比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但“尼米兹”级确实代表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航母制造水平，其作战能力、技术性能、现代化程度更是远远领先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也使美国海军具备了更加强大、持久、可靠的远洋部署能力，为美国主导国际事务和实施全球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保障。董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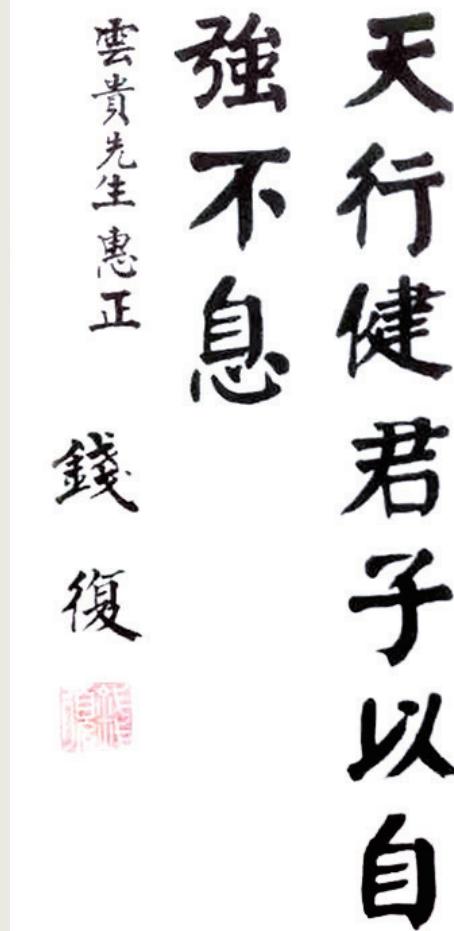
我与钱复先生的忘年交

□ 高云贵

在我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曾任台湾外事部门和监察机构负责人、有着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美誉的钱复先生给我赐题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书法墨宝，这幅墨宝承载着我与钱复先生的一段忘年交。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钱复先生曾多次给我及家人赐题过书法作品，逢年过节他都给我家寄来纪念品，他还委托其办公室主任陈安澜先生专程来宿州看望过我。

我祖母生前对我讲过，钱高两家都是世家，都曾积极地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和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伟业。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使两家之间的交往延续百余年。

我家祖上以读书求知、治病救人为业，到我曾祖父那一代时已是6代中医世家，同时也是儒学世家、爱国世家、耕读世家、慈善世家。当年，我家曾设私塾，免费教育有志向上的贫困子弟。我曾祖父系前清举人、著名医学家，且在书画艺术、儒学、文学等方面也造诣颇深。早年，他与辛亥革命元老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张汇滔、文振之（毛泽东舅舅，其儿子文强将军乃抗日



名将)、李烈钧、蔡锷等多有联系和交往，并积极地支持他们，与他们共同从事过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我的曾祖父还一直坚持义务为抗日志士看病(包括许多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抗日人士)，甚至因此而险些遭到日伪的暗杀。而钱复先生的祖父钱鸿业在抗战期间因不屈服于汪伪政府，而被日汪特务暗杀。世家出身加上共同的国难家仇，使我们两家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在深厚的家学熏陶下，在我曾祖父和我家诸多世交的爱国精神感召下，我祖父兄弟10人中就有6人毕业于国共将帅之摇篮——著名的黄埔军校，且多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正在大学或中学读书期间为杀敌报国而毅然弃笔从戎的。这其中又有3位是黄埔化学兵科(又称防化科或防毒科)毕业，这一兵科的主要目的是对付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对我同胞使用化学武器。钱复先生的父亲钱思亮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化学家，我祖父高锦书抗战期间在中国抗战统帅部重庆国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和军政部供职，并协助他的恩师、中国防化部队创始人李忍涛将军从事对日的防化工作。由此，我祖父又与钱思亮常有联系与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我一直利用先辈们早年的关系，通过我本人

的努力，广泛地与海内外诸多致力于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包括国共两党的抗日将领、专家学者、华侨华裔领袖、书画艺术家等取得了联系。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与中国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取得联系后，他老人家以百岁高龄给予我家庭成员分别赐题了不少书作。其内容大都是以反“独”促统和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全面抗战八年，陈老七年半担任国府教育部长。其间，为保住中华文化之元气和血脉，陈老致力于教育、科技、艺术等事业。尤其是在高校南迁方面，他可谓殚精竭虑、竭忠尽智。其中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先后迁往长沙、昆明，最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事陈立夫、钱思亮二公功不可没。海内外诸多著名学者，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学森等都出身于此。这几次南迁，钱思亮一直参与其中，并且被联大师生公认为以教学质量著称的“七教授”之一。陈立夫先生更是为筹办西南联大和为中华民族教育、文化等事业作出杰出贡献。陈立夫、钱思亮均是留美高材生，也均学有所长，又都是浙江籍的世家出身，更都是积极地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伟业，因此，他们相交甚笃。蒋氏政权迁台后，陈立夫、钱思亮一同随往。人在他乡，其相处之密更是可想而知。由此，我又通过陈立夫的

关系与钱复先生取得了联系。没过多久，钱先生给我赐题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为著名儒将田永清将军题写了“闻鸡起舞”。钱复先生以此来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都要以“闻鸡起舞”的精神来致力于祖国统一，以报效国家和民族。钱复先生作为博鳌论坛台湾代表团团长在参加博鳌论坛前夕又专门给我寄来“钩玄”之墨宝。我查了《辞海》，其意思为“探索精微”。我想其通俗的解释应为：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也就是说相信两岸中国人一定有智慧、能力和方法来解决两岸问题，最终实现两岸的完全统一。他老人家可谓用心良苦！我常想，两岸统一时，我们不要忘记一切曾致力于此的仁人志士。

我每天望着我家客厅墙壁上悬挂的钱先生之墨宝，经常回忆起我家、钱家乃至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之坎坷历史，感慨我们中华民族真是九死一生、历经劫难而不衰。如今，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只有实现了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中华儿女应该在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上鞠躬尽瘁、竭尽所能，这大概就是“天行健”和“钩玄”之意吧！

传承黄埔精神，共筑民族复兴中国梦

□ 许荣世(台湾)

综观中外，大多数的军校都是因应政治的需要而生，黄埔军校也不例外，她在中国于外患频仍、内乱纷争的1924年建立。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是创校者，目的是要建立一支正规的革命武装来外抗强梁、内除军阀，伸张正义、图民族之复兴。后来，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革命军，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都有居功厥伟的贡献，赢得了国家的统一和世界以平等对待我民族之伟大胜利，也奠定了黄埔军校在历史上的地位。

抗战中的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对我的家族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1937年，我的父亲21岁，以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少尉军官身份投入了抗战。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牺牲非常惨重，但我的父亲幸存到抗战胜利，这是他毕生的光荣，我作为他的后代也是与有荣焉。父亲在80多岁时还能清晰地给儿孙讲他与倭寇战斗的往事，可见抗日战争在他的人生中是何等艰苦而精彩一页。

《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教授是个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

抗战胜利70周年时她已90高龄，她回忆说，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就是从1937年到1945年之间，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8年时光，她看到中国人为争尊严、求生存，团结一心，不屈不挠，越战越勇，前仆后继，她看到了中华民族生命的韧性。那时，全体中国人有一个共同心声：“中国不会亡，因为有你！”是的，神圣的抗战唤起了民族魂！

“自由是无价的”，中华民族的自由是同胞们用鲜血换来的。抗战中，中国军民浴血奋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废除了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东北收回了，台湾收回了，中华民族也洗雪了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被倭寇欺侮的耻辱。抗日战争如从1937年倭寇全面侵华算起是8年，但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就是14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受尽倭寇的欺侮，但是我们忍辱负重，并且尝试过各种方法，对倭寇晓以大义，企图换得倭寇的仁义相待。然而倭寇残酷地对待我中华民族，要强占我九州大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中华民族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东，大家紧握刀枪，奋勇上战场，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我曾经问过参加抗战的父亲，怕不怕死？他说：“幸生不生，怕死必死。”我觉得，抗战时期的军人都抱着“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他们随时准备在战斗中牺牲自己，这就是中国军队的黄埔军魂，也是中国的民族魂。

黄埔精神承继民族精神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华民族雄踞东亚，屹立五千年，饱经外患侵略、内战频仍、颠沛流离、千里迁徙，只为求得一席安身立命之地。至于什么是民族精神，长期以来，不管是历史学家或是政治学家都有很精辟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就是维护人基本的尊严与生存空间。中华民族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家的观念大于国的观念，也就是说如果国家被侵略，可能还没有切身之痛，但要是家园被毁，那就要拼命捍卫家园，誓死保护妻儿了。我们传统的国

防思想就是“守土”，“不欺侮他人，亦不被他人欺侮”，所以“捍卫尊严”与“争取生存”就是民族魂。黄埔军校的精神——牺牲、团结、负责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引申。黄埔军校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应运而生，他的无私精神和磅礴气节从“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莫入斯门”就充分显示无遗；而校歌里的“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更凸显了黄埔军校的引导和先锋作用。所以黄埔建军自诩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他的精神就在“捍卫尊严”与“争取生存”的民族大义上，做人民的先锋，为民族而奋战。

抗战时中国的土地面积有1140余万平方公里。由于疆土的广袤和地理的大跨度，中国几乎囊括了包括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和沙漠等所有地形。在这么广袤和复杂的土地上，倭寇是没有办法一举席卷整个中国的。因此，中国最有利的战略方针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并以正规战和消耗战结合运用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中国军队以各战区的前沿为正规战，而在敌人占领区内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也就是强调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进行长期的抗战，进而赢得了抗战的最终

胜利。

从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和敌后作战的分工与合作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团结”的精神，而黄埔精神就是把这种“团结”精神结合了“牺牲”精神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负责”精神，灌输在每个黄埔军人的脑海中。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黄埔军人激励起忠贞爱国的志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挺身而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与全国同胞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不达胜利绝不停止战斗。

共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1世纪，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球华人的使命。平衡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一连串亲美媚日的举动和强硬的反中立场，使得两岸关系陷入紧张和严峻的情势。政治的本身应该隐含着妥协、善治与和平的精神，两岸同胞是同文同种的炎黄子孙，其间纵有思想上的歧异和利益上的冲突，也应以和平协商的手段来解决。今天，民进党当局遭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与操控，背离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数典忘祖、舍近求远的愚蠢行为。台湾领导人为了追求个人政治利益，弃人民的福祉于不

顾，倘招来战争的恶果，必陷台湾人民于浩劫，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因此，台湾当局应该悬崖勒马，回归两岸事务优先的道路，展开与大陆的政治协商，寻求一个和平发展的两岸交流架构，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而努力，两岸携手共筑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两岸分离已逾70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的巨轮推动着时代的演变。1992年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是国共和解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更是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民族大团圆的前提。但是台湾当局却不承认“九二共识”，罔顾同胞情谊，挟洋自重，联外抗中，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亲情与血缘关系，逐步实现“台独”的梦想，实已到了图穷匕见，危在旦夕的地步。

1987年，大陆黄埔军校同学会提出“天下黄埔是一家”的号召，唤起了两岸黄埔同学对历史的回顾。大家感怀“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历史情缘，承继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在黄埔精神的感召下共同担起祖国和平统一的责任。在今天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两岸黄埔同学更应携手共进，共筑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再造民族辉煌。黄埔

热血染红五星红旗 (下)

——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联创始人杨林、李秋岳夫妇

□ 崔光烨

调往中央苏区担当重任 长征路上尽显军事才能

1932年7月，杨林奉命到上海参加临时中央军事会议，汇报东北抗日斗争情况。会后，被周恩来召回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杨林通过地下交通线来到瑞金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兴奋不已！周恩来也满面春风地紧紧握着杨林的手。自南昌起义一别，他们整整5年没有见过面。

周恩来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主任，杨林担任参谋长。此后一年多，杨林作为周恩来工作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他协助周恩来组建了10个补充团，加以训练后输送给红军主力部队。为了便于向前方输送粮食和军用品，杨林和其他劳战委员会同志一起，协助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修建道路和桥梁。在此期间，劳战委员会还为革命战争募集到短期公费60余万元，解决了苏区的经费短缺问题。

杨林还先后担任会（昌）寻（乌）安（远）军分区司令员、

红23军军长、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4、第5次反“围剿”斗争。在红都瑞金，杨林和红军炮兵负责人武亭作为朝鲜同志而受到特别关心。一次，毛泽东遇到杨林，问起他的夫人，他回答说还在满洲省委工作。毛泽东马上嘱咐相关人员要想办法把她调到中央苏区来。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时，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总教官的杨林（此时杨林恢复使用苏联时期的名字毕士悌）被编入中央军委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起踏上长征路。中央军委红军干部团是由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编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该部下辖4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第3营为政治营，第4营为特科营。其主要任务是：警卫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同时负责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

万里征途，红军几乎天天有战斗。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最为惨烈的一次。杨林身先士卒，用刺刀、手榴弹同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干部团激战数日，打退了敌军数次进攻，终于掩护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此后，杨林随干部团转战到贵州，渡过乌江，进入遵义。1935年2月，遵义之战打响，杨林同干部团指战员一天强行军60公里，夺占娄山关，保障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钟伟剑调任红3军团第5师参谋长。杨林继续担任干部团参谋长，不久，参与指挥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强渡金沙江等战斗，并立下卓越功勋。

抢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的决定性一战。由于此战关系重大，毛泽东亲自下达干部团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

的命令。1935年4月29日，杨林亲自率领前卫连强行军一昼夜飞临金沙江畔。当时，守渡口的敌军还在酣睡。他们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将便指挥部队偷渡金沙江攻占皎平渡口，活捉守敌60余人，并缴获了船只。第二天清晨，杨林又受命率领军委干部团前卫营强行军20公里，夺取通安州。战斗中，杨林冲杀在前卫营的最前面。在他的带领下，红军勇士们奋勇杀敌，以伤亡12人的代价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杀出一条血路，有效地巩固了皎平渡渡口，保障了整个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任务的胜利完成。由于表现突出，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干部团，干部团由此声威大震。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便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此后，杨林随干部团过大渡河，翻过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师。两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学校。干部团改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杨林仍任参谋长。

8月下旬，杨林与特科团的同志走出了茫茫无际的草地。9月10日夜，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继

续北上。次日凌晨，红军学校接到北上的命令，杨林坚决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立即与新任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宋任穷率领特科团出发。1935年10月，杨林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到达陕北吴起镇。

革命伴侣比翼双飞 血沃中华英魂耀千古

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泉附近同红15军团会师，两部随即进行合编。杨林奉命调任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在随后进行的直罗镇战役中，他指挥部队追歼残敌1个营，毙敌师长牛元峰。

1936年2月18日至20日，红一方面军先后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根据预定作战方案，红1军团以第2师第5团为先头部队，红15军团以第75师为先头部队，于20日20时乘夜色开始渡河。杨林奉命亲率第223团1营作为先头营登船偷渡。为了首先扫清对岸守敌，杨林从先头营中挑选了4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渡河先遣支队，分乘5只小木船，后随该营1连的两只大船，从较为隐蔽的王家河上船，顺着小河进入黄河。

突然，对岸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杨林意识到被敌人发现了。他立即下令，变偷渡为强渡，一面实施火力反击，一面奋力划船

急进。船抵贺家凹西北岸边，战士们如离弦的箭冲向敌人，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手雷构成的密集火力封锁线直指敌人碉堡。攻下河边碉堡之后，杨林又率士兵加速拔除敌人阵地纵深碉堡。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便将河边山脚的敌人地堡全部“报销”了，东岸守敌一个连的兵力投降。

占领了东岸后，223团参谋长韦杰带人进入了一座刚打下的地堡，指挥部队展开下一步行动。这时，师参谋长杨林带着警卫员走进了地堡，高兴地称赞韦杰这一仗打得好。韦杰向杨林汇报，有一个核心大地堡和一个小堡没有打下来，部队正在围攻。

杨林和韦杰来到前线，只见大地堡的晋绥军还在负隅顽抗，但已经出现动摇之势。韦杰下令：“组织战士们摸到地堡跟前，甩手榴弹，再加强喊话，拿下地堡！”杨林说：“可以利用俘虏的敌军官喊话，效果会更好。”喊话后，地堡的守敌开始陆续出来缴枪投降了。此时，杨林靠上前去，查看情况。不料，地堡里一个敌兵顺着射孔“啪”地打了一枪，击中杨林的腹部，杨林倒在了黄河岸边。韦杰立即把杨林安放在一件军大衣上，喊来卫生员进行包扎。1936年2月22日，杨林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38岁。

杨林多年的亲密战友、时任红15军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回忆说：“过河后，我去贺家凹看望杨林同志。专门照顾他的医生、护士告诉我，子弹打着肠子，伤势严重，正在用一切方法抢救。我看到杨林同志躺在一个宽大的炕上，脸色苍白。他看到我时露出喜悦的笑容，问我前方的情况怎样。我说，75师正向义牒镇的敌人进攻，估计今晚可以打下来。军团部及78师今晚也进到义牒镇附近，明天全部可以进到石楼附近，留一个连在贺家凹担任警戒。我刚说完，他就要我走。我本想多看他一会儿，可是他一再让我快走。他伤势很重，但依然关心革命事业，我不愿违反他的心意，使他不愉快。我紧紧地握过他的手后，人就离开了。后来他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

杨林夫妇都是朝鲜人，都是中共党员，都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国际主义战士。杨林牺牲时，他的妻子金锦珠以李秋岳的化名正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

在东北，李秋岳是与赵一曼齐名的抗日女英雄！她是哈尔滨东部地区珠江抗日游击区和东北抗联三军的创建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 李秋岳。

1919年秋，由于日本军警的通缉，杨林不得不离开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李秋岳，秘密投奔设在中国东北通化县哈尼河的新兴武官学校。

1924年末，李秋岳到中国寻找丈夫。在广州与丈夫杨林团聚后，她化名李秋岳，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与丈夫一道投入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

1925年2月，李秋岳作为宣传队成员参加了广东国民革命军东征。同年6月又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同年秋，李秋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李秋岳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习。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利后，党中央为了保护杨林和李秋岳，派他们去苏联学习。1930年，李秋岳学成后跟随丈夫回到东北。不久又

随丈夫前往东满特委开展游击队的创建工作。在这1年多时间里，李秋岳积极协助丈夫广泛发动延吉等地群众，组织农民抗日武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党建工作经验。

1932年7月，杨林奉调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李秋岳调至中共珠江（现在的尚志市）中心县委工作。从此夫妻两地分居，各自忙于革命工作。

李秋岳被派到珠江后，先后任珠江中心县委委员、妇女部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当时珠江中心县委的重点工作是全力以赴创建抗日游击队。李秋岳为了不影响工作，将出生不久的儿子托付给一农户照料。她自己不分昼夜地活动在河东、侯林乡、黑龙宫、乌吉密、石头河子及三股流等地，为创建游击队奔波。

1933年10月，珠江中心县委领导的珠江东北反日游击队正式成立。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发展成哈东支队。李秋岳组织领导铁北的群众为哈东支队运送弹药及生活用品，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等，全力支援哈东支队。可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李秋岳身上，她年幼的儿子因疏于照料不幸夭折。这对李秋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加上过度劳累，她患上严重的肺病。

可是，她把伤痛埋在心底，用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患病的身体，仍然奔波在对敌斗争的前沿。

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关心过李秋岳。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杨林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何成湘代表满洲省委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会见了何成湘，非常关心地询问李秋岳的近况，并决定调她到中央苏区工作。何成湘回到哈尔滨后，向省委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省委随即派冯仲云亲自到珠江中心县委通知李秋岳，准备送她到中央苏区。李秋岳得知毛主席对她如此关心，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又非常严峻，李秋岳的中央苏区之行被延误，从而失去了夫妻团聚的最后机会。

1934年10月，正当杨林随着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踏上长征之际，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开始疯狂围剿珠江游击区。李秋岳立即返回珠江铁北区一带，与赵一曼共同发动群众为哈东支队筹集军需物资。

李秋岳与赵一曼是亲密的战友，她们的经历几乎相同。她

们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都在苏联留过学，都在满洲省委机关工作过，后来又都来到珠江中心县委担任县委书记，也都当过铁北区委书记。李秋岳与赵一曼在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乡亲们亲切地称李秋岳为“黑李”，称赵一曼为“白李”。

1935年1月，哈东支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独立师。1936年8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迅速开辟了木兰、巴彦、铁力、汤原等10余个县根据地。

日寇对抗联的发展壮大很是惊慌，加紧进行围剿。1935年春，日本关东军发起春季“大讨伐”，实行恶毒的“三光政策”，珠江中心县委各级党组织和珠江抗日游击区遭受严重破坏。李秋岳遵照满洲省委和珠江中心县委的指示，带领铁北区的部分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跟随赵尚志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转移到延寿、方正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她原任的珠江中心县委铁北区委书记由赵一曼接替。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赵一曼于1936年8月（比李秋岳早一个月）在珠江慷慨就义。

李秋岳转移到延（寿）方（正）后，深入敌区，带领游击队袭击县警察局。不久，她又武装当地猎人和农民，带领他们进

攻地方伪军团，获得了大量军用物资，迅速打开抗日新局面。

李秋岳担任延方特别支部书记后，经常穿着汉族服装，挎着筐子，装扮成农村妇女深入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着手成立反日会组织，发展党员。短短半年多时间，她就建立了延寿县抗日救国会组织。与此同时，还积极为抗联3军补充兵员，传递情报，筹措弹药、枪支和给养。

1936年2月，珠江中心县委决定把延方特支书记李秋岳调往通河，由刘士武接替李秋岳的职务。在延寿夹信子欢送她的秘密会议上，大家提出如何把特支为抗联部队购买的军需品薄皮靰鞡转移出去的问题，李秋岳想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叫好的办法。第二天早晨，灰蒙蒙的天空下，夹信街大门口打着哈欠的日本哨兵和几个东张西望的伪军哨兵懒洋洋地搜查着过往行人。突然，一个披头散发疯疯癫癫的女人抱着一床破棉絮，拼命向城门跑来。后面，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壮汉挥舞着木棒紧紧追趕着。女人跑到大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伪军哨兵：“大哥行行好，我男人要打死我。”女人说完，也不等哨兵发话，就一溜烟逃出城门。壮汉紧跟其后，来到城门口，这时几个“看热闹”的

紧紧拉住他，七嘴八舌地劝着。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大群人趁着吵吵嚷嚷的时机一窝蜂地跑出城门。这就是李秋岳精心设计的出城妙计。前面跑的女人就是李秋岳，后面假扮她男人的是特支宣传部部长刘士武，看热闹和混出城的众人也是特支工作人员和爱国群众。这一场精彩的表演骗过了敌人，不但运走了薄皮靰鞡，还把李秋岳送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李秋岳只身来到漫天飞雪、人地生疏的松花江畔的通河县，首先建立起中共通河特别支部。在这里，她化名张一志，深入到各村搞抗日宣传，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在通河西北河南屯、北六方、漂河西南屯、二道河子等9个地方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反日区委。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通河的反日会的会员发展到370多名，反日会会员每人自愿缴纳5分钱作为活动经费。此外，她还动员了6名青年参加抗联队伍，惩办了几名罪大恶极的汉奸走狗。西北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对赵尚志将军领导的东北抗联第3军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到了春天，日伪军到处抢粮。李秋岳领导人民群众把粮食藏起来，敌人到处扑空，一粒也得不到。她带领妇女们上山挖野菜充饥，把节省的粮食积

攒起来，指挥群众乘夜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把粮食及时送到抗联战士手中。

为了扩大反日影响，李秋岳还亲自起草了《反日会章程》，并印发《东北民众抗日联军临时政府宣言》《中国人对日军战斗的基本纲领》等传单。

李秋岳到通河仅仅6个月时间，通河的抗日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牡丹江地方警务统治委员长中村在给日本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东条英机的报告中说：“通河是一难治的癌症。”1936年8月，日伪当局重金悬赏搜捕李秋岳，并组成通河县治安肃整宣抚工作班，并且网罗一些地方反动势力进行盯梢、收集抗日活动情报等。

8月27日黎明，李秋岳等3人在赵国臣家发动群众为部队赶制军鞋时，被突然闯进的伪祥顺警察署署长孙凤周率部抓捕。在通河监狱中，敌人只知道她是张一志，是反日会的负责人。敌人对她先是诱降，审讯时假惺惺地说：“你不考虑你的前途，总还想孩子吧！他们可不能没有母亲啊！”李秋岳坚决地说：“什么自身前途呀，为了子女呀，这些都没有考虑的余地，我们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寇赶出去，解放全中国。”当敌人再度逼迫她写“悔过书”时，她挥笔写道：“中国东北得到解

放，祖国朝鲜也能解放，自己能为此出一把力感到非常光荣！要改变我的思想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亡国奴要求解放自己的祖国是没有错误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还保留在历史的档案里。

诱降失败，丧心病狂的敌人就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李秋岳。最后，敌人明白从她口中绝不会得到任何情报。中村在给东条英机的报告中写道：“被检举者张一志，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在整肃中不得不参考卫队长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于9月3日给以严重处分（枪决）。”

9月3日，也就是在她被捕后的第7天，敌人再度逼迫她写“悔过书”。她挥笔而就：“丧失国家的人，为恢复国家而斗争是没有错误的！……”恼羞成怒的日军将她押赴通河县城西门外刑场。临刑前，她大义凛然，一路上昂着不屈的头颅，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罪恶的子弹射进李秋岳的胸膛，鲜血染红了通河大地！李秋岳牺牲后，日寇残忍地割下她的头颅，悬挂在通河县城，用以恐吓群众。

李秋岳还是位才华横溢的革命家。她曾写下一首歌曲，题

目是《流尽最后一滴血》。李川为其谱曲。歌词的内容是：

别了！风光绮丽的祖国，
别了！碧波荡漾的鸭绿江，
别了亲爱的母亲和朋友，
别了祖国被压迫的人民。
你们同我们一样是一群失去
祖国受压迫的奴隶，
你们同我们一样是一群无辜
的可怜虫。

长期的奴役唤醒了我们的觉
醒，

我们要光复故国，
我们要摆脱这无尽的苦刑。
我们要求翻身，
我们要求解放！
我们要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起来！祖国被压迫的奴隶
们，
我们的热情如海潮，
我们的力量似钢铁，
我们团结一致，握紧拳头，
打倒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别了！风光绮丽的祖国。
别了！碧波荡漾的鸭绿江。
别了亲爱的母亲和朋友，
别了祖国被压迫的人民。
如今我怀着满腔的热血远涉
重洋投奔他乡异国，
他们同我们一样是被双重压
迫的民族。
他们一样是被帝国主义侵略
的国度，



/ 李秋岳烈士纪念碑。

那里有正义和真理，
那里有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朋
友。

我们将和他们，一道战斗流
血！

为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
起来！祖国被压迫的奴隶
们，

为换取祖国光复为劳苦大众
解放，

情愿拼掉头颅，流尽最后
一滴血。

歌词凄楚悲壮、慷慨激昂，
既有对故国深深的眷恋，又有
和敌人坚决斗争到底的雄心壮
志。如今读起来仍能让人心潮
澎湃，感慨万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当地人民政府将其遗骸安葬于
黑龙江省通河县烈士陵园。

2015年8月，李秋岳名列第
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黄坤

远征

——记中国远征军抗日英烈丁嘉民

□ 李国强 吕永岩

抗日征途远，热血殉国难。

后人当怀缅，烈士笑九泉。

2013年8月15日，设在云南省腾冲县的滇西抗战纪念馆开馆。纪念馆西侧有一面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上面镌刻着10万多名参与滇西抗战的中国远征军将士、盟军将士、地方抗战游击队、地方参战伤亡民众、协同参战部队和单位人员的姓名。其中，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抗日英烈，他就是丁嘉民。

丁嘉民，号德兴，字德新，1918年6月13日生于山东省潍县东乡丁家油房村（现为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丁家社区）。1936年，考入山东省立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学校遭日机轰炸后停办，丁嘉民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中。8月15日，丁嘉民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1团2营5连少尉排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1939年2月，进入中央军校四分校（广西宜山南5街5号）16期步兵科学习。1940年5月初，军校毕业后任军政部第33补训处1团2营4连少尉排长。1941年2月10日，任军政部第33补训处1团2营4连中尉排长。4月



/ 丁嘉民。

1日，任第5军干训班重兵地队区队长。10月15日，任军政部第33补训处弹兵连上尉连长。1943年2月1日，任第9师司令部上尉参谋。10月15日，任第9师25团轻机枪连上尉连长。11月11日，任第9师25团2营上尉副营长。1944年6月，在龙陵战役中英勇牺牲。

今天，虽然我们已无法看到丁嘉民具体的战斗细节和战斗事迹，但是，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还是可以追寻丁嘉民当年投身抗战，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战斗足迹，感受战场的硝烟，缅怀抗战的英雄。

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0月

25日，丁嘉民（任2营5连少尉排长）所在的教导总队第1团2营为先遣支队，由营长索本勤率领，星夜经苏嘉线开赴八字桥。先遣支队到达七宝镇下车后即到虹桥，当晚接替51师担负张浜渡左至八字桥一线的防务，白天隐蔽，晚上构筑工事。10月28日，教导总队的第1、3团及直属部队于莘庄下车后适逢倾盆大雨，部队即冒雨沿蒲青公路东侧向八字桥阵地前进。八字桥是日军企图突破我阵地的主要选择点，教导总队第1团与第3团为右梯队。10月29日，日军发起总攻击，先是飞机轮番轰炸，继而重炮猛烈轰击，摧毁我阵地防御工事，紧接着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发起猛攻，双方展开血肉激战。

教导总队以两个团的兵力，接替黄维的67师和俞济时的52师防务，与进攻之敌鏖战3天3夜，敌人伤亡惨重未能突破我阵地。11月9日，我军奉命撤退，总队长桂永清在徒步向苏州行进途中遇见第1团2营6连排长刘海平，令其通知先遣支队索本勤过河后沿铁路线撤到南京。丁嘉民等2营官兵撤到苏州河时，大

桥已被破坏，部队无法通过，营长索本勤即率全营沿河上行数十里，在一个大村庄停下，命令各连以班为单位自行设法渡河。10日天亮前，全营渡河完毕，沿铁路线进至枫林桥车站时，见副官处长余易麟押一列火车前来，遂即乘车返回南京。

参加南京保卫战。教导总队第1旅1团2营作为独立支队担负教导总队防区重点工事修补任务。12月7日，完成任务后，连夜前往麒麟门和乱石岗。8日，丁嘉民所在的2营第5连在乱石岗与日军交火，日军用山炮向乱石岗（5连）、麒麟门（6连）、九九高地（营指挥部）疯狂射击，继而占领了乱石岗。5连由乱石岗撤至体育场一线，掩护6连撤退。日军爬上九九高地后，被我军发现，战士们连连掷出手榴弹，与日军展开激战。11日下午，接到总队长桂永清手令，全部撤到煤炭岗渡江。

参加桂南会战。1939年12月4日，日军攻占昆仑关，桂南会战打响。1940年2月，在广西宜山办学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奉命编组全体师生为第160军，下辖两个师，丁嘉民所在的第9总队（16期一年班）为1个师，第17期学生两个总队、华侨大队、练习营等组成另外1个师。校主任韩汉英兼任军长，张振镛兼参谋长，星夜出发，限期到达广西忻



/ 第25团指挥部——梅氏独家村老屋。

城一带，参加桂南会战。全体师生在红水河沿岸坚守了三、四十天。作战任务完成后，丁嘉民随第四分校师生奉命返校。

作为先遣队强渡怒江。1944年5月至7月，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在怒江西岸对日军第33军所部发动进攻作战。远征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2军派1名得力副师长率领1个加强团以上的兵力，组成怒西游击指挥部，进出于怒江西岸芒市、龙陵等地，牵制扰乱敌人，以掩护大军渡江。第9师副师长陈克非为该指挥部司令官，第76师228加强团和以丁嘉民为副营长的9师第25团第2营，工兵连、战防炮连、输送连各1个，共约2400人，编为左翼队，于三江口以南自行选择渡口，5月11日18时前渡江完毕。13日晨，我军使用火箭筒及火焰喷

射器向平戛街内日军各据点发起进攻。17日晨，陈克非亲自带领一线部队给日军关键性的一击，终于在怒江西岸站稳了脚跟，为远征军渡江作战抢下了滩头阵地。随后不久，远征军大部队顺利渡江并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参加平戛战斗。平戛为日军在滇西的一大据点，屏障着龙陵、芒市。日军在平戛外围的青木岭、马鹿塘、三村等地构筑有坚固工事。日军以第146联队第1大队约800人、附山炮4门担任守备任务。远征军第2军渡江后，以第76师攻平戛，其余部队向象达前进。陈克非率领的第76师加强团并配属丁嘉民任副营长的第9师25团2营，由第71军88师胡家骥师长统一指挥，会攻平戛。1944年5月14日入夜，第76师加强团即向平戛东山及平戛街展开

攻击，一度占领平戛，并令第25团2营前往平戛南约10公里处围攻寇寨，增援工兵连阵地。据时任怒西游击指挥部作战参谋陈为鸣撰述，丁嘉民任副营长的第25团2营当即协同工兵连稳住阵脚，随即以两个步兵连在全部机枪、60炮及火焰喷射器掩护下，向日军猛烈攻击，经过40分钟战斗，夺回工兵连大部分阵地。

第76、88师的两个加强团围攻平戛之战，前后持续约15天，最后占领了青木岭、马鹿塘、三村、小寨等据点，使平戛的日军失去屏障，形成于我军反攻有利之态势。

参加龙陵战役的象达追击战，壮烈殉国。象达高山环绕，守备之敌为日军第146联队永田中队约300余人，拥有平射炮2门、迫击炮2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10余挺，在大栗坡、老街坡、文昌宫构筑有坚固工事。象达追击战于1944年6月7日打响，至6月26日收复象达。丁嘉民在此战中任第9师25团3营8连上尉连长。战斗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6月7日至13日，为老扁坡头（在象达叫大尖山）、大栗坡之攻击。6月7日上午6时，大雨滂沱，第9师以第27团为主攻、第25团为助攻向日军发起攻击。27团1营于炮火掩护下开始向老扁坡头前进，第5连向老田

寨、朱家庄后面高地之敌发起攻击。与此同时，第25团2营6连亦向坡头小寨方面之敌佯攻，以牵制敌人侧击大栗坡。6月13日15时，我军占领老扁坡头和大栗坡敌阵地大部。

第二阶段是6月14日至20日，为良子寨、赧洒、老扁坡头、岳家坟歼灭战。以第25团大部为右翼队，占领东山坡、赧洒、打老鹰包包、杨公坟一线，并继续攻击大栗坡和老街坡。以第27团、第25团第3连、战防炮营为左翼队，占领岳家坟、梁子寨一线，继而对梁子寨后山残敌实施攻击并将其歼灭。17日拂晓，日军由芒市增援3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岳家坟、老扁坡头第25团阵地进犯。丁嘉民所在的第3营官兵沉着固守，敌虽狼奔豕突与我肉搏数次，但我阵地仍屹然未动。

第三阶段是6月21日至26日，克复象达。以丁嘉民所在的步兵25团为主攻，攻击大栗坡残敌，同时阻击增援之敌。以第27团两个营为总预备队，担负策应任务。以第27团2营为助攻，佯攻老街坡。6月22日上午8时，我军先以炮火向大栗坡进行破坏射击。11时，老街坡、文昌宫之敌被彻底压制，敌人大栗坡的坚固堡垒大部被摧毁。此时，第25团2营主力发起攻击，突破敌三道封锁，逼近敌核心阵地，但

伤亡惨重且半数手榴弹未响。随后第9连增援，继续进攻，敌核心堡垒终不能攻破。相持至22日午夜，敌我再三增援、冲锋十余次，仍未克竟全功。23日4时许，日军乘拂晓雾浓，我炮兵不能观测射击之际，在老街坡、文昌宫附近火力支援下，复向我军猛烈逆袭。此时，我军已阵亡连长两人、副营长1人，丁嘉民位列其中。24日24时许，丁嘉民生前任连长的第8连将大栗坡完全占领，半小时后第25团7连冲入象达街乘势攻占了文昌宫。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现在，在云南省龙陵县象达乡象达村董家坟后山上，依稀可见18座坟冢。据当地梅立顺老人回忆，此处长眠着25团的18名将士（丁嘉民很可能就在其中），是攻打老扁坡头（在象达叫大尖山）战死的。当时25团的指挥部就设在梅氏独家村老屋。

后记

丁嘉民18岁离开家乡，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家里人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父亲丁学谦和妻子吕秀英也不太清楚他的经历。搞清楚丁嘉民从军抗日的真实情况，也就成了他家人多年的心愿，尤其是他的3个孙子丁文国、丁文庆、丁文东和孙女丁爱花。从2018年至今，大家辗转北京、南京、广州、昆明、

腾冲以及台湾等地的相关部门查找历史资料和证据。

2018年12月初，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1947年12月编撰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的《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中找到了关于丁嘉民的详细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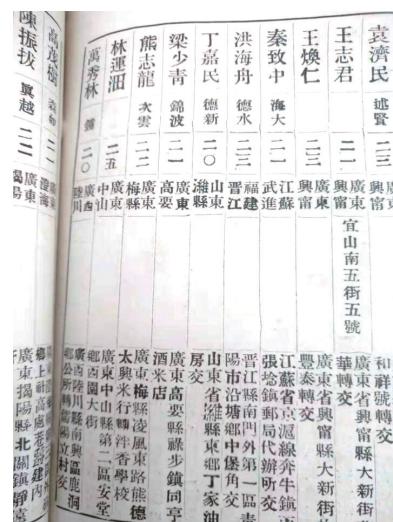
2018年12月中旬，从滇西抗战纪念馆了解到，纪念馆于2014年就将丁嘉民的信息录入到数据库，并将他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上（2014年增补名录）。12月16日，丁文东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云南腾冲。看到镌刻在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上爷爷丁嘉民的名字，丁文东激动万分，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怀着无限的崇敬和怀念，敬献了鲜花，并深深三鞠躬……

2019年6月，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军政部第三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奉令改编现有官佐简历册》（1942年1月29日）和《军政部第三十三补充兵训练处拨交、零道师管区接收现有官佐简历册》（1942年3月）两份珍贵资料里有关丁嘉民的部分履历。

2019年8月，在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第十六期第九总队通讯录》中查到丁嘉民的名字和永久通讯地址。



/ 在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前的丁文东。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第十六期第九总队通讯录》中有关丁嘉民的记载。

2020年11月，在台北国民革命忠烈祠查到《中华民国抗日时期故丁嘉民烈士入祀资料》和记载丁嘉民档案的《人员简历册》。简历上有丁嘉民的半身戎装照片，这是丁嘉民留给后人的唯一一张照片。



/ 刻有丁嘉民（左下二）名字的中国远征军名录墙。

丁嘉民在日寇入侵、国家危难之时，为保家卫国远征抗战，最后英勇牺牲。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他家族的光荣，更是家乡人民的光荣！他的英雄壮举可歌可泣，气壮山河，将永垂青史！
黄埔

追忆我的姥爷陈敬安烈士

□ 张战

陈鸿翥（即陈敬安，为革命烈士陈毅安之弟）别号镜萍，1911年6月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界头铺，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故人称“敬安五爷”，从小过继给他五叔陈梓村为子，迁住茅园。

姥爷7岁开始读书，13岁就读于长沙书堂山长沙县立第九高等小学堂（现望城县书堂中学）。1926年高小毕业后，他父亲想安排他务农，但他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他两个哥哥（大哥陈秩常，中共党员，曾任陈嘉佑师长秘书；二哥陈毅安，黄埔4期，中共党员，高级将领）的鼓励下，立志要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做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为此，他常与族兄陈楚翹、堂侄陈漫生私下计议出走之策。

1926年7月，其大哥陈秩常和二哥陈毅安及堂兄陈嘉佑（国民革命军第2教导师师长）来信让姥爷他们去报考黄埔军校。他们3人便来到长沙汤颐家与地下党选派的30余人一起乘火车出发到了株洲，因当时粤汉铁路未全线开通，只能步行到韶关。时值盛夏，路途艰险，他们一行人头顶烈日，脚穿草鞋，身背



/ 陈鸿翥(陈敬安)。

行囊，日夜兼程地向南进发。每当夜幕降临落脚休息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盐水烫洗被砂石磨破的双脚，有的同伴难以忍受而返家。姥爷没有退却，仍然继续前行。

8月，他们终于到达国民革命军第2军教导师驻地韶关，稍作休息后就直奔广州去参加黄埔军校第6期的招生考试。同年10月，在堂兄陈嘉佑的极力推荐下，姥爷被破格录取（年龄未达入学要求），并被编入黄埔军校第6期入伍生2团（团长李亚芬）1营（营长罗子实），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1929年5月，姥爷从黄埔军

校毕业，时年18岁。后历任87师259旅517团少校营长、团附、中校补充营长等职。姥爷带兵军纪严明，处处以身作则，事必躬亲。驻防苏北训练士兵时，有一次，士兵砍了老百姓的毛竹搭盖营房，却没给钱，姥爷知道后立即批评这名士兵的行为，叫他在连队会上当众检讨，会后还钱给老百姓并赔礼道歉。因此，姥爷的士兵和当地居民关系融洽。

1937年夏，日本侵略军进犯京沪，为了誓死保卫南京，姥爷将妻儿送回湘阴，并嘱咐姥姥照顾好二老和孩子，不要惦记他，万一他为国捐躯时切勿悲伤，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他仅仅在家住了两天，便赶回南京，谁料这一次竟成了永别。

12月，南京保卫战打响。姥爷所部4个连奉命来到光华门外的石门坎和海福巷口的阵地，眼见日军杀气腾腾，坦克横冲直撞，姥爷怒火中烧，带领士兵拼命抵抗。日军凶恶反扑，姥爷将炸药包和手雷捆绑在一起，准备亲自带人去炸日军的坦克。正当双方激战时，传来旅长陈颐鼎的命令，要大家与敌人“进入巷战”。姥爷立即命令机枪连掩护

1、3连向光华门城下转移，他自己却横下一条心，亲率2连冲向日军队伍，与敌人进行“肉搏”，终因寡不敌众牺牲于南京光华门，时年仅26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追认姥爷为抗日烈士。1985年6月2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姥爷被列为革命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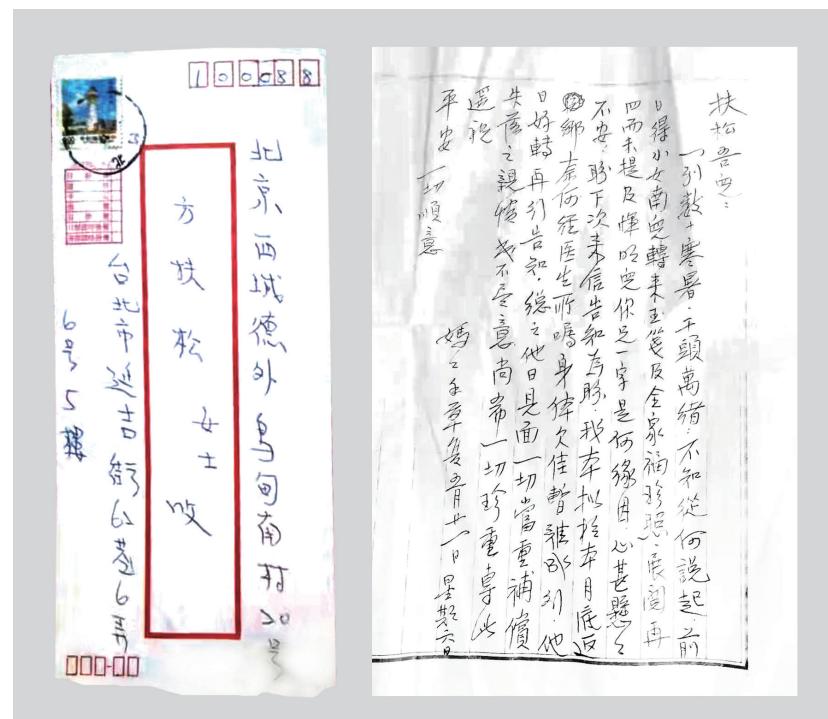
1935年，姥爷和姥姥（麓溪）在南京结婚，育有一儿一女。1937年，姥爷在南京抗击日寇时，远在老家的姥姥听到南京沦陷的消息，急忙赶往南京打探姥爷的下落，才知道姥爷已为国捐躯。后来姥姥杳无音信，那时我母亲出生才3个多月。此后，母亲和他的哥哥（润民）由我的太爷爷带大。

当时，陈毅安的夫人李志强姥姥是长沙电报局的职员，工资收入尚可，回老家时经常到太爷爷家来，志强姥姥很喜欢母亲兄妹两个，加上母亲是所有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此更是亲近。后来志强姥姥去了北京工作，再回老家时，便把母亲带回北京读书（润民舅舅留在了老家，1960年润民舅舅在湘阴“五风”中病死）。

1950年，母亲和志强姥姥一家生活在北京的西单灵境胡同，后来搬到了西单西牛角胡同。母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时



/ 陈敬安夫人。



/ 陈敬安夫人给女儿的信。

曾连续3年任团支部书记。1957年，母亲考取了北京军区后勤卫校，成为了一名护士。

1968年，母亲和父亲被调到北京军区281医院，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做保健工作。8年后，

父母的三句话

□ 蒋光宇

我的父亲蒋润苑，黄埔17期生，今年104岁，我的母亲李冰茹，96岁。我家是个大家庭，祖孙4代人，有37口，逢年过节团聚的时候非常热闹。父母常借团聚的时候叮嘱晚辈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读书的要好

好学习。”我的父母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他们都爱学习，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父亲年轻的时候，靠自学考上了黄埔军校；中年的时候，给单位的职工夜校上语文课；老年的时候，同母亲一起上老干部大学。看报、读书、

练书法，是父母每天的享受。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都是“知青”的6个儿女及各自的爱人，基本都拿到了大专以上的学历；15个孙辈，多数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8个重孙辈如禾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们懂得了，不想虚度一

他们又服从工作安排调到了北京军区110医院。

1980年，我们全家回到了北京。母亲始终工作在医疗系统，多次受到嘉奖，后来转业到了地方医院。由于工作上业绩突出，母亲从普通医生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但她始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获得先进个人、骨干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等各种奖项。

母亲也有脆弱的时候，从小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亲人的思念，让母亲一直想找到生母的下落，亲朋好友也帮着多方寻找。

1989年5月28日，母亲突然接到老家新民舅舅的来信，信中告知找到了姥姥，她现居台湾，并有来信交于母亲。

姥姥1912年生，乳名方翔凤，学名方麓溪。姥姥擅长书画。书画用名方晚霞。1946年，

/ 陈敬安夫人留给女儿的画。



姥姥在回老家的路上结识了长沙人史希文并结婚，生育子女3人，1949年去台湾又生了3子3女。姥姥年事已高，加之身体有病，非常想在有生之年回到家乡并见上母亲一面，来信中还特意表达了思念女儿之切，希望补偿失落之亲情。

母亲看到这封信时百感交集，期盼早日与亲人团聚。因母

亲无法赴台探亲，姥姥决定在香港的小女儿安南家安排与母亲见面。母亲与父亲办好手续先行到了香港，不料姥姥旧病复发，未能成行，甚是遗憾。姥姥想在病愈之后回家乡见面，亲人们也都盼望着这一天，谁成想她再也没有好起来，最后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去，只留给我母亲一张字画。黄埔

辈子，就要学习一辈子。

第二句话是：“在岗的要好好工作。”我的父亲在工作岗位的时候，虽然没有得过什么了不起的大奖，但本单位的各种奖励几乎年年不断；母亲在工作岗位的时候，市报专门报道过她的先进事迹。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每个孩子在工作中都受到过嘉奖。我们懂得了，工作是进步的阶梯，是展示德才的舞台，是值得热爱的事业。

第三句话是：“退休的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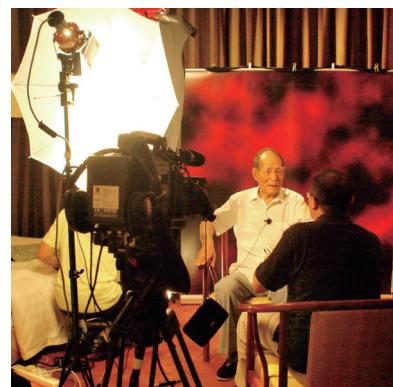
好生活。”我的父亲退休后曾在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发挥余热，受到了好评。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记录片《我的抗战》中，有采访父亲时的影像；在《我的抗战》一书中，收录有父亲的口述文字。在上老干部大学时，母亲被评为优秀学员，学校还为结婚72年的父母举办了书法作品展。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已经退休的孩子，都有所学、有所乐、有所为。我们懂得了，退休后的每一天，都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



/ 2006 年, 蒋润苑夫妇书法展。



/ 蒋润苑。



/ 2015 年, 蒋润苑接受中央电视台《我的抗战》栏目组采访。

天。我们应该以父母为榜样，珍惜和过好当下最年轻的一天。

父亲百岁时，由他口述，由子女执笔完成了一本书：《我的一个世纪——一个黄埔老兵的自述》。父亲在书的结束语中说道：“我们俩是普通人，没给孩子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留下了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家风：读书的要好好学习，在岗的要好好工作，退休的要好好生活，都争取做个爱国的好公民。”

我的父亲——百岁黄埔抗战老兵 吴道华的传奇人生

□ 吴如雄

2021年1月31日晚，走过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后，我的父亲——黄埔抗战老兵吴道华在贵州凯里家中安详辞世，享年101岁。

父亲吴道华，黄埔军校第19期毕业生。他曾在战火硝烟的岁月里与入侵日寇拼死相搏、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为北平和平解放秘密工作、成功策划多名国民党军官弃暗投明、也曾在家乡凯里带队与土匪激战周旋……他的经历，就像一本书，记录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

谋求出路，考进黄埔军校

1921年，父亲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原炉山县）舟溪镇黄金寨一户苗族农民家庭。14岁小学毕业后，他不顾家人反对，5天5夜徒步400余里来到省城贵阳求学。在贵阳，他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用省下的钱请人补习文化，寻求人生出路。

1941年，黄埔军校在贵阳招生，父亲通过考试被录取。19岁的他与新生一道，从贵阳出发，步行一个多月到达成都，跨



/ 晚年的吴道华。



/ 吴道华的“中正剑”。

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大门，成为第19期1总队步兵科学生。近3年的军校训练与学习，将父亲锤炼成一名铮铮铁汉。毕业典礼上，父亲作为黄埔军校10名优

秀生之一获得校长蒋介石署名并亲自授予的“中正剑”一把。

佩剑伴身，伏击日寇“征粮队”

1944夏，父亲被分发到湖北秭归，进入国民革命军76军135师（后整编为76师135旅）军部，最初在军部任见习参谋，之后分到135师404团任少尉排长。

“当时战事，法西斯节节败退，日本鬼子已成了丧家之犬。”父亲说，他们所在部队分散在湖北宜昌、沙市一带乡镇，主要伏击从城里到乡镇来“征粮”的日本兵。

一次，在沙市外围某村寨，老百姓报告，有一小股日军要进村来“征粮”。父亲知道后，带领全排战士悄悄摸到村口埋伏起来。日本兵大约来了一个班10多名，刚进村口就遭到了伏击。“打得好过瘾，鬼子死了8个。”父亲一边比划一边说。

一天中午，父亲与战友们在一处山路上与返城的10名日本“征粮队”士兵遭遇。当时，日本兵没有征到粮食，就抢走了老百姓的几头山羊。枪声响起，几

名日本兵应声倒地，其余人连山羊也顾不得拉走，仓皇逃走。

像这样痛击日本“征粮队”的战斗，父亲大大小小经历了20多次。每一次战斗，他始终佩剑不离身，牢记“誓死保家卫国”的训条，带领战友们与日军拼死相搏。

转眼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当时，驻扎在城外的父亲与战友们并不知道这一消息，直到听到城里百姓放鞭炮庆贺时才知道。

父亲回忆道：“打开鬼子交出的仓库，都是成堆的粮食与毛毯、军服等。他们军帽上的布片设计也很特别，可遮阳又可防蚊蝇叮咬，夏天急行军时还可煽风降暑。缴获来的日本皮靴，许多是脚拇指与另四指分开的，分发下来没人能穿。日本兵个子不高，他们的‘三八大盖’装上刺刀后比他们身高还长。”

潜伏北平，随傅作义部起义

1947年3月，父亲随所在国民党135旅（前身为135师）进攻中共陕甘宁边区并进入延安。到达延安时，父亲因身体虚弱，全身浮肿，被送到西安住院治疗。

不久，发生了著名的延安保卫战之“羊马河战役”，父亲所在的国民党135旅在子长县羊马河附近进入解放军伏击圈，全旅4700多人覆没，旅长被活

捉……

父亲病愈后无部队可回，便从西安回到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经黄埔校友徐幼常引见，父亲被聘为黄埔军校驻北平军官训练班教官、军械科上尉科长，于1947年10月到达北平，训练华北“剿总”傅作义部营长以下军官。

在北平，父亲被中共渤海军区城工部（领导敌占城市地下斗争的首脑机关）发展为驻北平城工部地下工作者，潜伏于傅作义部，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秘密工作。

1948年12月，父亲与军训班一道随傅作义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秘赴西南，策划动员同学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遵照渤海军区指示，父亲仍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被秘密派往当时未解放的西南策划国民党旧部起义投诚，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1949年6月，父亲进入西南抵达重庆，找到在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汽车队任分队长的金儒瑜（贵州麻江人，黄埔同学），告诉他此行的使命。随后，在父亲的策划下，金儒瑜率汽车队在成都起义，向人民政府移交了大小车辆56辆、官兵200余人、卡宾枪10余支等物资。

之后，父亲回到贵州进行秘



/ 吴道华在黄埔军校19期同学录上的照片。

XXX次回校甲汇报表			
名	吴道华	出生年月	1922.9
级别	行政8	入党时间	
前享受供给制还是薪金制	供给制	生 活	按月标准工资每年
生离休和发离		补 贴	增 收
受晋证时间	1943.10		月 工 资
1948—1949：任北平城市纠察队副队长；镇远县分队分队长；1950—1953：任炉山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普安县剿匪副指挥长；1953.10—1957：普安县民政科副科长；1957—1959：落实政策到革山乡人民政府民政科科长；1959—1968：革山乡人民政府民政科科长；1968—1978：革山乡建新村建新组副组长、组长。			

/ 吴道华参加地下党工作的履历。

密活动。他利用同乡及国民党军官身份，潜入国民党部贵州省第七专署任少校副官，并在老家凯里舟溪、丹寨南皋等地招募青年80余人组织成立贵州省第七专署青年工作大队，自任少校大队长。父亲在第七专署取得步枪54支、子弹500余发和部分被服后，于12月率领青年工作大队在丹寨南皋起义。

其间，父亲还遇到一直徘徊观望时局的国民党89军独立营营长李鸿昌，他和父亲既是同乡，也是同学。经过父亲多次劝说，李鸿昌于12月带领其残部30余人携装备精良的美式卡宾枪、轻重机枪等物资向贵州省炉山县（今凯里）人民政府投诚。



/ 北平起义前的吴道华。



/ 1955 年的吴道华。

身份公开，指挥家乡剿匪斗争

1950年2月，在完成上级交予的策反任务后，渤海军区将父亲的工作关系转到贵州省炉山县委，正式公开他的“潜伏”身份。

随后，父亲担任炉山县武工队队长、炉山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凯里剿匪指挥长，相继



/ 100 岁的吴道华(前排中)与家人合影。

指挥凯里保卫战、万潮大激战等剿匪战斗。父亲在凯里大阁山驻守时，与土匪激战中险些被子弹击中头部。

1950年8月，父亲从炉山县调往贵州省委工作团，赴贵州平坝县、普安县搞土改工作。后来留在普安县任民政科长。1958年，被划为“右派”劳教。1979年恢复工作。1983年，在平坝县民政局离休。1987年回家乡贵州凯里定居。

心系国家，为祖国统一发挥余热

1988年，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父亲被选为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黔东南州联络组组长。他利用黄埔同学身份，负责与黔东南籍台港澳地区黄埔同学联络，至90岁高龄还在为祖国统一事业劳心劳力。

6年前，父亲原单位来人看

望，带给我们父亲档案的复印件。在翻看档案时，我们才得知，父亲当年曾有过两段潜伏经历。这应该是他参加革命工作后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但此前他从未向家人提及。当秘密公开，父亲才向我们讲起这两段往事。

父亲说：“那几年，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随时随地都怕身份暴露而丧命。”父亲告诉我们，前后两段潜伏，好在收获不小，许多老乡、同学、部下在他的动员下率部起义。

2021年1月31日，父亲逝世后，其离休前工作单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民政局以及平坝区委组织部、平坝区委老干部局、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关爱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等单位和团体，都赶来凯里悼念。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我的风雨人生

□ 骆大仁

1946年深秋，我生于成都双流县城。1949年，父亲骆德敬（黄埔高教班毕业）升任原新12军少将高参，履行军务督导之职。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强大攻势，挺进大西南。父亲为促进成都和平解放，以利民生，多次和军部核心高层沟通密议起义之事。此时，我舅父乐恕人（原《中央日报》副总编，二战期间驻欧洲盟军总部记者）专程从南京赶赴温江，同我父亲见面，称已帮我们全家办妥去台湾的机票证件。父亲心系起义，不能明言，婉言谢却。父亲随即在军部高层会上，讲明能去台湾，但不去之理由，极大地推进了原新12军指挥中心的起义行动。1949年12月22日，在人民解放军60军的指导下，新12军通电全国，宣布起义。12月23日，原国民党军西南地区总指挥胡宗南逃离成都。12月30日，成都市区天空晴朗，欢歌笑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上午9时整，解放军入城式隆重开始。

父亲起义后，先到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数月之后，正式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高级



/ 骆大仁(右一)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军官研究班学习，并被定为正师级。按照部队规定，我母亲带领全家随军生活。我们进入全新环境，母亲进入妇女队，大姐骆大华读中学，兄长骆大正读小学，我尚年幼，在儿童队。我们享用部队供给制，衣、食、住、学全部免费，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6万元——10万元（时为旧币制）不等。我所在儿童队，大约50余人，年龄均为4—5岁（父辈均为起义将领），我们9人一组学习，由一位解放军陪伴。早晨，同部队指战员（基本是南下入川人员）同出早操。在大操场进

餐，席地而坐，围成一圈，主食有白米饭、馒头、油条、油饼，主菜为北方菜，大块猪肉搭配豆腐粉条和白菜，闻之甚香，入口味美。每星期六，还有北方特色之饺子品尝，小学友们喜笑颜开。平日里，解放军姐姐教我们这群小学友齐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等革命歌曲。我们这群小学友，在共产党的光辉照耀下，心情舒畅，快乐生活，在人民解放军的怀抱里健

康成长！

也许上天要给我们一些磨练，让我们历难而知成长之艰辛。1951年12月，父亲被错判，进入“西南战犯管理所”学习劳动。母亲带着我们千里迢迢重回故乡，开始艰难生活。1961年，在矿山工作供我上学的四姐突遇意外事故，不幸亡故。后温江县民政局（时年，温江、双流合并为温江县）将我安排在温江当工人。那一年我15岁，父亲送我到温江上班，父子沉默行路，一路无语。临别之时，父亲满脸痛惜之情，对我缓缓而言：“仁儿，你从此将独身一人，在温谋生，举目无亲，处境甚难。从此之后，尊敬师父，学好技术，以利生计。空闲之时，多看书报，学写文章。你记住一句话，英雄只怕受恩多。凡事要先靠自身奋进，不要轻易求人之助。”此后，我一直牢记父亲的话语，自力更生，勤学苦干。数十年岁月，我的职业甚多，工厂工人，菜站经销，长毛兔养殖，商店承包人，省刊记者。1987—1988年，我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学习，临近考试，家门之上张贴众多法律名词纸条，进出皆看，增强记忆，闭卷开考，平均获得92分，被评为优秀学员。

1994年，经我兄长骆大正介绍，台湾商人投资温江，成立台商合资御佛滋补酒有限公司，我



出任台商代表兼公司副总经理，为温江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2000年，我被聘为某企业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分管法律、行政、旅游等各项事务。2017年，我担任区政协委员。2017至2020年，多次现场参与在全区推进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2018至2020年，连续三届区政协全会上所提交的提案，均获成都市温江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肯定。2018年，区政协党组在全区173名委员中选两名，在社区设委员个人工作室，我有幸入选。2020年8、9月，温江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都市温江区柳城街道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先后聘请我任成都都市温江区社区发展治理品牌顾问、柳城街道党风廉政监督员。此外，我还是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后代联工委委员。我深感

责任重大，唯有诚心诚意，奋进工作，才能对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

受父亲影响，我自幼爱好文学，一直做着我的文学梦。1960年，我上初中时，老师出题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之名作《卖炭翁》改写成散文。时逢秋季，我反复阅读此诗，观窗外秋风落叶，以《深秋》为题，写成生平首篇习作。老师阅后连声称赞，并给出100分。自那以后，我更是信心满满，痴迷写作。几十年来，我笔耕不辍，颇有收获。1988年，第一篇微型小说在南京《青春》月刊发表，并有幸获奖。1997年，第一篇武术报告文学在《锦江》杂志刊登。1989年，第一篇法制报告文学入选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专集。2015年，第一篇纪实文学《心底无私天地宽》参加《今古传奇》杂志社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活动获奖，并收录进今古传奇传媒集团主编的《优秀作品精选》。2018年，散文《父母情意常怀念》幸获湖北省文联“中华文学奖”。2013—2019年，有幸在区政协《温江文史》连发7篇温江黄埔历史文章，在《四川黄埔》发表多篇抗战历史研究文章。

今后，我当加倍努力，用我的作品颂扬先进人物事迹，讴歌祖国美好未来。
黄埔

富阳黄埔同学口口称颂的“堂倌”

□ 龚玉和

在杭州富阳，有这样一位黄埔后代，他是当地黄埔同学口口称颂的“堂倌”，虽年过七旬，但是仍热心黄埔工作。2018年，



/ 王中领。



/ 王江龙。

他荣获富阳区委有关部门特别奉献奖，他就是富阳区黄埔亲属联谊会秘书长王江龙。

王江龙，1949年出生，浙江富阳人。父亲王中领（1917—2015）是黄埔19期学员，参加过淞沪会战、富阳景山阻击战、浙赣会战等，亲历了侵浙日军受降仪式。2020年9月11日，我们采访了王江龙，请他讲讲他的黄埔情缘，以下是他的自述。

参与富阳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

我从小在富阳场口镇洋沙村长大，改革开放后，场口医院成立了一家包装印刷厂，我到工厂

打工。由于为厂里联系了不少业务，加上待人诚恳、做事稳健，我不久就成为包装印刷厂的供销科科长。

1988年后，我从包装印刷厂辞职，自己办了一家制作信封的小厂。我做过多年供销科科长，有途径拿到较便宜的原料，至于“糊信封”的工序，我就把它分散到全村的各家各户。这样，村里许多闲在家里的妇女和中老年人，就可以承接活计。由于我是按量计酬，手脚麻利者，一天可以糊上一万多只，一般的每天也能做五六千个信封，此举也为村里不少闲散劳动力提供了额外收入。

后来，有人效仿也办起了信封制作加工厂，竞争日益激烈。这时，正好有位亲戚在富阳城里开了家招待所，缺少人手，叫我过去帮忙，我借机将信封厂息业，到招待所工作。说来也巧，父亲参加富阳黄埔军校同学会后，联络了不少当年的黄埔校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出行搞活动等都不是很方便。我是黄埔二代，平日里就经常帮着他们张罗一些具体事务，到招待所工作，时间更加灵活，工作内

容也更加贴近他们的需要。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同学会有点事，就会想到我，打个杂、帮个忙，到乡下跑跑腿，或者联系开会场所以及车辆等。这样的差使，我是来者不拒。

2002年，我当选为富阳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筹备成立富阳区黄埔亲属联谊会

富阳区黄埔亲属联谊会（下称“联谊会”）是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延续，2005年，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王庆良与副会长赵荣惠就提出成立区黄埔亲属联谊会的申请。

2011年3月22日，有关部门批复同意成立，鼓励我们要利用好黄埔这块金字招牌，与海内外的黄埔组织加强联系，做好两岸黄埔同学二、三代的工作。2015年8月7日，区黄埔亲属联谊会正式成立，我们配合区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展了对抗战老兵的甄别工作。同年9月，我们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全程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全区抗战老兵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以及5000元慰问金的活动。后来，我们一起参与了由杭州“关爱老兵网”发起的寻找抗战老兵活动……联谊会成立至今，先后参与了黄埔前辈17人、抗战老兵32人的逝世告别活动。



/ 洪秀柱、郝柏村为景山公园题写的字。

筹建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

景山阻击战是富阳抗战史上最著名、最惨烈的一次战斗。1940年10月，日军调集土桥22师团、高桥11旅团等万余兵力“扫荡浙西，窜扰富春江南”，其中数千日军分五路扫荡富阳、新登二县。这是日寇占领富阳县城以来出动人数最多、范围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扫荡。次年（1941年），在景山乡公所担任事务员的中共党员何益生（1913—1991）提议为国民党军队79师235团在黄泥岗阻击战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将士建立纪念碑。几十年来，这个纪念碑一直竖立在常安镇景山乡的一个山坳里。

20世纪50年代后，父亲带

领全家落户在离常安镇不远的场口镇洋沙村。每次经过常安镇时，父亲都要去纪念碑前祭拜。当地老人也都知道纪念碑的来历，自觉地成为它的保护者，因此，它至今保存完好。

富阳区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黄埔同学不时提到以这块纪念碑为中心建立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世人展示，引起富阳县委与相关部门的重视。

2015年，景山阻击战公园列入富阳区投资项目。2018年3月30日，公园作为浙江抗战纪念馆的重要延伸开工，总投资215万元。富阳区黄埔亲属联谊会副会长、鼎杰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华龙元、华杰父子，为公园捐赠了

价值20万元的石材。

景山阻击战纪念园于2019年开园。开园至今，先后迎来了以陈盛文将军、傅慰孤将军为团长的台湾黄埔四海同心会参访团，台湾黄埔军校同学会后代联谊会会长丘智贤一行和美东黄埔陆军官校同学会会长何忠言一行。公园建设获大家一致好评。

筹建宵井村抗日将士陵园

2014年春，我到宵井村附近办事。当地一位村民告诉我，有许多抗战烈士墓碑散落在村后的山岗上。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让村民带我到现场勘察，事实果然如他所说，但有关墓地的历史他也不了解。

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知道这些墓地的情况。于是，我找到那位老人，详细了解了当年埋葬抗日将士的前后经过，并向区委有关部门反映。在区委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分别到区志办、区档案馆、富春街道调研，查找了相关历史资料。在各级领导与热心人士的奔走协助下，建成了宵井村抗日将士陵园。

大源蒋家村抗日纪念碑的由来

2008年6月11日，区委一位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信，说：“大源镇蒋家村有位老人写信给区黄埔军校同学



/宵井村抗战史料陈列馆。

会，说他们村在抗战时驻扎过抗日部队，村旁埋过好多牺牲的将士，老百姓想建块纪念碑，你去了解一下情况。”

第二天，我去蒋家村找到了写信的蒋雪谷老人，老人已是77岁高龄。他说：“1937年，我6岁，父亲曾是大源镇镇长，对情形知道一些，国民党驻富阳的军队经常出兵到凌家桥、转塘一带打击日寇，因装备太差，每次出击都有官兵牺牲，遗体运回来后，先放在村关帝庙，由于棺材少，只能一棺放几个人，最后抬到黄泥潭高家墩埋葬。我亲眼见到一个个小土包的坟墓，墓前竖立着木牌，上面写着毛笔字，至少有几百具遗体，并非全是东洲战役阵亡者，也有凌家桥等地牺牲的人。”

他还说，日军进驻白鹤后，又企图进犯东洲岛，遭到我军阻击，发生了东洲战役。蒋家村是国民党军队司令部驻地，牺牲者大多数运到蒋家村安葬。村

民对那些舍身报国、葬身异乡的将士充满敬意，建议造一块纪念碑，以纪念牺牲的勇士，并昭示后人勿忘国耻、热爱祖国。

我建议先由村民自发捐款，老人次日便发动捐款。村民争相参与，连外来打工者也加入其中，还有村民要将自留地无偿捐献出来作为建造纪念碑的场地，场面相当感人。最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建起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奔走两岸

2016年10月，我应邀赴台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其间拜访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荣誉副主席蒋孝严、时任党主席吴敦义等知名人士，以及台湾一级上将郝柏村、二级上将戴伯特等多位台湾退役将领，并请他们为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和宵井抗战烈士陵园题字。近年来，富阳区黄埔亲属联谊会先后接待了由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美东黄埔陆军官校同学会等组织的参访团体。此外，我寻求一切机会向台湾有关人士宣传祖国大陆近年来的发展成就，阐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呼吁大家共同担负起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责任。我认为，这是黄埔后代传承弘扬黄埔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军史布衣第一人：陈廷贤

□ 林爽爽

仲春时节，天地清明，祭奠先人、追思怀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回顾长征，“三大主力”尤其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故事脍炙人口，震魂摄魄。从鄂豫皖大别山里走出来的红25军就是长征队伍中的一支。红25军的组成比较特殊，战士大多是鄂豫皖根据地在战斗中牺牲者留下的孤儿，长征时，这支部队中的战士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所以红25军又被称为“娃娃军”。

1932年以前，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蒋介石曾亲率50万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25军处境日益艰难，并因为没有电台而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面对根据地的危险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委派在当地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找中央汇报，经几个月的跋涉到达瑞金。

成仿吾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去。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我的父亲、时任红22师师长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前往。1934年6

月，周恩来找程子华谈话交代，中央已经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红25军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到外围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程子华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1934年9月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1个月，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吴焕先任政治委员、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全军2980多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并为出师北上发表宣言。在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25军在数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下，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中枢地带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孤军转战，威震陕甘，先期到达陕北，做了中央红军长征北上之“先导”。

红25军长征经过河南卢氏县时遭遇险境，多亏一位货郎带领红25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出豫入陕，让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全部落空。他就是载入红25军军史的一位老百姓，被誉为“军

史布衣第一人”的陈廷贤。

带领红军出险境

1934年12月4日，红25军的4个团近3000人到达豫西的卢氏县，此地地势凶险，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能够快速从这里穿过，红军制定了“直奔豫陕边界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伏牛山进入陕西，必须经过两个隘口，朱阳关和五里川。早在红25军刚刚启程之时，蒋介石就亲临武昌督战，在半个月前调集在开封的国民党军第19军60师上万精兵沿陇海线西下，早于红25军抢占了五里川和朱阳关这两处关隘，并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

当红25军发现这一情况时，从后面追来的国民党“追剿队”第二支队数万兵力已经赶上，距离红25军只有70里了。南面又有豫西军阀“内乡王”别庭芳部的夹击，只有北面没有国民党军，因为那里是黄河天险。红25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蒋介石更是乐观地认为，现在的红25军就是“插翅也难逃”。

此时，红25军中出现了让人感动的一幕，伤病员们知道自

已继续长征会是军队的累赘，于是联名给部队领导写了血书，坚决要求把担架队的士兵充实到连队，由伤病员集体断后。他们在血书的背后附上了各自的籍贯，表明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红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伤病员断后的事情。硬拼显然是不现实的，程子华等军领导决定充分依靠当地群众，派遣侦查队多方寻找熟悉小路的向导，带领红25军走出险地。然而，豫西一带从来都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地，当地居民看到穿着军装的红军，以为又是哪股军阀要来祸害地方了，都躲进了地主民团控制的寨子。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出去侦查的手枪队在距离卢氏县20余里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位去赶集的货郎，这个货郎就是陈廷贤，他愿意帮助红军带路。

陈廷贤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13岁时随着堂哥外出谋生，起初在晋南运城下井挖盐，后来经常挑担贩盐到黄河南岸的三门峡、卢氏县一带。为了多赚点钱，陈廷贤就经常在这一带的山里走小路以躲避关卡，渐渐地对这一带山中的地形十分熟悉。他在贩盐的间歇也做糕点买卖，并在卢氏县落下脚来。

陈廷贤随着侦察队的同志

来到了红25军军部，受到了程子华的亲切接待。同时，陈廷贤也被这些衣衫褴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娃娃军”深深感动了，他看出红军才是“穷人的队伍”。程子华是山西运城人，和陈廷贤攀谈之间得知两人居然是老乡，立刻熟络了起来。

陈廷贤从小生活困顿，长大后走南闯北见过很多军队，却没有见到过这样热心关心群众的军队。他深受感动，想到当务之急是带领红军脱离险境。他说：“我这些年来挑着货郎担子在卢氏四野八乡来回跑，走过一条小路，这条路只有当地牧羊人才走，其他人一般不知道。这条路虽然险要、崎岖，但可以绕过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直插陕西的洛南！”程子华立即和红25军的领导研究，最终决定采纳陈廷贤的建议，冒险从这条小路入陕。他们信得过这个年轻人，决定把“宝”全压在他身上。

为了麻痹敌人，红25军还给敌人使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就是派出手枪团，到朱阳关附近的村子里贴标语，虚张声势，给敌人造成红25军将从朱阳关入陕的错觉，从而让敌人把更多的力量调集到这里。

1934年12月5日凌晨，趁着

刚刚亮的天，红25军在陈廷贤的引导下出发了。这一天走的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小路，其中有一处号称“一线天”，更是凶险。傍晚时，部队就快要到达卢氏县，为了不打草惊蛇，红25军领导当机立断，决定连夜绕过县城，通过急行军到达横涧镇河口望云庵一带露营。

12月6日，红25军主力又从横涧镇向龙驹寨挺进，当地的保安队企图拦阻红军，当即被消灭。

12月7日，红军多路隐蔽行进，直奔豫西与陕西交界的兰草村，并在此宿营。

12月8日，红25军先头部队继续直扑豫陕交界处的要塞铁索关，敌军不敌红军，很快溃逃，红25军顺利打开了进军陕西的大门。

就这样，红25军在陈廷贤的带领下，走了一条敌人根本想不到的“油盐小道”，攀山涉水，披荆斩棘，穿越大石河、水峪河、文峪峡谷，又冒着卢氏守城敌军的枪林弹雨快速西进，经过三天三夜，终于顺利进入陕西商洛地区。如此一来，蒋介石想要在卢氏县的两处隘口包围红军的计划没有得逞，几万国民党大军布置下天罗地网，却连一个红军影子都没看到。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程子华代表红25军赠送给陈廷贤

10块大洋当做报酬，陈廷贤却说什么也不要。于是，程子华与吴焕先就写了一张字条，盖上大印给了陈廷贤，告诉陈廷贤要妥善保存，并郑重地向他说：“小老乡，你受苦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了！”从此，这几句话被陈廷贤记了一辈子！

终其一生心向党

送别红军后，陈廷贤又翻山越岭回到了卢氏县的家里。回家当天，他就被民团的人给抓了去，要治他给红军当向导的罪。陈廷贤就是不承认，说自己这些天贩货去了，没有给人带路，民团的人把他押到城隍庙，折磨了三天，又把他放了。

后来陈廷贤想到，自己虽然不识字，但是程军长给他的那张字条太危险，万一被人看到肯定要掉脑袋，于是就把字条塞进土坯房的椽条小洞里。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打到卢氏县，战火把陈廷贤的两间土坯房连同纸条一起化为灰烬，至于纸条上究竟写的什么，陈廷贤自己也不知道。

此后，陈廷贤过起了往常的生活，给红军当向导一事也不敢再提。1940年，陈廷贤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晋城，娶了妻子吉桂枝，婚后回到卢氏县横涧乡生活。

1947年，解放军第一次解

放了卢氏县城。陈廷贤千盼万盼，终于等来了这支人民的队伍。然而由于当时敌情复杂，面对卷土而来的敌人，解放军又选择了撤离。这个时候，陈廷贤发现很多军用物资没来得及保存，想到自己应该算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冒险为解放军把军用物资隐藏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廷贤在卢氏县副食品公司参加了工作，在西街门市部当售货员。也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程子华就任山西省主席，他曾先后6次派人寻找陈廷贤，由于陈廷贤的山西口音比较重，所以大家只记得他名字的发音是“陈廷献”，因此寻找多次无果。

1949年之前，陈廷贤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自己为红军带路的事。后来，陈廷贤认为新中国成立了，自己帮助红军渡过险关的事情可以往外说了，并且多次向单位领导说自己在1934年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还要求补交党费。组织上询问他原因，他又将自己在1934年给红军带路的事陈述了一遍。然而让陈廷贤没有想到的是，领导和周围的人都不信任他，认为他是在吹牛，是“美化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当人们问他，他带路的红军是什么番号，军长叫什么名字时，他都答不上来，因为在当时部队的

很多情况都属于保密范畴，不能告诉陈廷贤，他只知道军长姓程。他说程军长曾给他一张纸条，上面还有印，人们问他纸条在哪里时，他却拿不出来。

1983年，负责红25军战史的编辑人员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山西、河北、河南，才得知陈廷贤的确切住址在卢氏县。红25军所掌握的资料与陈廷贤本人讲述的完全一致，从而确定了他的身份，然而此时的陈廷贤已经重病卧床。当程子华和红25军的老首长们听闻此消息，了解到卖货郎一生的坎坷经历时，无不感慨万分，泪流满面。没有陈廷贤，哪里来的红25军！

1984年农历正月十二，陈廷贤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嘴里不住地念叨：“朱阳关、五里川”“纸条、大印”。他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对自己的老伴和女儿说：“我死后，你们要将我埋到县委党校旁，我追求一辈子也未能入党，死后还要追求入党，我要头枕党校、面朝红军走过的路，永远地看下去……”

经过中央军委的介绍，卢氏县委、县政府对陈廷贤的事迹非常重视，根据陈廷贤生前的遗愿，1996年3月，陈廷贤被安葬在县委党校旁边的公墓里。陈廷贤的墓是一个老百姓的“红军”墓，位于卢氏县城东北方向县委党校附近的一个小

忆湘西会战

□ 刘振荣

1944年，我毕业于西安黄埔军校七分校18期，时年21岁。当时我写了请示，要求到第一线去打日本鬼子。经批准，我被分配到湖南抗日前线中国革命军第100军，任军部参谋处一科少尉见习参谋。

我的任务是管理军事地图、部队伤亡、战绩、驻址及所在阵地位置，还要值守夜班电话等。有一天我值夜班，后半夜，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来电话，传达对日作战计划和命令。我记录后连夜抄写了一份速送科长，呈军长阅。这是一份大的作战

方案，要3个军打一场围歼十几万日本鬼子的湘西会战（3个军即100军、74军、73军）。这是一份绝密文件，部队马上开始部署行动，军部由邵阳的竹篙塘转到溆浦城附近。刚住下，前方战场就来电话，我们的部队开始与日本鬼子打起了包围战，3个军包围了日本鬼子十几万人。100军19师3个团是主力，军官和战士们多半是湖南当地人，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他们在战场上作战非常英勇。

我们参谋处的人员随从军长指挥作战，在电话里就能听

到猛烈的枪炮声，工作非常紧张。军长在电话中对19师和63师师长说：“你们不能丢掉一寸阵地，要把包围圈包得紧紧的，一定要把这群鬼子消灭掉，叫他们一个也不能跑掉。”我忙着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标示着鬼子的所在地、我军包围进攻敌人部队的所在位置，以及前方部队伤亡情况，供军长指挥作战参考。最后，3个军经过七天七夜的奋勇杀敌，消灭鬼子共8万多人，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走过的100多华里的山沟里和小河旁，鬼子的尸体、死马到

山坡上，这是他生前为自己选择的长眠之地。刻有“陈廷贤之墓”的墓碑，是中共卢氏县委员会和卢氏县人民政府所立。墓碑背后是《陈廷贤墓志》碑文。1985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中，用300字记载了陈廷贤帮助红25军脱险的史实，陈廷贤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被载入军史，被称为“军史布衣第一人”。

现在，卢氏县县城广场上有8根石雕柱，雕刻了红3军和

红25军长征途经卢氏县的画面，其中有一个主题叫《我带红军出重围》，讲述了陈廷贤带领红25军出豫入陕的事迹。

2020年11月重走红25军长征路时，我第一次到河南省卢氏县，来到陈廷贤的墓前祭奠，见到了陈廷贤的后人。在现场，我跪地叩首，代表我们全家及所有红25军的后代，感谢陈廷贤对红25军3000将士的救命之恩！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

望当年那段苦难和辉煌，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陈廷贤面对生死的考验毫不畏惧，帮助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他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对待先辈的态度，影响着它的兴衰存亡。无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无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恶臭的气味。

青岩之役，是湘西会战的转折点。1945年4月底，沿邵榆公路西犯的日军130联队、133联队及116师团本部已推进到雪峰山中段主峰下的江口、青岩、铁山一带。其右翼109联队则已越过雪峰山主峰进至龙潭司附近。最后一仗的主战场为雪峰山东麓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一带。

湘西会战中，中国革命军第100军围歼主力沅水以东的龙潭司地区之敌。但是，日军的多路进攻明显暴露出其兵力分散不足，易于被我各个击破。同时，雪峰山地形复杂险要，易守难攻，对我军有利。因此，要采取诱敌深入之策，待敌进入我军进攻有利地带，乃进行全力反攻，将分路进击之敌各个歼灭于雪峰山区。

当时战报57团的战情：5月2日，日军133联队主力500余人，炮2门又向我青岩阵地猛扑，钟雄飞率第2营与敌反复争夺，战斗至烈。申刻，我空军飞临助战，向日军反复轰炸扫射，日军伤亡严重。同时，我炮兵发挥威力，日军受我猛袭，狼狈溃退。酉刻，日军又增兵再扑青岩。戌刻，敌更不顾伤亡增至千余人，蜂拥突进，与我军展开血战。3日拂晓，日军再疯

狂增兵500人左右，准备一决雌雄。钟雄飞看见密集的日军，决定避免兵力消耗，将警戒阵地暂撤至主阵地，立即呼叫我6架飞机凌空反复轰炸扫射日军。大量消灭敌人后，组织重武器掩护步兵适时向敌反攻，又派一部精兵绕到敌后，侧腰打击。激战至14时，敌伤亡惨重，不支而退，我遂将警戒阵地恢复。下午17时许，敌稍喘息后再增兵400人左右，在炮兵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扑过来。入夜以后又陆续增至千余人、炮4门，一波一波地彻夜向我阵地连续冲锋，几无停顿间隙。钟雄飞沉着指挥部队，艰难死守，寸土不让，以手榴弹及白刃格斗，敌我死伤枕藉，战况至为惨烈。

记得我在军部处看到的战报内容是：5月8日，战斗特别激烈，双方打得地动山摇。中美空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地飞到江口、青岩一带轰炸日本侵略者。日军没有任何防空武器，被炸得哇哇直叫，山上到处都是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日军尸体。8日下午以后，日军像潮水一样溃败了。

我看到19师57团1连战士英勇奋战的战绩：1连攻打鬼子占领的一个重要山头，几次攻打都拿不下来，全连战士伤亡过半。班长彭斌带着一名战士（姓吴）绕到鬼子的背后，发现敌人

只有一挺重机枪把守，于是两人立即冲上去，把鬼子推倒在地，将重机枪背起来就跑。全连随即冲上，占领了山头阵地，给全团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立了一大功。我将战绩编写成文上报军长，经批示，这位班长提升为上尉连长，姓吴的战士提升为少尉排长。

战后搜集的战报中描述：中国军队还抓了300多日军俘虏。当时一名中国将军听说一次战役抓了这么多俘虏，十分诧异，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与日作战多次，每次不过抓上几个、几十个俘虏，大部分日军在战败时宁愿选择自杀，他们认为作为俘虏苟活是一种耻辱。他来到战俘关押地，看见那些日本战俘大部分未脱童稚之气，一个个蓬头垢面，心中不忍，令看守人员押他们去水塘洗澡。这些日本士兵一见到清澈的池水，顿时嬉闹着扑向水塘。此位将军见状冷冷一笑：“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湘西会战，历时两个月，双方参战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多公里，共歼日军3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近2万人。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湘西会战后，中国革命军第

100军司令部由湖南省溆浦回归竹篙塘防地，19师、63师回到资水河防线进行休整。军部参谋处进行战后总结上报，我和参谋处一科中校科长王梦玉（黄埔12期）负责写战后总结，我负责战争中的各项图表，经过半月的时间才将总结写完订册上报。参谋处共3个科12人，均是黄埔同学，因作战有功，每人提升了一级，我们科长王梦玉提升上校副参谋长，我被提升中尉参谋。

在总结文字和图表中，战士们奋勇杀敌取得的战绩和精彩战斗故事都有记载。他们是中国战士，他们是浴血奋战的英雄，是令人尊敬的中国青年勇士！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每一场战斗都有精彩的战斗故事，我军取得的战绩，是缘于每一个前线战士的浴血奋战，他们用血肉之躯书写着对祖国的忠诚。此战我军死伤惨重，所见之处，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老军人，亦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为收回国土忘我牺牲的战士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不屈的精神如同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湘西近200公里浴血奋战的战场。此战后，参战部队被列为甲等攻击部队。

湘西会战是我的亲身经历，历经岁月依然难以忘怀。湘西战场是我多年的牵挂，我无法忘



/ 刘振荣。

怀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无法忘怀为国杀敌捐躯的战友们，他们的英魂长存！

作者刘振荣（1923—2019），河北望都人。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194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七分校18期步科，曾任苏北军区司令部上尉

参谋、上尉连长。1945年，时任军部参谋的刘振荣主动请缨上前线杀敌，参加了著名的湘西会战。同去湘西100军报到的24名同学中，有17人为国捐躯，长眠于抗日战场上。此文是刘振荣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所写，借以表达对为国捐躯的战友的深切怀念。黄埔

曹艺留下的《1929年中央军校大逮捕事件追忆》

□ 曹景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破裂；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分裂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黄埔军校，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9月这段时间内，在黄埔军校师生中暂时不存在中共的组织和活动。

然而，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1928年3月后，在南京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交通兵大队经考试录取的新生中，就有来自各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有来自杭州26军军官团的共产党员甘棠（甘让）、楼广文、阮大鄆、张渠、罗积穗、曹振铎，来自广州、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共产党员李奈西、梁绍之、丘登明、简立、盛志远、许权、李世昌等。1928年秋，杭州26军军官团特科同学也全部并入南京军校6期。其中有11名共产党员，他们是：朱琦、王校正、孔繁衍、祝树柏、曹聚义（后改名曹艺）、胡让梨、叶修、蔡锡昌、唐时杰、吕农三、郑光祖。

曹聚义到校后，很快与同是来自第26军军官团的交通队同学甘棠、教授部的吕农三取得了联系。三人交换了情况，摸清了在军校中已有30多位经历过“清党”大风浪的共产党员，并初步联络组织起来，正式成立党组织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曹聚义向上海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和组织部长李维汉汇报了情况，党中央认为，在军校内成立地下党组织时机成熟。9月下旬，在南京明故宫大操场开了一个秘密的干部会，曹聚义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军校内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并按



/曹聚义黄埔军校毕业照。

各兵科驻地分散的特点，分设了三十四标工兵支部和交通、通讯支部。此后，随着步兵第3、4大队和军官研究班的编成，又增设了小营和国府后街（今长江后街）两个支部。中央指派曹聚义、甘棠、吕农三、简立、阮大鄆5人为总支委员，曹聚义任总支书记、甘棠任副书记。

1929年5月，军校6期各兵种的学生都完成了毕业考试。除交通兵科有部分同学于3月提前分配离校，绝大部分仍留在原地待分配，同时准备6月1日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此时各兵科均已没有课操，学校对学员的管理较为松懈，地下党员同学之间联系碰头的机会更多了。大家互相激励，商讨着今后分发到各自新岗位后如何加强联系，继续播撒革命火种。而总支书记曹聚义和简立等总支委员们抓紧时间，准备在离校前再发展一批积极要求入党的同学。如交通兵大队第一区队无线电专业的吴人鉴（后改名王诤，解放后曾任四机部部长）是通讯支部李奈西、丘登明和梁绍之等人积极推荐的发展对象，曹聚义已向上级提请审批通过，尚未来得及正式通知吴人鉴和履行发展手续。由于“讨桂”战役发生，吴人鉴已提前两个月毕业分配到国民党军交通兵第1团无线电分队，曹聚义准备让通讯支部的同学及时通知他……

正当革命组织顺利发展之时，谁也意料不到

负责具体领导军校党总支的南京市委军运负责人王昭平(广东人，黄埔4期政治科毕业)竟向他同期同队的同学侯志明(军校政训处组织科少校科长)自首告密，出卖了组织。凡是和王昭平接过头，他记得姓名的人，都被他供了出来。于是，在5月下旬的某晚点名时，突然在炮标和三十四标两处，同时点名扣人。在炮标炮兵大队头一个被点到名的是曹聚义，在三十四标交通兵大队被点到名的有甘棠、简立和阮大鄆。曹聚义适逢父亲病危，早几天已回浙江浦江老家奔丧；甘棠已于3月间被分配到江北某地电台工作，两人均不在场，没有被扣。校方随即明令通缉曹聚义，浙江省、浦江县两级警察局保安队联合到蒋畈村曹家追捕、抄家，曹聚义被母亲藏于蚕房屋顶幸免被捕。甘棠经同学赵壁协助逃往上海，改名甘让隐藏起来。简立、阮大鄆两人当晚遭逮捕。简立被捕后叛党，阮大鄆被捕后在校刊《党军日报》上发表了悔过书。接着被捕的有炮兵大队的叶修、胡让梨，工兵大队的朱琦、果宇新和交通兵大队的李奈西、梁绍之、楼广文、盛志远、许权，军官研究班的甘登谷、丁和钧、罗梦阳，航空班的蔡锡昌，宪警班的郑光祖，步三大队的张三川。在教授部任速记员的吕农三于5月10日已被南京警察厅传讯扣押，经由工兵大队的朱琦、王校正、祝树柏等托人保释出走杭州，不幸又在杭州被捕，押解至南京关进陆军监狱。此事件先后逮捕18人，是被当时国民党政府称为“十八罗汉”的大案。

曹聚义在抓捕中幸免于难后，连夜逃离家乡，在国内外流亡一年多后潜归国内，参加了14年抗战。他在晚年亲笔写了《1929年中央军校大逮捕事件追忆》的材料交给子女珍藏，并嘱咐子女届时将此稿投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研究会和黄埔军校历史研究会。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自1928年秋成立到1929年夏组织被破坏前后仅10个月时间，但是在中国共产

党史和黄埔军校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并有其特殊意义。这个“特别总支部”是黄埔军校校史上唯一一个全部由黄埔同学组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之完整，人数之多也是黄埔军校历史上罕见的。这段历史不能被埋没，在“十八罗汉”案中牺牲的共产党员的英名不能被遗忘。(在“十八罗汉”大案中牺牲的共产党员郑光祖，1950年被浙江省民政局认定为烈士。)

1929年中央军校大逮捕事件追忆

曹艺

1929年5月初到中旬，黄埔军校南京本部(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0天内发生两次大逮捕事件。被称为根绝军校共产党的大案，共逮捕18人，被通缉2人。这两次逮捕，在南京校本部、炮标、马标、国府后街、三十四标等几个营房，教职员宿舍、航空班、军官队、炮兵大队、步三大队、交通大部、工兵大队、宪警班等各兵种营房同时进行。这两次抓捕对地下党破坏很大，国民党反动派兴高采烈，这就是有名的“十八罗汉”事件。

被捕的18个人是：吕农三(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总支组织委员)、简立(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总支宣传委员)、阮大鄆(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总支委员)、叶修、胡让梨、果宇新、朱琦、李奈西、梁绍之、盛志远、许权、楼广文、张三川、丁和钧、罗梦阳、甘登谷、郑光祖、蔡锡昌。

此外，没有被捕到，由蒋介石、何应钦明令通缉的两人为：曹聚义(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总支书记兼南京市军委委员)、甘棠(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总支副书记)。

被捕的18人中，梁绍之、罗梦阳在还是未决犯时瘦毙狱中；吕农三、简立、阮大鄆三人被判8至12年不等(吕农三坚贞不屈，不知下落；简立背叛组织，



/ 曹艺手稿。

出卖同志，很快释放；阮大卿背叛组织，投入军统特务组织，但未出卖同志，也很快保释），其余13人坐了2年左右的牢，没有承认组织关系，宣判无罪释放。

一、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特别总支的成立

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革命浪潮激荡全国，北伐胜利势如破竹。蒋介石勾结了英、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策划反革命事变，在上海公开进行“四一二”大屠杀。在广东黄埔军校，指使黄埔6期在校学生戴笠组织反革命集团，杀捕黄埔学生中的“赤色分子”。在大混乱中，黄埔军校在校的第5、第6期同学中平日暴露了面貌的共产党员，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极少数逃出黄埔，另找生路，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同志，纷纷离校。那些不参加党派活动的同学，也成批离开广东，奔向南京。又因逃避孙传芳反扑龙潭之战，流亡到杭州、苏州，俟战局稳定下来，再回到南京。到1928年夏，蒋介石喘息稍定，着

手整顿军校，对5期采取维持原状方针，把原来5期的同学略加整理，限期结束。对第6期则大加发展，除了收罗广东黄埔流亡来的全部学生之外，还限令各军师和各地办理着的军事校、班员生，全部并入南京中央军校第6期，按原来员生的学科，增设若干特种兵科队。原来在南京的军事技术学校和在杭州的26军军官团特种科，都并入为6期交通队、汽车队、工兵队、炮兵队、辎重队。各队并入后，我地下党成员，已进去了不少，但迄未能恢复组织，没有活动。当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大屠杀，杭州很快笼罩在白色恐怖里，江浙的地下党、团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杭州贡院前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残存的一个共青团小组，最后也到了非转移阵地不可的地步。经杭州市地下党、团领导决定，把团员黄立身、曹聚义送进原浙军第3师新投进国民革命军改称第26军军官团当学员。他们很快在这个军官团里生根开花，3个月时间里，由市委介绍转关系来的和他们自己发展的，在全团6个中队里的5个中队中建立了团小组，开展“读书会”半公开活动，

发行《秋风》地下报纸，学习文件，宣传马克思主义。9月下旬的一次支部大会上，市委领导表扬同志们是在蒋介石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飞出来的凤凰，是从革命低潮中挺过来的汉子。鉴于大家在军队中的特殊环境，全体20余成员，一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在这个会上（在西湖三潭印月附近两篷游船中）宣布，不另举行仪式了。当时，党团是统一领导的，同志们听到宣布，无比振奋。

随着军事政治局势的变化，26军军官团离开杭州，移防到扬州便益门，地下党的关系也转移到扬州，很快就接上了关系，和扬州中学的党组开展联合活动。1928年初，南京军事交通学校来扬州招生，我党成员甘棠、李世昌、曹大铃、楼广文、阮大卿等十余人也被录取前往，由扬州市委介绍组织关系，指定甘棠负责联系。但是到了秋间，他们并没有接上关系，大半年没有开展活动。

1928年2月底，26军军官团毕业，部分同志随着分发的单位，奔赴苏北鲁南各地，由扬州党组分别替他们介绍关系，其中有的为革命做出较大贡献，如杨成玉，是浙江亭旁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在太行山区参加了武装斗争。有的脱党，不再与组织发生联系了。这个军官团结束时，又在毕业生中考选百余，成立特种科，分炮、工、辎三个队，仍旧迁回杭州梅东高桥营房办理。回到杭州，重归旧地，曹聚义比较熟悉，很快找到领导，接上关系，党组织稳步巩固起来。

秋末，蒋介石政权比较稳定了，开始整军。26军军长周凤岐下台了，军官团特种科撤销了，合并到南京中央军校第6期，炮科同学插入炮兵大队，工科同学插入工兵大队、交通大队，辎重科同学不拆散，附在炮兵大队成立一个辎重区队。以曹聚义为书记的这个地下党组织，由杭州市党组织上报上海党中央，转出关系。仅仅半个多月，上海党中央就来了同志（忘其姓名）在南京炮标大门外一个小面馆里和曹聚义接上关系。那时，甘棠等原来考入军事交通技术学校的同

志，都已因学校撤销，并入三十四标的中央军校6期的交通大队或工兵大队；吕农三同志则早已被任为黄埔军校（后改称中央军校）教授部的中尉速记官，成为何应钦教育长身边的人。曹聚义到后和他们联系起来，恢复了组织活动。中央来的同志了解情况后很高兴，说，黄埔清党后，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已经一年多没有能恢复组织，不少同志到中央和省市找关系。现在一下子有了一个近30人的党组，真是件大喜事，当专案报请中央指示。第二个星期天，在明故宫大操场召开了个干部会，由来人传达中央指示，把这个党组扩大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军校特别总支部，按营地的特点，下设炮标支部、三十四标工兵支部、交通支部。（后来又增设步3、4大队支部、国府后街军官班支部）并指定曹聚义、甘棠、吕农三、阮大卿、简立为总支委员；曹聚义任书记，甘棠为副书记。

1929年初，中央通知特支，改变领导关系，把这个中央直属特别总支部，由南京市委书记游××（忘其名，只记得姓的音是“游”，也可能是姓“尤”）亲自领导，在雨花台开了一次活动分子扩大会议，由游书记做了形势报告。而后又告知今后改由南京市军委领导。3月起开始由军委王昭平来直接联系。这时候，由于几个月中，中央、南京市不断介绍一些失了关系的老同志给总支，恢复组织，同时蒋介石收编了黄埔3、4期参加过北伐军下来的同学编为军官训练班；步3、4大队中不少地下党员都介绍到这个总支来，加上各队发展了一些新同志，总支成员直线上升，到3月底，总支下设5个支部，党员人数达108人（曹景滇注：曹艺手稿此处写成128，笔者认为系笔误。因为曹艺生前多次对笔者说过党员人数为108人，108与下文“百单八将”也符合），市委领导戏称“百单八将”。

二、大逮捕前夕

1928年春末，蒋冯携手，政局又出现暂时的稳定，但国民党派系之间的争夺正在酝酿新的回合。蒋介石为着扩大党内实力，在军政大量吸收党员，频频

举行集体入党。而当时一个最大的反对派——改组派在汪蒋蜜月中也暗地里在各军、政校学生中大拉党员。改组派还密谋夺取武器，武装起事，我特别总支的三十四标个别成员也有抢夺机关枪、组织暴动的建议。又因为蒋介石在6期同学毕业前夕，将轮赴各队亲自点名，安排点名的时间在深夜，有的成员建议乘他来点名的机会，进行刺杀，为革命烈士报仇。这些情况，由曹聚义向王昭平汇报，受到市委的严肃批评。曹聚义当即向王昭平保证，一定会向建议的同志讲清道理，打消这些急躁、幼稚的想法。王昭平却显得焦灼不安，精神恍惚，嘴中念念有声，反复责备军校这些同志思想糊涂，会出乱子。

4月中旬，6期各兵科同时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点完了各队的名，并没有什么风吹草动。典礼后，绝大部分同学都暂留原队，等候6月1日举行孙中山总理的奉安大典后分配工作。这期间，各中队毕业考试中前20名的同学可以报留洋，都在备课迎考。一些身体比较魁梧的同学被挑选为护灵队，将北上迎孙中山先生灵柩。极少数因工作急需的，提前分发到部队、机关去当见习官。如阮大鄖、梁绍之是考取留学预备班的；楼广文是护灵队的；甘棠是提前分发在浦口一个电台工作的。

就在这等待奉安大典、等待分发的初夏时节，同志们不用上课上操，行动比较自由的时候，同志们意气风发，兴致勃勃，组织发展和组织生活空前活跃的时刻，一场暴风雨突然袭来了！

三、大逮捕

5月×日晚点名，各队除值星官之外，中队长、大队长都齐集操场，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在炮标，点到曹聚义，曹在三天前接到“父病危”的电报，由大队附兼代中队长孔庆桂批准回浙江浦江老家去了，孔庆桂却装成不知道这回事似的，一个劲儿追查。在三十四标，简立、阮大鄖被点到，着令出列。大队长点甘棠的名字，不到，一连喊了几声。甘棠前几天已

提前分发到浦口某电台去当见习官了，大队长大概忘记了，点名前保密，没有告知中队长区队长。队中同学赵壁知道出事了，第二天拂晓就守在营房门口的一个烧饼店里。到8时许，甘棠过江来了，赵壁一把拉住他，一口气把他拉上汽车，到了下关车站。两人逃到上海，甘棠幸免落网，赵壁从此在上海温州间做“水客”（行商），脱下了军装。

简立、阮大鄖点名出列后，车送校本部，关进禁闭室。这时，吕农三已被首都警察厅传讯，扣押了。吕农三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步兵3大队一位同志耳内，连忙告知工兵1队祝树柏，工兵4队王校正两位同志，他俩连忙会同小组长朱琦找到教官江水汶（吕农三的衢州府同乡）出面营救，通过在警察厅侦缉队任职的一位浙江缙云同乡关系，由江水汶、吴农华两位教官出面保释出狱。这样，点名捉拿5个人，被捕了3个人，两个关在军校禁闭室。扣押在首都警察厅的吕农三不久就保释，离开了南京。甘棠已平安到达上海。同志们惊魂初定，安下心来整顿行李，等着“分发工作”，大家想只要一分发走了，就不会有多大问题了。

哪知5月18日晚，三十四标、国府后街、小营、马标、炮标半夜里同时掀起大逮捕，朱琦、果宇新、李奈西、梁绍之、盛志远、许权、楼广文、张三川、丁和钧、罗梦阳、甘登谷、郑光祖、蔡锡昌、胡让梨、叶修15名同志同时被捕。

吕农三又被从杭州旅馆里捉回南京。浙江保安队会同浦江县警察局倾巢而出，突袭包围曹聚义的老家，仍旧没有抓捕到。这样，前后一共逮捕到18名穿军衣的共产党犯，成为轰动首都的“十八罗汉”案件。

四、案件的结局

“十八罗汉”案件发生时，刚逢国民党改组派盗窃军火案发生，黄埔各期毕业生参加该派的有几个人被捕，6期炮工队的何奇，据传说是个小头子。开始，误传为共产党人要偷机关枪于“总理奉安”时暴动，后来改组派自我宣扬了，对“十八罗汉”案减轻了分量。

加之，新任教育长张治中要拉拢人心，有意推出不管，渐渐当成一般案件来处理了。

吕农三从杭州旅馆中第二次被捕，押解回中央军校，和另外17人一起关在禁闭室，由学校政训处科长侯志明首次审讯。叛徒王昭平公然以证人身份坐在侯志明身旁，凡是他认识的同志，他厚颜无耻地当面检举揭发，吕农三、简立、阮大鄆三个支委之外，他把果宇新、张三川、丁和钧、罗梦阳、甘登谷等由中央和南京市由他经手介绍进入军校特别总支恢复组织关系的同志，都当堂加以陷害。（反过来，凡是他不认识的同志，经过这次审讯，心中有底，此后就都绝对否认了，打下终于无罪释放的基础。）

在学校政训处两度审讯之后，随着6期学生分发完毕，学校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军校把“十八罗汉”移到三元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当作未决犯押于拘留所。经过审讯，于8月间仍以未决犯寄押到小营陆军监狱。

陆军监狱关押期间，部分同志（主要是王昭平所陷害的同志）被刑讯，其中吕农三同志受的考验最多，大概因为被捕18人中只有他是当官的，其余都还是学生；加之，王昭平和他很熟悉，王昭平曾当面作证，咬定吕农三是组织领导人。一次受电刑昏死过去，抬回牢房，几个钟头后才醒过来。

但是，18人之后就没有再增加新囚犯了，其余在牢未承认的人也没有加重罪名，说明受刑讯的几位同志，都没有屈打成招，确实是党的好儿女。

1929年，罗梦阳同志病死在南京三元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拘留所。

1930年，梁绍之同志病死在南京小营陆军第一监狱。

1931年春，军法处对这件拖延历两年的案件做了最后一次审讯，判处吕农三、张三川等8至12年不等的徒刑。除罗、梁瘦毙狱中外，其余12人于4月18日宣告无罪释放。这12人都是由三元坊军法处点名宣判，当场开释，没有叫办任何手续。

五、案件发生根源的探讨

事经50年，对案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还只能是推断，而不是真相。50年中，出狱的人追述当年情况，各各就自己的经历来回忆，局限性很大。被通缉和因为知道组织被坏而离开军校的同志，在狱中听到的消息较多，但也有以误传误的。据胡让梨、赵壁、甘棠、李奈西、朱琦、楼广文的叙述，互相印证，比较可以肯定的是：

一、罪魁祸首是王昭平，他利用南京中军委直接领导“中央军校特别总支”的便利，知道这个总支的主要人员，判党投敌有了本钱，通过他的同乡同学中央军校政训处组织科长侯志明向当时新任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告密。他首先从破坏组织入手，陷害了曹聚义、甘棠、吕农三、简立、阮大鄆五个支委。吕、简、阮同夜被捕，曹、甘因不在校而遭通缉。

接着又诬害了张三川、丁和钧、罗梦阳、甘登谷和果宇新，这5个人是出事前不久才向南京市委介绍来特支，恢复组织关系的，只有王昭平认识他们，别人是检举不出来的。据传说，南京市委也被他破坏，游（尤）书记被捕。

二、再一个叛徒是简立，他知道三十四标营房的交通、工兵两大队中地下党的几个骨干同志，也认识炮标营房内的胡让梨、叶修、唐时杰同志。第二批被捕的朱琦、李奈西、梁绍之、盛志远、许权和胡让梨、叶修、郑光祖、蔡锡昌等9人，是简立在被捕的当晚，主动向军校政训处悔罪立功出卖同志的名单，于第二次抓捕时被捕了，还有炮1队的唐时杰，已于第一次逮捕地下党时离开南京，没有落网，也被通缉。

三、这次被捕18个人，除罗梦阳、梁绍之二人病死狱中，其余16人中，简立、阮大鄆叛党投敌了，其余14人都表现得很坚强，被王昭平证实的，经历了酷刑的考验；王昭平所不能证实的始终不承认，坐了两年冤狱，争取到无罪释放，都不愧为党的好同志。

六、今天能回忆得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总支成员

事经50年，虽然在今天还活在国内的几个同志苦忆，当年“一百零八将”已记不得几个了。由于组织纪律，在地下活动时期，横向的联系很少。当年掌握全部名单的只有曹聚义和吕农三，吕于1934年后不知下落，曹能记起的不多，甘棠是比较别人知道得多一点的。1951年，甘棠遣回江西南昌原籍，不知现在还存在否？希望能有人作补充。初步回忆出来的有以下一些人：

甘棠（江西南昌人）

阮大鄆（浙江宁波人）

曹聚义（浙江浦江人）

梁绍之（广西人）

许权（湖北人）

楼广文（浙江义乌人）

朱琦（浙江义乌人）

李奈西（广东人）

果宇新（江苏铜山人）

盛志远（湖南长沙人）

胡让梨（浙江浦江人）

叶修（浙江松阳人）

唐时杰（浙江兰溪人）

阚塗海（浙江杭县人）

卜如鹏（浙江杭县人）

马恩义（浙江龙游人）

李世昌（浙江宁波人）（曹景滇注：李世昌的孙子说，他爷爷并未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不知甘棠是否记错？）

杨成玉（浙江宁海人）

赵壁（浙江温州人）

张渠（浙江江浦人）

曹大铃（浙江义乌人）

“我的黄埔前辈”主题征文启事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个传奇，黄埔同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旧址早已没有了往昔金戈铁马、沙场点兵的情景，我们的视野中也越来越难寻觅到黄埔师生龙腾虎跃的身影。但是，这些黄埔前辈叱咤风云的威武雄姿，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却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为了永远铭记黄埔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激励后人在新时期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推动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我刊特开展“我的黄埔前辈”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记忆中的父辈印象（包括您所了解的父辈的主要经历和贡献，最难忘、最感动的故事），父辈身上体现出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好品德等，结合父辈的人生经历谈对黄埔精神的思考、感

悟和传承等。

征文对象：海内外黄埔亲友后代。

征文要求：文章字数不限，要求内容真实，生动具体，情感真挚，可读性强。来稿时请提供父辈历史照片1至3张，家庭照1至2张，作者本人照片1至2张，父辈和作者的个人简历以及作者联系电话、地址、邮编、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请有条件的作者尽量提供电子版稿件，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我的黄埔前辈”。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
《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电话：010-58336325、010-58336358

联系人：曹燕

电子邮箱：hpzzs88@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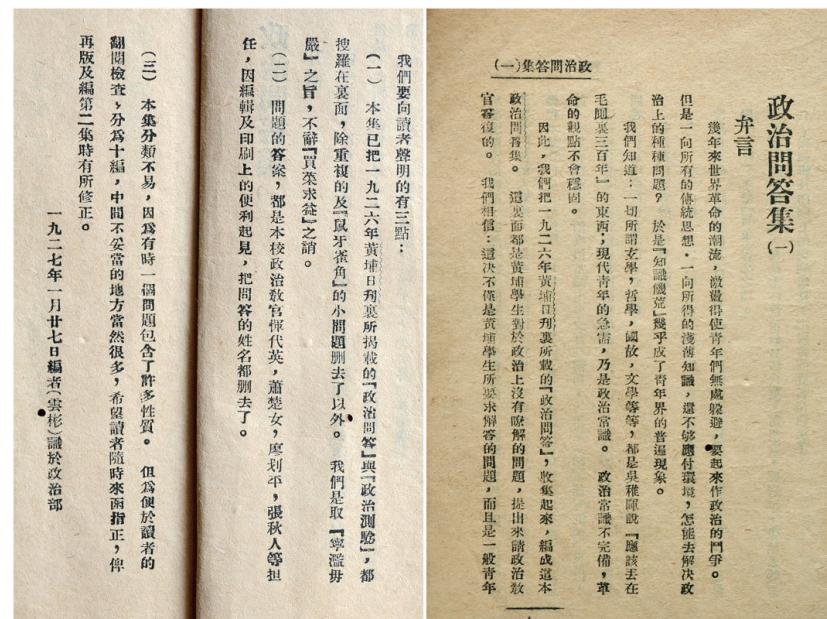
红色文献之《政治问答集(一)》

□ 单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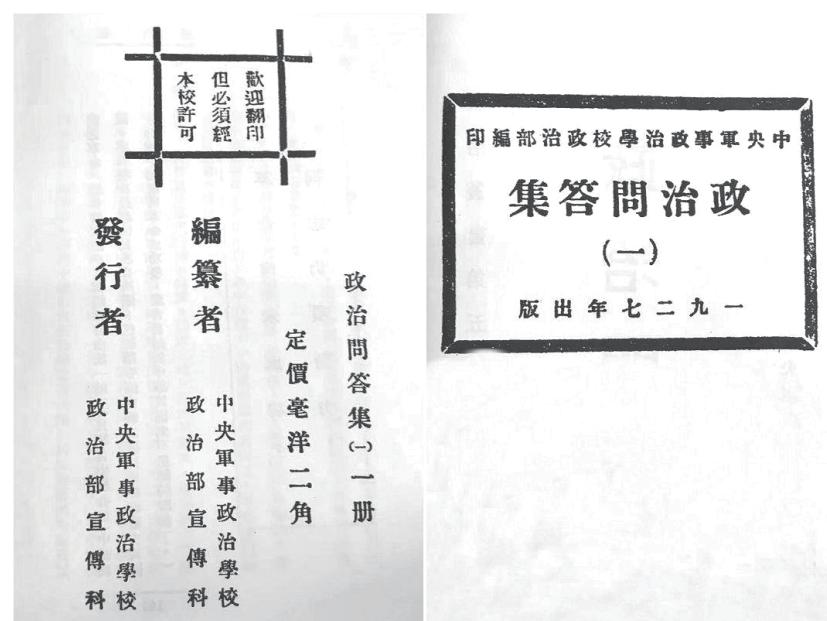
旧书网为了买卖双方交易简捷，将图书分成若干种类。有一种称为红色文献，主要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周恩来、熊雄负责政治部工作期间出版的各种书籍报刊等。当年这些红色文献虽然印行版本不一、数量万千百册，但是经过连绵战火及受政治因素影响，故留存下来的完整书刊很少。如今正值建党百年之际，红色文献收藏逐渐升温，而市场价值也明显攀升，此中不乏稀见之本，倍受收藏界方家们的青睐。

—
笔者淘得一册《政治问答集(一)》(下称本集)，纸本平装，32开排印166页，1927年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出版。本集之弁言道出了印行原委：

几年来世界革命的潮流，激荡得使青年们无处躲避，要起来作政治的斗争。但是一向所有的传统思想，一向所得的浅薄知



/《政治问答集(一)》之弁言。



/《政治问答集(一)》之版权页。



/主任政治教官恽代英。



/政治教官萧楚女。



/政治教官张秋人。

识，还不够应付环境，怎能去解决政治上的种种问题？于是“知识饥荒”几乎成了青年界的普遍现象。我们知道：一切所谓玄学、哲学、国故、文学等等，都是吴稚辉说“应该丢在毛厕里三百年”的东西；现代青年的急需，乃是政治常识。政治常识不完备，革命的观点不会稳固。因此，我们把1926年《黄埔日刊》里所载的“政治问答”，收集起来，编成这本政治问答集。这里面都是黄埔学生对于政治上没有了解的问题，提出来请政治教官答复的。我们相信：这决不仅是黄埔学生所要求解答的问题，而且是一般青年所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有许多问题是很多普遍的。同时，我们知道：在研究政治略有门径的人看来，本集未免太浅薄，并且有时答案太简单了。但我们并不是要把本集作研究政治的唯一材

料，不过想供“知识饥荒”的青年们聊以充饥；无论如何，本集于增进青年的政治常识上多少有些帮助，决不是一个不能充饥的“画饼”！而况现代青年大都在艰难奋斗的环境里，那有闲工夫去读宏篇巨著？这些简短问答，正是增进政治常识的最好方法。

我们要向读者声明的有三点：

(一) 本集已把1926年《黄埔日刊》里所揭载的“政治问答”与“政治测验”，都搜罗在里面，除重复的及“鼠牙雀角”的小问题删去了以外，我们是取“宁滥毋严”之旨，不辞“买菜求益”之诮。

(二) 问题的答案，都是本校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廖划平、张秋人等担任，因编辑及印刷上的便利起见，把问答的姓名都删去了。

(三) 本集分类不易，因为

有时一个问题包含了许多性质。但为便于读者的翻阅检查，分为十编，中间不妥当的地方当然很多，希望读者随时来函指正，俾再版及编第二集时有所修正。

1927年1月编者(云彬)识于政治部

本集编者乃是时任编纂股股长兼《黄埔日刊》主编宋云彬。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杭州共和法政学校肄业。17岁开始喜欢研究时事，每天看《申报》，见有署名“远生”(著名记者黄远生)的通信，总先把它看完了，然后再看“专电”和“特约路透电”“公电”，等等。远生写的通信，条理清楚，判断明确，文体又是半文半白，令其读得津津有味，深受熏陶。其勤奋自学，国学根基深厚，史学研读尤精。从1921年11月到1924



/《黄埔日刊》主编宋云彬。

年夏，先后担任《杭州报》《浙江民报》《新浙江报》编辑、主笔。1924年8月，在安体诚、宣中华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到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编纂股股长，与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等共事，受周恩来领导。同时兼任《黄埔日刊》主编，亲自撰写了大量署名文章在日评、周言、时评、短剑栏目发表，尤其对时局的报道、分析最有力量，影响很大。其在《黄埔日刊》所发表的文章，计有39篇被收录于《宋云彬文集（全五册）》（海宁市档案馆编，2015年2月北京第1版），但未见收入《政治问答集（一）》之弁言。不过，该馆于《整理说明》诚云：“尚有疏漏失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1927年3月底，他从广州经上海去了武汉，在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沈雁冰麾下任编辑。



/ 宋云彬为《黄埔日刊》撰文。



/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之宿舍。

武汉“七一五”政变发生后，随同沈雁冰前往九江。1933年，茅盾（沈雁冰）在《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牯岭之秋》，人物之一云少爷的原型即是宋云彬，他整天摇着白纸扇，摇摇摆摆地走路；爱说爱笑爱喝酒，酒醉后话多；

平时冷眼看一切，似云端中的神仙。在时局转变中，他冷漠、平静，专心地研究《庐山指南》，渴望趁机游牯岭。但在牯岭下棋、看云雾的生活又使他厌烦，他变得有脾气想吵嘴了……茅盾对他用笔着墨较多，主要是正面描写



/黄埔军校印刷所。

及介绍，云少爷与老明、老宋共同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后三种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直到1946年，宋云彬才在《开明》发表《沈雁冰》一文作了回应：“我们从汉口到庐山，以及在牯岭小住的那一段生活，雁冰后来写成一短篇，题为《牯岭之秋》，那里面的‘云少爷’就是我，虽然不免写得夸张一点，大体还近乎事实。”

二

关于《黄埔日刊》的创办，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中《政治刊物之发行》记载：“1926年3月1日，本校所张贴之陆军军官学校《壁报日刊》，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3日出版，日出一张；内容分命令、通讯、新闻、革命之路、特载五大栏。新闻栏内又分校务、

党务、国民政府、军政、农工商学、帝国主义、北方军政、敌情、世界现状八项。6月4日，本刊改名为《黄埔日刊》，扩充篇幅，增加材料，内容分新闻、党务、革命运动、中国经济政治状况、国际经济政治状况、特载、革命之路、政治报告八栏。”

开始出版《黄埔日刊》时并无印刷厂，只在政治部后面的两间小房内印刷，有一台手摇印刷机，五六个工人，日发行量约5000份。数月后添置设备，扩充发行至3万份。印刷所所长是图书管理员饶来杰。饶来杰（1898—1983），别号竞成，江西南昌人。1923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到黄埔军校做中共党员的组织工作。

《黄埔日刊》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刊，8开4版，宣传军事

与政治并重，是培育革命军人的精神食粮。第4版有师生喜闻乐见的《政治问答》专栏，学生的提问或多或少，教官的回答或长或短，几乎每天都有登载。本集与《黄埔日刊》资料汇编（广东革命博物馆编，2020年1月第1版）对照举例如下：

（一）本集第一编《关于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系统等》第2页“问五：三民主义中先讲民族，次讲民权，其次讲民生；与建国大纲次序相反，是何用意？答：总理讲三民主义，是就革命工作之后言；讲建国大纲是就革命工作之轻重言，故次序不全同。”此为1926年11月2日《黄埔日刊》（第一八〇号）第4版《政治问答》，主任政治教官恽代英答入伍生1团8连廖瑞平问。

恽代英（1895—1931），别号子毅，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汉。1918年武昌中华大学文科毕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教授《中国政治经济概况》，这是当时政治课中最精彩的一门。他不但会做文章，还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讲演最为生动而有条理，煽动性很强。他讲话滔滔无止境，又非常幽默，历二三小时，听者亦无倦容，所以极受学生们的欢迎。

他的容貌很像朱执信（同盟会元老），不常穿军服，因他不习惯立正稍息。但有时也穿军服，行敬礼的时候，他的姿态非常可笑，同仁常常笑他在行礼的时候简直是在挥拳。1927年1月，恽代英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曾参加南昌、广州起义。1930年在上海被捕。1931年4月在南京壮烈牺牲。

（二）本集第八编《关于国内外的党派及会团等》第5页“问一：共产主义由新经济政策达到其目的，就是世界大同的大同主义；民生主义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达到其目的，也就是世界大同的大同主义，所以总理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这样说，对吗？答：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改造社会经济组织，使之达到保证社会全员安定生活的两个阶段。在其所祈求之终极目的上，自然可以说都是大同主义。”此为1926年11月20日《黄埔日刊》（第一九四号）第4版《政治问答》，政治教官萧楚女答政治2队王恒问。

萧楚女（1893—1927），原名萧秋，别号树烈，笔名楚女，湖北汉阳人，武昌实业学校毕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担任重庆《新蜀报》主笔。1925年到

上海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1926年2月，自沪赴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政治周报》编辑。是年秋，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兼《黄埔日刊》《政治问答》专栏编辑。第一次上课时，军校学生久闻“楚女”大名，听课者凡二三千，大礼堂亦不能容，则在操场中设桌为台立其上授课。萧楚女身材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之演词，有如进军号角。讲未多时，值日官请萧教官“再高声些”，他嗓子本颇洪亮，然因在露天，人数又多，后排者尚不能听清，于是他运气高呼，不意用力太猛，裤带崩断，幸纽扣尚固。裤仅稍落，其乃一手按腰，讲完了90分钟。1927年春，萧楚女因肺病住军校东山医院治疗。广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在病房被捕。4月22日被杀害，年仅34岁。

（三）本集第八编《关于国内外的党派及会团等》第115页“问二：‘十月党是什么？’答：十月党是俄国1905年革命后所产生的，并不是一个党，仅仅是从民党与立宪民主党中退出的一派人，1905年10月俄国工人大同盟罢工，政府为情势所迫，不得不稍让步，10月30日俄皇下谕，允行宪政，予人民以细微利益。这派人就是怕人民革命，亦主张予人民以细微利益，以缓和革命风潮，他们拥护俄皇的主张，并

促俄皇实行，人遂呼他们为十月党。”此为1926年12月6日《黄埔日刊》（第二〇七号）第4版《政治问答》，政治教官张秋人答第10队学生唐建军问。

张秋人（1898—1928），浙江诸暨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到广州，继毛泽东和沈雁冰之后，接办《政治周报》。后来该报停刊，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教授国际问题，因对各国革命史非常熟悉，所以经常解答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1927年2月，未婚妻来到广州，在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工作。此时，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赶到广州去，不久便结婚了。1927年9月不幸在杭州被捕。1928年2月8日壮烈牺牲。

综上所述，可见本集涵盖内容之广泛，言简意赅之解答对“知识饥荒”青年极具实用性。遗憾的是《黄埔日刊》主编易人，宋云彬离开了黄埔，加之“清党”运动，致使编辑《政治问答集（二）》的设想，未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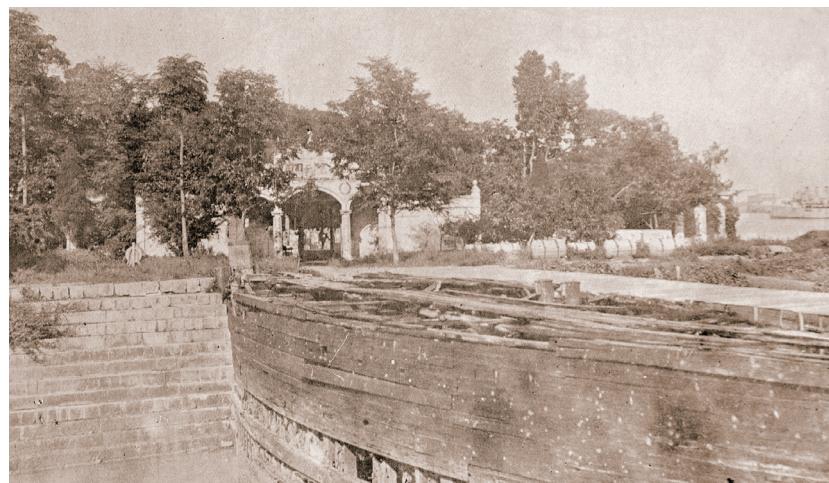
三

黄埔时期，政治教官常在《黄埔日刊》署名撰文，多为共产党人。那时政治教官大部分都住在一所二层小洋房里面，因是粤海关所属的产业，大家都叫这所建筑为“海关洋房子”。它面临珠江，背枕丛山，在南国

热带植物的万绿丛中露出红楼一角，其环境之优美简直胜过杭州西湖的西泠印社，实在是黄埔岛上风景最优美和建筑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当年孙中山先生莅临黄埔军校在此憩息，校长蒋介石也曾暂住。后来，校方尊礼教官就指定为政治教官的宿舍了。

政治教官多年轻热情，但并不浪漫，彼此之间没有无谓的酬酢及勾心斗角的现象。有时也有争论，但绝不是为了私人问题，而是为了学理上的分歧。他们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感情。每个政治教官都有一种向上的自觉性，他们唯恐自己的学问不够，唯恐自己讲的课为学生所不满，所以他们一般都很用功。在校部吹了熄灯号音以后，总能看到缕缕的灯光从“海关洋房子”窗户里射出来，这是教官们在各人房间里，正灯下韦编三绝。

那时政治教官的日常生活是可羡慕的。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大家会聚在客厅内吃零食和谈话，香蕉、洋桃、花生，这些都是教官们不可少的享受品。有时候，也偶尔约三两知己，到平岗的小酒店里去小酌。他们的娱乐也很简单，黄埔岛上可玩的地方并不少，省港罢工的工人为军校在山上拓宽许多马路，教官可以到处漫游。白天有暇，或者是在月明之夜，就到咫尺之遥已经荒



/ 黄埔公园。

芜了的黄埔公园里去凭吊。几个财东或大官的墓地最使教官们感兴趣，因为这些大坟墓面前不仅照例有许多翁仲，而且有石凳石桌，是教官坐着吃香蕉、洋桃和牛奶糖的最好地方，因而有人戏称这些墓地是“教官的乐园”。在闲谈中常常有人这样提问：“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当中，将来谁会埋葬在黄埔？”

时光穿越近百年，恽代英、安体诚、萧楚女、熊雄、张秋人、施存统、陈祖康等教官都或壮烈牺牲或老成凋谢，但没有一个人是埋葬在黄埔的。

附录：黄埔军校政治书籍 翻印规则

本规则除本校所属各机关外，凡各机关团体或书店，欲翻印本部出版物者均适用之。

各书店或团体以营业性质而翻印者，须守下列条件：

于翻印前一月，以书面向本部请求，经本部允许得翻印之。

翻印者须以店铺或团体名称、图记、负责人姓名、详细地址，拟收书信、翻印册数，连同请求书送交本部核定之。

不得变更原文及原书名目。

不得剽窃内容而改名私售。

翻印出版后，须以六册送本部检阅。

有违本条各项者，本校随时得令其停止。

各机关及团体以宣传或教育为目的（非卖品）而翻印者，均一律欢迎，但除适用第二条（甲）（丙）（戊）三项外，须将非卖品字样印于书面，并预将机关或团体名义、负责人、所在地、翻印册数，列送本部备查。

再出版时其手续同。

本规则自校令公布之日起施行，如有不适宜处，得呈请修正之。
黄埔



1926年4月8日， 蒋作宾到黄埔军校访问蒋介石， 力主速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 贾晓明

1926年4月8日，蒋作宾到黄埔军校访问蒋介石，力主速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得到蒋介石的赞同。蒋作宾早年思想倾向革命，1905年加入同盟会，为辛亥革命元勋。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陆军部次长，北伐胜利后作为外交官出使多国，1942年去世后被追认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对于蒋作宾作为外交官的经历，著述较多，在这里不再赘述，本稿试从目前较少论及的蒋作宾早期经历中选择二三重要事件加以概括整理，呈现给读者。

辛亥革命建功勋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1884年3月3日（一说4日）出生，15岁中秀才。1902年，他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受同学宋教仁的影响，思想日益倾向革命。1905年毕业后，官费留学日本。当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蒋作宾与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参加中国同盟会。1907年，蒋作宾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4期



/ 蒋作宾。

步兵科，1908年7月毕业。毕业后，他接受同盟会“居北方总汇各方之消息，暗中传达，并密布置同志于各方”的任务，归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暗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秘密组织革命团体。1909年，他参加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获优等第2位，被清廷任命为陆军部军衡司科长。军衡司是清朝末年设立的机构，当时主要掌管陆军军官的任免、考绩、叙勋等，地位很重要。蒋作宾因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成中文，工作成绩出色，不久升任司长，受到陆军大

臣荫昌等人的器重。当时，清廷正在建设新式军队，蒋作宾也借此机会，提出整编军队的建议，获得批准后淘汰了不少旧军干部，将一批同盟会会员借机安插进入各部。

当时，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部驻防滦州，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驻防保定，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率部驻防奉天。张、吴、蓝被誉为“北洋士官三杰”，在军界颇有名望，且三人私交甚笃，同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又都参加了同盟会，与革命党人和蒋作宾也都有着联络。他们所统领的部队，不但是北洋军最有实力的力量，而且驻扎在北京附近，对于拱卫京师有着特殊的作用。

1911年10月，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准备在直隶省永平府举行的永平秋操中举兵。北方的新军准备在秋操演习时发动起义之际，湖北的革命党人也正抓紧筹划起义。南北两方革命党人联系后，决定“待北方秋操进行后，南北两方同时举事”，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一系列

突发事件促使湖北革命党人提前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随着武昌起义爆发，秋操中止。10月27日，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随之发起滦州兵谏，联名电奏清廷，提出实际由梁启超起草的《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要求在当年之内“立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制订宪法，“特赦擢用革命党人”等，并威胁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全部办完，否则杀入北京。

清廷十分惊慌，不得不一下“罪己诏”，暂准张绍曾等所请，并派遣蒋作宾等人前往滦州宣抚。蒋作宾到达后劝张绍曾等趁清军主力大举南下、北京空虚之际，率部直捣北京，实现“首都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然而张绍曾担心准备不足，又对部下是否全然响应缺乏信心，不敢冒险，从而错失良机。

与此同时，清廷任命驻军石家庄的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蒋作宾得知有人准备暗杀吴禄贞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给吴禄贞送信，要他速去山西，和当地的起义军会合，以避暗算。由于当时火车不通，使者到达石家庄时，吴禄贞已遭不测。于是蒋作宾放弃了在北方发动起义的想法，到武汉会合南方革命党人，后被派到九江调兵增援武昌。蒋作宾到九江后，建议九江起义军到湖北省广济、黄冈，牵制清军的进

攻，并派兵进攻清军的后援。其意见得到采纳。于是，武昌革命军士气大振，武汉的革命形势趋于好转。

12月1日，袁世凯向正齐聚汉口的各省代表提议休战。12月9日，唐绍仪南下，11日抵达汉口，但革命党人坚持已经光复的上海为会谈地点。12月18日，双方在上海正式开始南北议和。蒋作宾也应邀到上海，参与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蒋作宾任陆军部次长。他迅速对革命派的军制进行整备，收容保定军官速成学校的教员以组织南京军官学校，还以湖北省同盟会会员为核心重新编制了湖北新军。

唐绍仪组成第一任内阁后，蒋作宾受孙中山、黄兴的委托，到北京政府内续任陆军部次长。临行前，他曾积极向孙中山、黄兴等建议：组织以北京、武汉、南京“三点”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军事力量，从而控制全国的局势，并计划将他在南京参与组建的新编第8师调到直隶，得到采纳。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属于革命派的蒋作宾十分排斥，曾提案蒋作宾放弃军职，改任工商部部长，因遭到国会中同盟会议员的反对而作罢。

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

大总统后，实行专制独裁，破坏民主共和，进而筹划消灭南方各省革命势力。1913年3月20日，国会开会前夕，蒋作宾的好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力主武装讨袁，掀起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南京、武汉的革命武装均遭破坏，蒋作宾的“三点”计划夭折。其间，袁世凯对在北京的蒋作宾“日夜提防”，蒋作宾称病离职，处于被软禁状态，只能“随班进退，无所事事，见同志遇有危险能解救者，则解救之耳”。

领导湖北“倒王自治”运动

护国战役后，由于南北军阀之间频频发生战争，战祸连年。湖北首当其冲，成为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南方的基地，更深受其害。不仅一般民众饱经战乱波及之苦，即是地方官僚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也对北洋军人蹂躏湖北、摧残地方的作为大为不满。

当时，统治湖北的是直系军阀王占元。王占元为巩固其统治，不仅在政界大肆排除湖北籍人士，更对湖北人民采取“竭泽而渔”的搜刮政策，甚至采取卑鄙手段，贪污军饷，激起多次兵变。湖北人民对他的愤恨已达极点，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驱王运动”。

湖北的“驱王运动”大体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等北洋官吏为代表，提出的口号是“鄂人治鄂”。另一派是以李书城（曾任湖北护法军总司令）、蒋作宾（曾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孔庚（曾任山西晋北镇守使兼中央陆军第9师师长）等国民党人为代表，他们在“鄂人治鄂”之外，又进一步提出“废督去兵”的基本口号。虽然这两派在基本口号上有细微区别，但在驱王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黎元洪等人的做法是派人向北京政府请愿，李书城、蒋作宾、孔庚等也积极参与。

当北洋政府一再为王占元推诿，主张留任的时候，蒋作宾等人看到用和平手段不能罢免王占元，遂“高唱打倒王占元之口号”，决定使用武力推翻王的统治，响应孙中山北伐。但蒋作宾、孔庚、李书城等人手中并不掌握军队，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决心求助于湖南。6月中旬，蒋作宾一面“代表久被北洋军阀压迫的国民党人及大部分不满意北洋军阀横行的知识分子”前往长沙策动湘军援鄂倒王，“利用鄂省人民驱王的高涨进兵武汉”。一面派人“奔走于孙中山广东政府之门”，向孙中山请求帮助。孙中山派潘怡如、朱旭东等到鄂西协助驱王活动。

蒋作宾、孔庚等来到长沙后，立即会见湖南自治军总司令赵恒惕，希望湘军援鄂，“兴吊民伐罪之师，驱除横暴，以解倒悬”。为争取湖南舆论支持，蒋作宾等还联合湖北旅湘同乡会在长沙会馆召开驱王大会，会议决定组织驱王委员会，并设立湘鄂通讯社，专门刊发揭发王占元恶行的文章。

为打消湖南在自治宣言中曾宣布“不侵略何方”的顾虑，蒋作宾等以“一国之中，必各省自治完成而后，一省之自治始得完成，断未有邻接各省不能自治，而一省独能闭门自治者也”为依据，对赵恒惕进行游说，还向赵恒惕提出：湖南军队过多，财政极为困难，湖南内部的派系斗争又十分尖锐，向外发展既可减轻财政困难，又可消除内争，并向赵恒惕保证，如果“赵恒惕答应出兵援鄂讨王占元，湖北以后协助湘军两个师的军费”。

7月下旬，赵恒惕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兵援鄂问题。蒋作宾还组织在湖南的湖北人士召开万人大会，以壮声势。大会宣布成立湖北自治政府，颁布了湖北自治政府临时约法，并选举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兼“湖北自治军总司令”，总揽“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军队”；孔庚任省务院长，施洋等为秘书，又组成湖北自治军，由夏斗寅任自

治军总司令。大会还发表了蒋作宾等撰写的一些重要文告和电文，其中有《湖北自治军将士兵民及各团体代表通电》《湖北临时省总监蒋作宾亲率自治军讨王占元电》《湖北自治文告》《湖北自治政府致外交团电》等，揭发王占元督鄂的种种罪行，指出“王占元不仅吾鄂人罪人，实全国盗魁、祸首，凡我中华民籍，人人得而诛之”，并阐明“倒王”的宗旨是“期树联治之业”，愿“为湖北人争自由而战、争人格而战”。

恰好此时，国民党系川军将领熊克武因遭排挤谋向外发展入湘接洽，表示愿意率部支持赵恒惕出兵，“由西南两路夹击，以操胜算”。蒋作宾又当中斡旋，坚定了赵恒惕出兵的信心。

7月26日，赵恒惕宣布出兵讨伐王占元，蒋作宾派人回湖北组织“自治军”，人数达万人以上。湘鄂战争打响后，王占元部一触即溃，湘军和湖北“自治军”进展迅速。在得知前线作战失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王占元召集军政联席会议，当众宣布辞职。此时，吴佩孚认为夺取湖北的时机已到，便率军南下，进入湖北，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宣布吴佩孚大将萧耀南为新的湖北督军。赵恒惕当即和吴佩孚谈判。蒋作宾将“驱王易萧”视为“拒虎进狼”，表示：“我军既



/ 1924年9月，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大会。

以自治为帜志，所有北廷命令及督军巡阅等职，当然不能承受。”

不久谈判破裂，湘直、川直战争爆发。湘军损失惨重，赵恒惕手下对蒋作宾等人开始表示不满，使蒋等人在湖南的“处境非常尴尬”，湖北省自治临时政府无从开展工作。不久，湘军彻底失败，湖北自治政府和自治军随即垮台，蒋作宾乘轮船赴上海，再“赴粤谒总理，报告讨王占元经过”。一度轰轰烈烈的湖北省自治运动至此结束。

积极活动，参与促成和推进北伐

1921年，吴佩孚的势力控制了湖北省，蒋作宾前往广州辅佐孙中山。此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再次出任大元帅。10月8日，孙中山提请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在桂林成立了北伐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并任命蒋作宾为大本营幕僚长，准备出兵计划。1922年2月27日，北伐军在桂林誓师，因湖南军

阀赵恒惕拒绝北伐军借道湖南，北伐军被迫改变作战计划。1922年5月，北伐军攻入江西，占领了赣州、吉安等地。同年夏，孙中山到达韶关，设大本营于旧镇署，命蒋作宾等拟订出兵方案。此时，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唆使下发动兵变，北伐部队被迫返回广东。蒋作宾设法回到广州保护孙中山。1923年1月，陈炯明叛军被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退守东江，广东革命政权暂时安定。此时，卢永

祥与何丰林为了保持其浙江、上海的地盘，与张作霖、孙中山联络，表示愿意结成“三角反直同盟”。蒋作宾接受孙中山委派，多次前往上海、浙江，与卢永祥、何丰林等接洽。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直系军阀企图一举吞并浙江。孙中山决定利用时机进行第二次北伐，把大本营迁到韶关，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9月13日，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北伐军已经整装待发，蒋作宾也准备回广东再任军职。但在此时，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商团武装发生了叛乱，北伐军转而讨伐叛乱的商团武装，第二次北伐也被迫停止。

1924年10月，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直系统治，拥段祺瑞成立临时执政府，吴佩孚所部直系军队溃败。政变成功后，冯玉祥派代表赴粤，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北京共商国是，蒋作宾随同前往，于12月底到达北京，但此时孙中山已经身患重病。此时，北洋政府大权落入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留下的国事遗嘱中，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北伐实现中国的

统一也成了其革命遗志。

到1925年底，广东国民政府平息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消灭了陈炯明、邓本殷的割据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彻底得到巩固。李宗仁、白崇禧也平定了广西，并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进行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孙中山逝世后，蒋作宾继承其遗志，以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奔走于全国各地，周旋出入于各派系军阀之间，团结各方力量，联络旧部，以期早日促成北伐。

在孙中山北上时，与冯玉祥共同行动的胡景翼以河南督办的身份率国民军第2军夺取了吴佩孚占据的河南，并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还制定过“迎孙中山立国民政府于河南的计划”。不料因孙中山、胡景翼相继病逝，该计划未能如愿。1925年4月，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2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蒋作宾迅速赶到河南与岳维峻联络，“布置军事”。他告诫岳维峻，河南对于北伐来说至关重要，目前已处于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靳云鹗、刘镇华等人的包围之中，岳要做的是“整军习武，休养民力，励精图治”，采取“绝对防守”的策略，待北伐

军出动后，共同夹击湖北。后来岳维峻没有听从蒋作宾的建议，在北伐尚未开始时就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结果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失败，只身逃往山西。对此蒋作宾深感遗憾。

1926年北伐前夕，蒋作宾回广州，多次建议早日开始北伐，这一点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后来为了促成早日北伐，他甚至向苏联顾问鲍罗廷“开陈大势，详指计划”。北伐开始后，他积极参与，先后出任江西、湖北宣抚使，并奉命前往张作霖处，说服张作霖不要与吴佩孚合作。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作宾以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慰劳军队，安抚人心”。

1928年，“二次北伐”开始后，蒋作宾随北伐军进入山东与北洋军作战，先后出任山东省政府委员、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委等职，着手进行“恢复地方组织”“抚绥人民”等工作。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蒋作宾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大的耻辱，矢志必有昭雪”。北伐军到达北京，战地政务委员会解散，蒋作宾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就东三省易帜问题同蒋介石、阎锡山等进行商谈。蒋作宾从中斡旋，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

□ 熊子杰

第二章

“台湾”一词原来是指“外来人”：无论谁先到后至，台湾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为何台湾称为“台湾”，“台湾”一词是何意义，大多数大陆同胞都不知道，甚至许多生活在宝岛台湾的台湾人也不知道。

中国历代就有许多经略台湾或移民台湾的历史，但历代称呼有所不同，直到明末清初才确认“台湾”这名称。清代连横（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祖父）的《台湾通史·开辟篇》指出，大陆汉人渡海来台需横渡台湾海峡，而台湾海峡黑水沟的海流及海象非常险恶，汉人所乘的船又都是平底船，不适合横渡险恶的台湾海峡黑水沟，幸运者穿越台湾海峡，上岸后除须与岛上的瘴气及瘟疫等传染疾病对抗外，还要面对当时岛上住民的强烈反弹及驱逐，战胜者才能生存下来，这些内外风险都让许多渡海而来的汉人命丧于此。因此，渡海来台在人们心中是充满死亡的不祥之举。所以，许多汉人便称当时的台湾为“埋冤”（如以闽

南语发音就近似“台湾”），埋葬冤魂的地方。后来因为国姓爷郑成功觉得“埋冤”名称不吉利才舍去不用，而逐渐改成闽南语发音类似“埋冤”的“台湾”（资料来源：连横《台湾通史·开辟篇》，成为今日台湾的名称。

然而如此推论是薄弱的。因为，一、“埋冤”一词的闽南语发音并不类似“台湾”（“Tayan”）；二、郑成功收复台湾是1662年，而“台湾”一词早在《蓉洲文稿》（作者季麒光，号蓉洲）中就有记载，且在1620年（明朝泰昌元年）明朝公文上也出现“台湾”一词。由前述文件来看，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后，所以连横关于郑成功改台湾名的推论似乎不能成立。

依笔者研究，“台湾”一词应源自台湾少数民族西拉雅人的“Tayan”，而其意思系指“外来者”或“新来者”。荷兰人统治时期称台湾为“Taioan”，如以闽南语音译可转成汉字“台湾”“大员”“台员”“大湾”或“台窝湾”等名称，后来在明末清初时期的文献中，清楚记载中国已统一用“台湾”一词称呼今日台湾岛，

最后演变成中国政府正式采用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日。

这推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首先，因为当时台湾少数民族西拉雅人就是居住在今日台南（当时就是指台湾）附近，而当时进出台湾就是以此地作为主要港口。其次，早期的台湾，就是指台南而已，而非今日的台湾全岛；所以当荷兰人到台湾时，会直接从台南上岸，而荷兰人第一个会碰到的当地住民应该就是居住在台南附近的西拉雅人；而西拉雅人碰到金发的荷兰人，他们会惊叫“Taioan”“Taioan”（有外来人或侵略者的意思），这是非常合理，也很正常的。“Taioan”与“台湾”闽南语发音又几乎相同，所以“台湾”一词应是源自少数民族西拉雅人“Taioan”（指“外来者”）。

同样情形也见于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Maori），在毛利语中这个“毛利”一词其实也是“正常”或“正常人”的意思。当时的欧洲人初到新西兰遇到毛利人时，问毛利人：你是谁？毛利人就回答说“毛利”（Maori），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常人、普通

人，而认为欧洲人、外国人是不正常的人(Pakeha)。这与我们台湾早期住民称荷兰人为“Taioan”(外来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英文“袋鼠”(kangaroo)也是同样的情形。当年，英国人初到澳洲时看到袋鼠，不知道这种英国没有的动物叫什么，就问澳洲土著毛利人：“这是什么动物？”土著听不懂英语，于是回答“kangaroo”，意思是说“我听不懂”“我不知道”，英人还以为袋鼠在当地就称为“kangaroo”，因此称袋鼠为“kangaroo”。“台湾”名称的典故与前述这些传说非常类似。

在中国历史上对台湾的了解及称呼可追溯到秦汉时期之前，当时称台湾为“岛夷”。

《尚书·禹贡》：“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卉服：锦衣。织贝：镶有贝壳的布料。锡：承受旨意。)这里所称的“岛夷”应该是指台湾，而书中所述的居民的贡物的织贝服饰应指台湾早期住民泰雅人的珠衣。这段话的意思是：东南海岛上有夷人(指蛮夷)，穿着锦服，用竹器装着缀有亮贝的布料，带着橘柚特产，受旨命前来进贡，他们沿着长江大海，到达淮水、泗水。

事实上，台湾地处大陆东南外海上，而《尚书》所述岛夷

的情形，与台湾当时居民的情形相似，所以许多学者根据这一记载认为台湾与大陆的交流可远溯到《尚书·禹贡》时的“岛夷”时期。

《山海经》(一本以地理为主体的古书)之《海内南经》记载：“伯卢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之南。”一般认为《山海经》中所称的“雕题国”居民有黥面、文身的习俗，类似台湾少数民族的习俗，故认为“雕题国”应是指台湾。

《山海经》中提到外海有一仙岛称之为“瀛洲”，一般学者都认为这应就是指今天的台湾。

汉朝时，称台湾为“东鳀”，《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南多湿，丈夫多夭，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来许多学者推测认为“东鳀”就是指台湾。

三国时期“夷洲”是指台湾，《临海水土志》(一本专门记载海外岛屿的书，三国时吴国沈莹所著，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详细记载台湾的文献)中所说的“夷州”(同“夷洲”)位在临海郡东南方2000里的海上，三国时代的一里约为现在的0.4公里，所以“去郡二千里”即“距离临海郡约800公里”，当时的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距离台湾的台南(当时台湾的中心)约600公里；由于古代对距离及数字概念极不

精准，无度量衡，多会浮夸，航线又非直行，再加上航行海上的洋流及季风的影响，船只的性能及大小等因素，所以“去郡二千里”七扣八减大概就只有四五百公里距离。就距离而言夷洲指台湾绝对合理。另，吴国当时版图临海涵盖今日浙江、福建、广州等，所以，以整个吴国国土而言，台湾位居吴国东南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沈莹所述“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台湾位在吴国东南方，位置几乎是完全相符，所以夷洲应就是指今日台湾。加上沈莹书中描述夷洲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住民的生活习俗等，经考证与当时的台湾皆极为相似，所以许多学者都认为夷洲确定就是现在的台湾。

一般推测《临海水土志》作者沈莹大概曾随卫温及诸葛直部队去过夷洲，不然就是从夷洲回来的官兵将其所见所闻告诉沈莹，所以沈莹才能将夷洲风情描述得如此清楚。这本书的问世对台湾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此书带动大陆汉人前往夷洲(台湾)探险及贸易经商，也有一些大陆汉人因此移居台湾，中华文化及习俗也随之带到台湾。如今台湾考古资料显示台湾古文化遗址，如汉本遗址、十三行文化遗址等，发现许多约两千年前大陆汉人文物，如陶器、玉器、金饰、银饰、铜器、玻璃饰品等

等，这大概可作为大陆汉人在卫温、诸葛直等征台后陆续渡海来台经商或移居的文物证据。

可惜如今尚未发现任何相关直接文物、遗迹来佐证卫温及诸葛直曾到台湾“自由行”，不过今日两岸人民为纪念此航行，每年都举办从浙江台州至台湾的航行。

西晋时期，也称台湾为“夷洲”。

隋朝时称台湾为“流求”，此“流求”非今日的琉球（冲绳）。《隋书·东夷列传》中所述的“流求”住民生活形态、地理方位、文化习俗也和当时台湾极为相似。例如书中指出的当地住民生活形态及女子出嫁时“凿齿”的习俗，与台湾平埔人中的巴则海人相似，所以许多两岸学者也多无争议地认为“流求”即为台湾。

《隋书·流求国》和《隋书·陈稜传》记载，在公元7世纪初（大业年间），隋炀帝曾派遣两名武将三次到达一个在东方的海岛“流求”（即今日台湾）。在大业六年二月十三日，隋炀帝遣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浮海出击“流求”，这里所指的“流求”应就是台湾。1874年，法国学者德礼文（Marquisl' Herveyde Saint Denys）也认为这个“流求”就是今天的台湾。

史料显示，公元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

台湾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汉族人民在台湾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宋王朝将台湾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澎湖。

唐、北宋皆称台湾为流求。南宋称台湾为毗舍耶，《诸番志》（作者赵汝适）中的“流求国”应该指台湾。书中所载毗舍耶国，显然不同于流求，所以有学者认为毗舍耶国是指台湾南部“傀儡蕃”，也就是今日的台湾少数民族排湾人。

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是中国王朝在台澎地区第一个政府机构，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征收盐税。

元代称台湾为琉求。《元史·琉求》记载：“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界内彭湖诸岛，与琉求相对。”这琉求就是指台湾。元《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记述：“琉求……其峙山极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书中提及当地的物产和住民的猎头等习俗，与台湾少数民族都非常相似（《岛夷志略》，元朝汪大渊著）。

自隋朝到明朝初，台湾就一直被称为流求或琉求。直到明洪武时期，才将琉求改称为小琉球，而与今日的琉球区别开来。

进入17世纪之后，汉人开拓台湾的规模越来越大。1628年

（崇祯元年）明朝政府福建巡抚熊文灿与郑芝龙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台湾从事拓垦，当时大陆正值饥荒，饥民成千上万，熊文灿与郑成功合作，提供饥民钱及耕牛，将他们带到台湾开垦种田，岁末提拨盈余给郑成功当成租金。当时随熊、郑完成移民的有数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性大规模的移民潮。此时，台湾汉人一多，对台湾的称呼就多了，如大员、台员、大湾、大宛、台窝湾、埋冤、东都、东宁、小东岛、小琉球、鸡笼、鸡笼山、北港、东番、东蕃及台湾（《郑芝龙大传》），都是当时汉人称呼今日台湾的名称。

明《东番记》（作者陈第，以描述台湾西部少数民族——台湾平埔人中的西拉雅人的生活形态为主）中的“大员”就是指台湾（今日台南）；东番夷人是指台湾平埔人，《东番记》中叙述的东番人的生活习俗与东番的地理地貌、风光等与台湾近似。《东番记》中的“魍港”指今天嘉义布袋，“打狗屿”指高雄旗津，“加老湾”指台南鹿耳门附近，“小淡水”指屏东东港，“加哩林”指台南佳里，“沙巴里”指新北市淡水，“大帮坑”指新北市八里，而且前述地名至今都还在使用，可见当时作者陈第对台湾已是了如指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台湾名称“大员”一

词。

明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明朝地方志书辑录)中称台湾为“大湾”“大员”或“台员”。闽南语发音“台”与“大”相同，而“员”与“湾”相同，所以确认“大湾”“大员”或“台员”是明代称台湾的名字。

南明永历年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台湾名为“东都”“东宁”。明郑的“东都”“东宁”就是指台湾(夏琳著《海纪辑要》记载：“永历十八年三月，招讨大将军世子至东都，以咨议参军陈永华理国政，改东都为东宁，置天兴、万年二州。”)。

如前所述，“台湾”一词首次见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蓉洲文稿》：

“万历间，海寇颜思齐有其地，始称台湾。”在1620年(明泰昌元年)出现于明朝公文上，明朝《镜山全集》(作者何乔远)中亦出现“台湾”一词。在清朝初期，“台湾”已成为正式官方名称，1684年施琅《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中的“台湾”一词当然就是今日台湾，翌年4月清廷诏设台湾府于今日台南市，隶属福建省，“台湾”名称自此正式开始使用，直到今日。

一个地方的历史就好像一个地方的语言。历史是会说话的，从台湾名称由来及语源的历史来看，“台湾”“福尔摩沙”等名称，都是对这座美丽宝岛的称呼。“台湾”一词的这段历史告

诉我们，现在住在这座宝岛上的每个人“不分先来后到，大家都是‘外来者’，无论你是闽南、客家或所谓的外省”，连台湾少数民族也是来自大陆，大家都是外来的；就算是以到达台湾先后顺序而论，也只有台湾少数民族才有资格称自己是本土或本地人，其他人都是外来者“Tayan”。在台湾没有人有权利自己定义自己是本土的，而别人是外来的，以此排斥其他人。更何况这些以此论点分裂台湾的人，自己才是外来人或是后来者。在台湾，大家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只是先后不同而已。无论谁先谁后，都是外来者，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

黄埔

“黄埔后代”栏目征文启事

长期以来，生活在海内外的黄埔后代，在传承黄埔精神、践行黄埔使命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做出了特殊贡献。为了记录黄埔后代的故事，展示黄埔后代的风采，激励更多的黄埔后人继承黄埔先辈的伟大志业，赓续黄埔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我刊“黄埔后代”栏目向广大黄埔后代征文。

征文要求：1. 内容为黄埔后代在先辈“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感召下，传承和弘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故事、做出的贡献；2. 稿件请附

本人简历、文章配图及图片说明；3. 稿件中注明作者电话、地址、邮编等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稿件、图片请尽量提供电子文档，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黄埔后代”；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电子邮箱 :hpzzs88@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 :100075

电话 :011-58336325 010-58336358

联系人 :曹燕

海内外公开发行 综合性双月刊

2021 年《黄埔》杂志征订启事

《黄埔》杂志自 1988 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办刊宗旨，把为海内外黄埔同学提供一份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作为办刊人不懈的追求。2021 年，《黄埔》杂志将在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创新，以更鲜明的主题和丰富的内容满足读者需求。

《黄埔》杂志 2021 年征订工作继续进行。

全年 6 册，定价（人民币）：中国大陆 /150 元（单册 25 元）；台湾、香港、澳门 /300 元（含邮资）；国外 500 元（航空）。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75

收款人：《黄埔》杂志社

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铁匠营支行

开户户名：《黄埔》杂志社

账号： 0200000409200014061

为避免差错，望订户在汇款时注意：

一、订户姓名、联系电话、详细地址、邮编，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二、在汇款单上必须注上“订 2021 年杂志”字样。

三、由经办人（汇款人）代多人征订并需要本社直接寄给订户时，请在汇款时另函告订户姓名、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四、个人订户最好邮局汇款，并写清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邮编。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电话：010-58336326 传真：010-58336326 联系人：常红

订户报销凭证

收款单位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编	100075	
订户单位或姓名							收款单位盖章 	
订 数	全年人民币 150 元		每册单价 25.00 元					
金 额	人民币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汇 款 方 式	银行		邮局					

说明：此凭证必须与汇款凭证合并，金额相符方能作为报销凭证，否则无效。